

#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9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九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共党史资料**

**第九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彩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162000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5,000册

书号11310·9 定价1.05元

**内部发行**

# 目 录

## 文 献

- 陆定一同志向共青团中央报告广州暴动的  
经过及广州共产青年团在暴动中的工作 ..... ( 1 )

## 回 忆 录

- 北伐纪实 ..... 肖劲光 ( 27 )  
回忆苏中战役 ..... 粟 裕 ( 56 )  
关于通道转兵一些情况的回忆 ..... 罗 明 ( 98 )  
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 ..... 汪 锋 ( 101 )  
谈谈我在绥蒙工作的简况 ..... 白如冰 ( 117 )  
回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 张明远 ( 139 )  
湘鄂西工农红军第四军编制的前后  
变化情况 ..... 张 德 ( 154 )

## 专 访

- 叶剑英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后 ..... 陈 力 (165)  
新疆航空队始末 ..... 欧阳如华 (204)

## 传 记

- 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 ..... 朱 瑞 (217)

## 人 物 介 绍

- 创建闽西苏区时期的邓子恢同志 ..... 蒋伯英 (266)

## · 小 资 料 ·

- 西安事变，红军南下支援抗日友军 ..... (203)

# 陆定一同志向共青团中央报告 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共产 青年团在暴动中的工作

[青年团]中央：

到来[香港]多日了。关于广州暴动，直到这次中共省委全体会开会之后，才能详细报告。

这次中共省委全体会，自我批评的精神表现得非常充分，工人阶级先锋队显示了自己的忠诚与伟大！

## A 现在先谈广州暴动

### 一、暴动的前夜

太雷同志到党中央[开]扩大会时，即已决定广州的大暴动了。当时原定的计划，是认为广东全省的确到了一个暴动的局面。而且工人阶级及一般劳苦民众在军阀纷争之下，的确已经除暴动外没有出路了！在大暴动计划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点，在广州必须由工人斗争为发动，号召总罢工，由总罢工化为暴动。第二点，在全省各路，尤其是中路，以及广州

近郊，必须竭力注意发动群众，把广州暴动立刻造成一个全省暴动的局面，来完成并保障广州的胜利。

那时广州的工人运动复活起来了，伟大的示威运动，以及零碎的经济斗争，是在不断的暴〔爆〕发。但是新军阀方面的压迫也日益加紧，最后竟解散“省港罢工工人委员会”，这是给广东的党以严重的打击。三千熟练的工人纠察队，以及万余久经战斗的工人也因此大半不能参加这一次的暴动。广州的党和团，工作限于罢工工人及已有力量的工会，有几个工会就做几个工会的工作，不谋扩大，不想把工作深入其它工会以及反动工会中去。这些群众，在这次暴动之中，一部分帮着军阀（如广州暴动中机器工会千人，参加反动军队，助军阀反攻），但大部分是表现得很好的。

时机到了，粤桂之争起，第二方面军大部调往西江，广州仅留很少的反动军队；李福林部是在河南，人数甚少，而且素来不能战斗。广州市内仅有第三师一个团。薛岳一团（皆新兵）、炮兵团、教导团等。教导团是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共十一连半，只消在团内解决少数反动分子，就可以完全做我们的武力。我们自己的枪支只有二十多杆，炸弹一百五十。省港罢工工人武装较多，但在暴动前被破获机关，失枪支万余，只剩几十了。

军事上现在的确到了个动的时机了，同时已经有

消息说反动军队要解决教导团。我们以前已经损失了省港罢工工人及纠察队，若是教导团让他解决，那末〔末〕，将没有发动暴动的能力了。为了争取时机，以及不再损失力量，所以省委就赶快的决定十二日暴动。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中共省委对于以前所定计划的两点，实际上是没有办到。第一点关于市郊及外县的农运，虽然暴动的计划早已决定，但因为过去对于此项工作缺少注意，所以虽然派了些人，写了些信，但终是起不上来。这是一个极大的欠缺。第二点关于广州工人应由总罢工而发展成为暴动的一点，因为那时时机非常急迫，总罢工不能等待。并且总罢工必须由零星斗争引起，这种零星斗争，在反动军队的严重压迫之下，只有失败。经过许多失败之后，工人中也有些畏缩的心理，他们这种畏缩是对于无武器的罢工斗争之畏缩。所以不知不觉中就以为发动暴动必须以军队为主力，但暴动起来之后，必须发动广大群众才能保持这个胜利。

现在既然认定发动这暴动必须以军事为主力了，所以必须预先提防反动军知道，以致完全失败（因为反动军队究竟比我们多）。所以青年团想在暴动之前（十日）散传单及演讲，也被停止。

当时中共方面，准备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织革命委员会。太雷专管军事与政治，黄平、周文雍



管理工人方面的指挥（因为周文雍是赤卫队总指挥），另以吴毅（市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为秘书，并理党务。因而革命委员会中无工人分子参加，暴动自始至终是革命委员会领导。市委并决定了苏维埃名单，列十五人，皆广州工农兵的领袖。技术上的准备则非常欠缺。苏维埃，红军总指挥部、侦探、交通、宣传队等都是仓卒组成。赤卫队的编制、枪械的发给，政府的布告（以及印刷），粮食之征集与分配，捕杀反革命及没收其财产之组织，各工会的负责人工作，都未计划到。甚至苏维埃的大印，到暴动第二天下午才刻好。技术准备的欠缺，对于工作发生严重的影响。

军事的计划，发动时以教导团十一连半分配缴各地敌军之械（第三师之新兵一团、炮兵一团、炮兵团、公安局、观音山、第四军部、广九车站）。铁路工人则攻警署并守卫。西关有薛岳的新兵一团，因无兵可派，不能解决（后来此军即于第二日反攻观音山）。河南李福林的军队，则更无我军去解决。全市占领后，立即将枪械分与工人及俘虏，补充队伍，以攻河南。

计划既定，到十日消息传来，西江的反动军队已在调回，反动派已知广州空虚之非计。于是我方不得不更提早暴动日期，于十一日晨三时举行武装暴动。十日夜晚，广州登时戒严，且闻解决教导团的谣言。但至十二时后仍无动静，十二时后街上已经解严。我

们的汽车通行，无人干涉。红军总指挥叶挺同志于十日夜十一时才由香港到省。枪声忽起，大暴动起来了！反动派正在瞌睡中。

## 二、第一步完全胜利

随着第一枪，颈围红带的工人兵士，已经满街发现，唾手而广州市完全占领，只有长堤的战争还在继续。兵士则向西关方面进攻。公安局起先以为是很难到手的，不料一冲而入，毫无抵抗，立刻成为我们的大本营，警察等纷纷弃枪而逃。工人群众平日想枪如想爱人一样，纷纷争取，没有秩序，也无队伍，也无指挥，只向有枪声处跑，加入前线作战。后来把夺到的枪运到公安局散发，工人群众就拥在公安局门口抢枪，汽车一到即空。机器工会革命工人联合会等组织之下的工人也有许多前来参加。据统计，参加这次暴动的工会，有四十三个，人数上万，有编定的赤卫队有两千人。反动工会的工人来抢枪，其中或许一部分是来捣乱的，但至少有一部分是来革命的。此时编制赤卫队以及军事指挥就成了问题。赤卫队在编制方面，以前是依工会而分的。现在怎样呢？可以说事前没有讨论过，临时就没有办法。因为一方面工会是不见了，而且即使有工会，还有些反革命工会下的工人怎样办法呢？另一方面军队是依人数编的，工人却不懂这种办法，究竟还是依人数编呢？还是依工会编呢？结果依

人数编了。这种编法对工人来说是一个突然改变，使工人不习惯，而且因为过去没有准备，不能依次发枪，不能一发枪立刻编定赤卫队。你来我往，编好了上前敌〔线〕，散了又重编，使工作凌乱非常。对于指挥也发生很大的问题，先就一个队的指挥来说，因为工人不懂军事，所以特派军事同志当指挥，但是工人不相信别人，只相信工人领袖。同时军事工作同志，又因语言不通无法指挥。再就指挥的机关来说，红军总司令部是在公安局，赤卫队总部在省政府，两个指挥机关的关系不好。总司令部不能统计现在有多少力量，以及他们在什么地方，自然调动上计划上发生困难了！同时总司令部的组织又不好，什么人来就直接找总司令，请枪也问他，什么都问他。总司令不在的时候其他人也随便，自由指挥，自由调动，更弄得军事上无头绪。技术工作的不好竟牵连得这样大！

在这种情形之下，工人就自由作战，有的加入前线，有的徘徊十字街头。加入前线的工人赤卫队非常勇敢！即兵士及军事工作同志，亦自叹弗及。但是因为技术上的训练缺乏，所以往往错打自己人，及有许多无谓的牺牲。

关于赤卫队的问题，恽代英同志曾与我们私人谈话，他的话是值得在此地写出来，以为后来的经验的。他说，赤卫队的编制在暴动开始时最好仍依党的方法，

依工会来编。指挥赤卫队的人，仍须工人领袖，但派军事工作同志，做他们的“参谋”。这是非常之对的。（省委对广州暴动的决议案，亦指出改编工作方面的错误）

除了工人之外，农民也起来参加。虽然市郊的工作做得不好，但黄沙及石围塘农民占领东站，广州市有几县逃难来的农民（他们的房屋被地主烧成焦土），此时自动的组织起来向公安局领枪，但也没有枪了。农民之外还有俘虏的兵士，经过一番演说，也高兴来加入战线。这种俘虏，在军事技术上当然比工农好，一切编制调动的困难也少，但是已无枪给他。不过这些俘虏的农〔兵〕士，多少总是受过军阀的影响，虽然高兴革命，使用时总有些不逞〔称〕手。例如我们进攻河南的时候，河南李福林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只要我们对他们多轰几炮，他们就可以逃之夭夭。但是掌炮的那个兵，死记死守一条规则：“城市巷战不用炮”，所以他就始终不肯向河南李福林军开炮。

关于军事方面的还有两点，索性说尽了吧！第一是反动海军之无用，站在旁边不敢动作。第二是那时帝国主义者曾向李福林提议，由他们代为夺回广州，夺还之后，交给李福林。但李福林不敢答应。

其次，讲到苏维埃。本来市委已决定十五人的名单，广州工农兵的领袖非常有号召力的，但是一个苏

维埃十五人当然不够，并且必须以群众大会通过。于是十一日下午就召集群众大会来选举苏维埃。在这样军事紧急的时候，群众拿着枪上前线去了，所以开不成功。但是政府是不能不成立的，于是还是成立起来，名单是苏兆徵为主席（苏未来时由太雷兼），海陆军太雷，人民及外交黄平，工人周文雍，农民彭湃，司法陈郁，经济何来，秘书长恽代英，红军总司令叶挺，肃清反革命委员会杨殷。其中的错误，依现在看来是没有广州本地的工农兵领袖，因而不能更多发挥号召作用（广东籍的仅有苏兆徵及何来，皆海员工人）。二是没有没收财产委员会及征收粮食委员会。后来，征收粮食的工作，因迫于环境，无组织地做了一些。三是整个的组织事先没有规划，临时非常混乱。

先说整个的工作方面，苏维埃亦设在公安局（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另在一处），公安局在当时自然是最热闹的地方了。苏维埃事前既未准备，又无组织，又无办事人，又无办事范围，所以结果一切问题都集中在他身上，工作方面就凌乱了。苏维埃成立时由洋人（德国人耐曼）起草了一个宣言式的东西，拟用作为第一张的布告的，但是因为原定的印刷地点是西关，当时西关未收复，好容易派人去拿出几百张。而且印刷的字不是大字，而是从前《向导》报题目用的二号字。这“宣言”的影响并不重大，民众不以为是一个行动的

政纲，而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宣言。此后政府即没有出什么重要的布告，如关于立即执行捕杀反革命，没收财产，以及政纲之实行等。所以工人同志批评苏维埃说一张布告也没有，政府的布告的确是此后暴动中应当严重注意的。

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可说全无工作，一张布告也没有出，民众不知他在何处。

组织上更无办法的一点，就是人材的缺乏。各种工作要有许多人来做，但是党的同志到那时完全自由行动起来。分配他的工作他不做，有的捐着枪往前线上去了，有的躲在家中不敢出来，也是显出党的薄弱与纪律的废弛。

### 三、发动群众的工作

关于宣传暴动，以前组织了一些宣传队，数量方面当然是非常不够的，而且工作也做得不好，仅公安局附近有些演讲，其他地方寥寥无几。传单标语极少，传单的印刷，青年团找到六个印刷机关，直到十二日才印好十万张，没有来得及发出。

搜捕反动派及没收财产，这两件事苏维埃政府可以说没有决心，并且没有意思去做的。先说搜捕反革命。苏维埃政府没有严厉的布告，对重要的反革命随捉随杀，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亦无布告，民众不知道在那里，所以民众不敢擅杀。捉到了反革命分子，除一

小部分自动处置外，其余都送到政府里来。除了几个人立时在“枪毙”二字之下处理掉以外，其余认为形迹可疑的就关起来。小小公安局关了二百多人，这些人，此后无从审判，因为捉他们的人已不知去向了。太雷见了这种情形，就下令完全枪毙，那时已是十二日了。但是命令下来，找不到执行的人。后来说交杨殷办，终于又被别的事挂住了，一二日未办。太雷死，此事更无人提及。反革命军队一到，这批反动分子做响〔向〕导来捕杀我们的人了！最可惜的，在暴动初起时，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等一批重要人物都在东山居住，那时若派极少的赤队去就可以把他们结果掉的，但是全未办到，任彼漏网。重要人物，只有那青年团杀的几个L.Y.领袖。反革命被杀者一共约百人左右。

至于没收财产，是一点也没有做。当时一方面固然是军事忙碌，但同时有一个心理，以为现在暴动成功，将来要什么是〔有〕什么，所以就连一点也未做。政府自己不做外，并且在一般人民中，政府也不去发动他们起来自动没收，以至连枪毙了反革命之后的手上金戒指都没有人拿。不过政府及革命群众虽然未做，趁火打劫的“浪仔”们却挂了红带子自动抢东西，所以仍有小铺子受到劫掠。至于大铺子及银行等，因铁门不是“浪仔”们所能打开，反无损失。中央银行是延烧而毁的，但金库未动分毫。关于没收财产及捕杀反革命

派的事件，第一认清这是发动群众的好方法，苏维埃不组织没收逆产委员会，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之怠工，以及没有严重的布告，都是很大的错误。第二民众自动捕杀反革命，是否怕有报复错报等情形呢？我们认为这是免不掉的事，但究竟很少，而且若是不鼓起群众自动捕杀，一方面则政府将没有办法（不能审判，不能执行），另一方面是失掉鼓动群众的一个最好方法。政府一方面应组织特别队伍来做此事，同时任何革命者都有杀反革命和告发之权。至于没收财产，也有几个意见。一则以为有人要抢掠，二则以为暴动胜利，横竖一切都是我们的，三则恐怕影响前线战士无心战斗，再有一点更重要的则是没收财产，还是群众自发的没收呢？还是有组织的没收？我的意见认为如此：我们必须先认清为何没收反革命财产？有三方面，是表示工人对于统治阶级寝皮食肉的愤恨，一方面是摧毁反革命的经济力量，一方面是充裕自己的财政：因为是表示工人的愤恨，所以不必工人个个都去没收，才算是自动的没收。政府没收了，工人知道了一定可以更增勇气，更增快感。再此〔者〕尽可做有组织的没收，归给政府，前线战士只会受好的影响，不会受坏影响的。有许多政府所顾不到的地方，工人可以告发或自己没收交给政府（必须出这样一张布告）。许多小的抢掠，一定免不了，也不用避免的。既然没收的行动



对于工人有好影响，所以必须立刻没收，不能说：“已经是我们的”的话。（暴动时赋与〔予〕各工会农会等团体以捕杀反革命及没收财产之权，是应组织他没收财产与捕杀反革命的好方法）。

#### 四、西关之获得与敌人反攻

十一日下午我们已占领西关了！工人在战斗中表现出他勇往向前的精神，牺牲是很大的。

那时的环境，一方面是河南的敌人尚未肃清，各处敌人的反攻虽然还未到眼前，但是期在不远。各路反动军队都已兼程前来，军事形势更加紧张了！

那时的工作，是集中在编制赤卫队，想以工农俘兵，与教导团组成一师至二师，但是因为指挥的混乱，以及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新的广大群众继起参加暴动，计划迄未实现。

是夜，太雷、黄平与洋人等开了一会，洋人批评军事上之不敏捷，应当乘胜以全力援西关河南。叶挺因为到省很迟（暴动前三小时），所以有许多事情不清楚。徐光英（参谋长）更是表现得非常糊涂。于是以太雷为红军总指挥。太雷对于军事是外行，但对于我们军队的情形，是比任何人懂得，可惜少一好参谋！

农民中工作之不好，以致到现在不能起来响应，使军事上失去了一个很大的帮助。广州暴动虽然这样惊天动地，轰轰烈烈，但四郊农民，仅占两个东〔车〕站，

杀了一个地主。对于发动农民事前未注意到，暴动起来之后，也未努力设法去做。固然客观上有许多困难。

十二日上午依然是进攻的形势。到下午四方八面的警报渐渐紧急起来了。民团，薛岳的新兵，由观音山反攻，冲锋到厚祥街（近赤卫队总部）。周文雍即离总部，而工人一点也不退却，拚命与反动军队作战，竟把他击败，重新占领观音山。但是观音山的一带路上，时有敌人的枪子，时太雷及洋人由群众大会乘汽车回来，在四牌楼遇到敌人，太雷及车夫死在车中，洋人不知怎样脱险回来。广州的汽车夫，虽然生活是优越些，但是这次参加最[暴]动非常热烈。有许多因开汽车而被打死。

太雷既死，军事失去了中枢，无人可以接他的手，徐光英非常畏缩，那能在艰难困苦中处理这样混战的局面？

## 五、溃退与屠杀

当敌人冲到厚祥街时，公安局仅留恽代英同志一人在指挥。太雷死了，以及敌人被我们打退的消息，他都没有知道。忽而黄平、吴毅回来叫恽代英快走，他们两人就预备在此地拚了。原来他们两人之匆匆回来，还是听到赤卫队总部被占的消息。赤卫队总部与公安局相隔不远，总部既然被占，公安局当然非常危险了。所以他们想把恽代英[保]留下来，而自己就在此地

拚个一死。但是实际上那时敌人已被我们重新打退赶到观音山去了。

到晚上洋人始到公安局，黄平与洋人开会时，证实了太雷的死耗。同时四方八面消息更形紧张，并且有敌人十五分钟即到公安局的消息，那时退路也想不到。洋人就说现在情形既然如此，党及工农运动的负责人可以暂退，留军事同志在此指挥，看形势再说。因此黄平、吴毅等即退回秘密地址中去了。这是广州暴动中最后一次会议！

赤卫队及兵士仍不知敌人已到眼前，依旧在前敌打仗及在街上守卫，颈上围了红带，胜利而且得意。支持了一夜。吴毅始从秘密住所中跑出来。及至十一时，市内已发现了敌人，下午三时敌人占了公安局。

敌人兵队的怕我们，也是非常利害。经过几次战斗，已认识了工农的勇敢了。观音山上的敌兵，看见公安局的大红旗，不敢冲下来，用炮将红旗轰倒了才敢下来。马房里的马他们不敢公开的来抢，而悄悄的来偷。十一时进了广州市，三时才敢跑进空无一人（除了二百反革命以外）的公安局！

敌人入市之后，对于毫无防备的工农兵士，就大施屠杀了！到处是枪声，到处是死尸，几乎是见红即杀！广州市登时血流成河！除千余工农兵士向北退走之外，同志牺牲者二百余人，赤卫队及兵士牺牲者两

千余，民众更不知死了多少！

这一个退却与大牺牲的责任当然完全应由指挥机关负责的！第一，指导机关完全不能估计敌人与自己的力量，就仓惶退却。第二，退却也没有一个决议与计划，群众完全不知道。第三，指导机关于十二日晚听到不确的报告而退走，直到次晨仍无退却的命令与计划。在敌人军队摇动，我们的力量还强大的时候，至少是尚可一战的。而且这个一战，我们若拚死在战时向兵士做些宣传工作，甚至可以得到胜利的。即使不能向前进展，退而自守，也只要巷战的技术布置得好一点，也至少可以维持一个相当时期。再不然立刻召集部队，实行退却，也不至损失得如此其大，更不然即集合这次牺牲掉的二千数百人也可冲出条血路，不致全部覆没！至于退却时没有做一个大的破坏，没有将统治阶级的命脉加以根本的打击，指导机关虽然有拚死的心，但人民还是受了空前的大损失。

从十三日起，搜捕屠杀更是加紧的进行，国民党军阀，以种种酷辣的手段，施之工农。总计屠杀之数在五千以上！每天枪毙惨杀的总有千人以至四至五百之多！国民党撕下了人皮，变成一支〔只〕狗，现在连狗皮都撕下，露出它吃人魔鬼的本样了！搜捕之中负责同志未有损失，洋人亦安全的。

## 六、影响

固然他在战略上做了部分错误，但他对于全国工农兵士的伟大影响，给革命的胜利以极大的促进。

(一)军·阀·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尤其是广东从前还是一个军阀的统治，现在呢，桂系、蒋系、粤系（张发奎）、范石生、方鼎英等几派，互相勾结，互相角逐。在整个的青天白日旗之下，促成了蒋桂二系之大分裂，战争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军阀更加露示〔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广州暴动之后，大屠杀不断的进行。广州已经恢复了商团（现名街坊白卫团），军队中已取消政治部。一切民众运动都被禁止，反动组织亦受摧残（如广州的革命工人联合会，系L.Y.的，亦被解散）。对俄绝交也已实行。

(三)社·会·的·破·产·更·加·急·剧。因为战争的缘故，苛捐杂税增加，纸币跌价（广东的中央基金已被提尽，现跌到四折），拉夫，派饷，奸淫，掳掠更加利害。因此而工商业日益萧条，物价惊人的腾贵，帝国主义更利用他的特权进行侵略，豪绅地主资本家利用时机剥削工农，禁止工人的斗争，取消一切改良条件，减少工资增加工时，盗匪日益增多。广东现在遍地是匪。

(四)军·阀·的·统·治·日·益·衰·弱。因为战争的关系，军队统统集中了，因此外县及乡村的反动统治更加薄弱。有许多县份，仅有几十支枪，连防土匪都不够。

(五)工·农·群·众·革·命·情·绪·之·更·加·高·涨。广州暴动更

使民众知道，他是能够夺取政权的，并且更知道暴动夺取政权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尤其在这军阀与豪绅资本家压迫屠杀更加严重的时候。广州暴动失败后，广州的工人仍有斗争，现在且在准备大规模的反抗封闭工会的示威。杨××同志由南路回来报告，说那边十七日听到暴动消息，农民非常高兴，说自己也要暴动；统治阶级及帝国主义惊惶非常，特别戒严；后来失败的消息一到，农民毫不表示灰心，因为叶贺军队之事件，已经告诉他们失败不是什么一回大不了的事了。广东各地的斗争在这次暴动后表示得加倍急剧，民众更认得清楚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分别。

(六) 反革命军队之动摇。反革命军队之动摇，只就一件事就证明。暴动之后张发奎的军队退向东江时，有两团人哗变，自己投奔海陆丰去了！这件事，省委事前并不知道，乃纯系自动的行为。广州暴动给兵士群众以极大的影响，在官长方面，引起了新旧两派的饭碗问题，旧派骂新派为共产党，稍为左倾的都不能存身，自然只有向我们方面跑。但是若果我们现在不注意这件事，将来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国民党的腐化，就是由于许多军人的投降，弄得军权高于党权，要去掉这个危险，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以及党代表制，在广东是极迫切的需要实行了。

## 七、尾声

无论如何，广州暴动是中国的巴黎公社。广州的暴动是中国大暴动的开始，也是广东暴动最重要的一幕。广州暴动证实了中国革命的无间断性，证实了党的政策确为群众所接受。

广州暴动虽然败退了，虽然有了莫大的损失，但是给我们以无限的教训！广州暴动的教训，乃是血的教训，乃是最重要的教训！无产阶级将接受这个教训，不久的将来，再表现出他更进步的“艺术”出来！送反革命上西天去！完成历史上最伟大的任务——中国革命！

## B 现在我说一说青年团在这次 广州事件里的工作

青年团长期处在和平环境里，对武装起义不能适应。暴动以前青年团的工作，九日组织了七十余队的宣传队（三人一队），全系学生。本来想于十日在长堤一带讲演写标语等。后因中共省委不许未做，仅在几个学校内及其附近张贴与写了些标语。同时组织少年先锋队，把几个比较忠勇的同志编成，谈不上全体同志参加，更谈不上广大的青年群众参加。后来又决定在十一日的夜里（暴动本决定是十二日）在几个学校里杀 L. Y. 分子，及夺取学校警察之武装。至十日夜间，始知暴动时间已提早至十一日早晨，即刻出外通

知，工人区一个人也找不到，学生区找到很少。那时他们尚不敢行动，直到听到枪声，方才开始动作。L. Y. 分子早已逃走，警察已弃枪而去。仅捉到很少的反动派送到苏维埃政府。许多因监守不严逃了，其余后来也放了。此时才召集同志，编少年先锋队，出发没收汽车等（不没收财产）及捕人。十一日毫无秩序的闹了一闹。领得二十支枪，并缴（实际上是“收”，因为警察早已逃了）得多少枪，因为同志找不到，没有人拿。十一日晚上，少年先锋队之数十人，住宿于公安局旁之某地。时广州形势比较很好，所以连步哨亦不放。十二日晨起身后正在商议出发，一派主张早些，一派恐怕与红军误会主张迟些。同时刘××又跑到〔来〕报告说今天一天至少可以无事，孰知报告未完，枪声四起，不久“白军”即入市矣！

不过有几件事比较是差强人意的。一则是他们还自动杀了 L. Y. 领袖，并且用共产青年团名义出告示宣布其罪状。二则是他们占了几个印刷机关，印了十万传单预备十三日发的，但未发出。此外还想召集青工大会等。但在青工中过去既无什么工作，连同志也找不到，即使有时间开青工大会，也是不会成功的。

最后说到团的情形。

我相信若是这次不亲自来，决计料想不到广东的团是这样病得利害的，爽快的说一句，以前广东是没



有适于战斗的团的组织的!

跑来一看，省委的零乱，负责同志工作之无秩序，无目标，无计划，组织之松懈脆弱，此地的工作，要从A B C做起。

所以如此，原因似在于“四一五”之后，省委是始终未做工作，组织未去收拾，工作毫无。一般比较好的同志，无路可走，连十三岁的也跑到党里去了。由此发生了取消主义，而取消主义是使病态再深一层!

扩大会以前的情形，各地团部与党是不发生关系的，一切由党包办着。团简直不参加党的会议（因为党不要），所以参加意见，甚至坚持意见等精神，在此地是没有的。即每一件事情发生时（如广州暴动）党与团的分工也无规定，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好在那时广州青年团同志只剩几十个，否则非但是一个大损失，而且还要闹大乱子呢！省委的关系也是如此。党团以前从来不相往来，青年团省委就好象在世外桃源“不知有汉”了！

至于外地的组织，现在尚有五千人。但是好象年久失修的机器一样，要修理过一番，才能使用。同志只有个人的忠勇奋斗，组织两字谈不上，支部更是糟糕。我们只要看广州暴动成功后，连同志都找不到。我曾与香港的一个船厂支部书记（很重要的支部）谈话，虽然很简单，但知道他们四十多个同志连开会都不高兴。

可以想见其他省委从未过问的地方，是怎样危险的了！

××同志来了以后，一切的工作，才开始做起来，与各省委的关系，因为他个人而发生了，工作也部署起来了。

广东的负责同志们，在这次扩大会中，以及我与他们有接触的地方，都表现得很努力，而且很懂得。

党〔的〕负责同志，大都是团员出身，对团的观念〔是〕很好的。我相信在风暴中的广东青年团，只要大刀阔斧的干去，一定可以很快的起来！

广东组织的分布：潮梅一带三百余，都是知识分子（那边与闽南一样，无雇农贫者，都到南洋去了）。在东江一带仅海丰为最好，一千七百人（此乃十月份数目，预备年底到三万人），陆丰一百六十六人（十月），其余的组织情形不知。中路广州最近坍台，各县多在原始状态中。西江、北江甚单薄，有组织之地甚少，人数每县十余。南路方面同志尚少，然肯艰苦奋斗。据说南路问题为广东最难解决之问题，因为那边多土匪，游勇流氓，党同志不好，有抽大烟的。琼崖即琼山、文昌二县，团员已有二千人，一区至少有二千五百人。但取消主义已在实行。而且从前的工作建筑于反对客军等非阶级口号之上，连“国民党反动派”都不知道，是大成问题耳！

省委扩大会开了两天，有党中央代表报告（他更注重组织），团中央代表报告，团务报告，党省委代表报告。决议案中有1、听了共产党（C.P.）中央报告与省委报告决议案。2、听了青年团（C.Y.）中央报告决议案。3、目前任务决议案。4、告全国同志书。5、士兵工作大纲。因为没有预备，所以决议案都是当场起草（除士兵工作外）。时间很不经济。报告及决议案的次序亦颠颠倒倒，对于目前工作等，讨论时无人发言，看出大家心中无底。

十二月廿九日

注：文中〔 〕里的字，除开头两处外，其他系编者所加。

## 后 记

给团中央的这个报告，原来的题目是《D. Y. 同志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 C. Y. 在暴动中的工作》。这个报告是一九二七年底我在香港写的，距今五十六年。

广州暴动的消息，十二月十一日就传到上海。

同日，团中央派我急速起程，去参加广暴。名义是团中央巡视员。我是坐一艘货船去香港的。船到香港，广暴已经失败。党和团的省委员会人员都到了香港。我同他们个别谈话，了解情

况。十二月中，因原省委书记张太雷牺牲，党中央派了李立三为省委书记，召集中共省委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从各同志的叙述中，我才能写出这个报告，寄给团中央。这个报告，反映了广东省委负责同志的发言和意见，没有加以夸张和隐瞒。

我自己当时的看法，不论对的错的，这里都不加改动，以存当时的真相。

但是，并不是说我对广州暴动知道一切了。我对于重要的事情还不知道。要感谢周恩来同志，他说出了最重要的事情。

请大家读读《周恩来选集》上册 174 页：

“第六，广州起义。这时正是反革命猖獗的时候……当时正是汪精卫继李济深之后统治广州，汪精卫要解散罢工委员会。工会还有一部分武装。跟张发奎从武汉回到广州的教导团的一部分，已由叶剑英同志当了团长，叶剑英同志说他们也将要被解散。同时，张发奎的军队正好开去挡黄绍竑去了，如再等一个短时期，他们就会调一师兵力回广州解散工会和教导团。我们乘这空子把部队拖出来，并且根据情况估计，要起义是可能的，但坚守不容易。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Newmann 此人我后来在莫斯科看见多次，是台尔曼的很亲密的助手，常在台尔曼左右。后来希特勒上台，台尔曼同志被捕，最后被杀害，英勇牺牲。纽曼的下落，我就知道了。——陆注），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同志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

大的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我还要说，周文雍、吴毅两同志，后来被党派回广州，恢复工作。他们都英勇牺牲了。派他们回去，是不适当的，因为他们在广州熟人太多，极易被捕牺牲。

我在香港写了这个报告之后，奉团中央的指示，到海陆丰巡视。也写过一个关于海陆丰的报告，这个报告在党内团内流传较广。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就算现在这个报告，也是从故纸堆里找出来的。因为署名是 D. Y.，许多同志不知道这是我给团中央报告的笔名。对找出这个报告的同志，谨表感谢。

当时许多同志的名字，凡能记得的都写上了，不记得的，只能空着。

陆定一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晨二时 北京

## 第二个后记

一、L. Y. 是什么组织？确切的中文名词，记不起了。它的历史很短。回想起来，大约是汪精卫派的青年组织。L 是“左派”，Y 是“青年”。汪已经是反革命，L. Y. 也是反革命的组织。

二、广州起义，一九二八年六大称为“退兵时的一战”。当我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这个报告时，还没有这个称呼。

现在，事隔半个世纪，可以回顾一下：

在整个民主主义革命中，我党领导过三次城市暴动，时间都在一九二七年。（一）上海三次起义。反对北洋军阀毕庶澄，迎接北伐军。蒋介石亲自指挥下的北伐军坐视不救，起义还是成功了。北伐军到上海后，实行“四·一二”大屠杀，背叛革命。（二）南昌起义，以革命军队为主力，反对蒋介石、汪精卫。（三）广州起义。以后，是二十二年的农民战争，再没有城市起义。即使李立三，特别是王明集团，主观上想搞，也没有搞起来。王明集团垮台之后，全党遵循毛泽东同志“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直到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全国城市一下子一一被我占领。解放了全中国的大陆，只剩下台湾一省。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种战略方针，在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是没有的。这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果然，世界上许多（不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照此办理，取得了胜利。

三、广州起义中，为什么我方对李福林军不开炮，而国民党军队却能对闹市中的我方开炮？

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我军有一个迫击炮神枪手赵成章，他的迫击炮在各种地形上都能百发百中。他是在战斗中被我军俘虏过来后加入红军的。在我军抢渡大渡河的战斗中，我们只有一只小船，对岸有敌军。我军突击队乘船在敌前过河，必须压制敌人火力。赵成章只有三发炮弹。团长命令他，必须打中对岸敌人，否则“提头来见”。赵一发中的。赵后来入了党，觉悟提高了，讲起这件事，他说，如果没有“提头来见”的命令，他是打不中的。因为旧军队里当炮兵的，认为杀人是作孽的，有了命令，“提头来见”，那么，作孽就不是由他负责，而是由上级负责了，所以非打中不可。赵成章同志在全国解放后，担任过炮兵

副司令，教出了很多神炮手。

广州起义中，我方的炮兵（俘虏）所以不开炮，敌人之所以能叫炮兵向闹市开炮，也许由于我们当时还不懂俘虏炮兵的这种“心理状态”，而敌人却懂得吧。

指挥炮兵，要懂得他的心理状态。别的事情也一样。我们现在的工作千头万绪，许多事情对我们还是陌生的，人员也是不完全熟悉的，所以上述的事，值得借鉴。“外行领导内行”，领导不动，应引以为戒。要当领导，必须学习，使自己成为内行。

陆定一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一日于北京

# 北伐纪实

肖劲光

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一次合作。一九二六年在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之后，开始了著名的北伐战争。五月二十日，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锋，出师湖南；七月，国民革命军八个军约十万人，兵分三路出征，以实现孙中山的遗愿，打倒帝国主义扶植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封建军阀势力。

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进行的。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努力合作，由于共产党员的不怕牺牲、冲锋在前，依靠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依靠各地党组织发动的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国民革命军攻武汉、克南昌、下南京、进上海，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

北伐战争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战争。参加战争的各派、各种政治



势力都有不同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工农群众和国民党左派，是为着反帝反封建；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则力图通过战争发展个人势力。因而在战争中，国共两党之间，国民党内部左中右派之间，各军队派系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政策，向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我们的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之下，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我作为一个北伐战争的亲身参加者，每当回首这一切，总似有“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之感。彼时的形势，象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江，既有奔腾咆哮，一往无前的气势，又有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场面。而革命的航船，既有劈波斩浪，顺流而下之雄壮，又有陷身于激流漩涡中之危急。我觉得，把这一幕内容丰富的活剧如实记下，留给后人，是颇有意义的。然而，由于时过境迁，有些回忆不尽准确。也难免挂一漏万。同时，由于自己在一个师里任职。也只能就自己的亲身经历，反映整个战争的一个侧面。不尽详实之处，还望知情者给予补充。

## 一、来到六师

一九二五年秋，我接到党的通知，与毛泽民同志一起，离开了安源路矿工会，经上海来到广州。在广州，最先见到的是党派来接我们的陈赓同志。他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当时是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的秘书。开始，我住在东山，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了联系，在其领导下做些工作，当时的省委书记是陈延年同志。后来，周恩来同志又接见了，与我谈了话。不久，调我去国民革命军中工作，正式任命为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还授了中将军衔。随即去韶关任职。

二军的前身，是谭延闿的湘军。这支部队是在一九二三年谭（延闿）赵（恒惕）战争后，从湘军内部分化出来，南下广东依附于孙中山的。一九二五年冬，接受广东革命政府的统一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鲁涤平任副军长，军、师各有一名苏联顾问。下辖四、五、六三个师及教导师。由张辉瓒、谭道源、戴岳和陈嘉佑分任师长。还有一个炮兵团，团长是谢慕韩。谭延闿当时是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那个时候他还属于国民党左派。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便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这一

制度是孙中山、廖仲凯学习苏联，在黄埔军校首开先例的。由于旧军阀部队受地方主义的影响较深，为了方便工作，所以我党派往第二军做党代表的李富春同志、四师党代表李六如同志、五师党代表方维夏同志和我均是湖南人。方维夏、李六如同志当时已是湖南久负盛名的革命前辈了，而我却是一个娃娃，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

我到六师时，六师的师长是戴岳，副师长是朱耀华，有一个苏联顾问叫米柳史切维奇，我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团：十六团团团长黄友鹄，十七团团团长廖新甲，十八团团团长刘风。还有一个特务连，一个机枪连，直属师部。戴岳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一九一六年曾在天津参加过秘密倒袁活动，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思想，在政治上主要是紧跟谭延闿。我初到六师时，他向我表示拥护三大政策，与共产党合作，支持政治部的工作。他们那时对政治工作并没有多少认识，但感到政治工作可以使士兵积极，博得民众支持，确实帮了他们的忙，所以也是赞同的。在北伐战争期间，我们基本上能相互尊重，协同指挥，合作得是比较好的。但在后期，他逐步看到共产党政治工作的威力，出于戒心和防范，派了他自己的一个秘书到政治部工作，准备取代我们。蒋汪合流后，也就倒向了国民党右派。直到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逃往台湾，

他留在大陆。湖南解放后我们在长沙又见了面。二十年沧桑，他感慨万千。

我到六师后，即着手建立各级党代表制度，组织政治部。那时我们党内曾有明确指示，就是共产党员不当军事指挥官，在部队不设党支部，不发展党员。主要任务是做政治工作，宣传国共合作，宣传反帝反封建，改革部队旧的军阀制度，扶助地方工作，团结这支部队，使之不断的革命。所以，公开的共产党员都是做政治工作的。师里设有政治部，除了我兼任政治部主任外，还有一个秘书姓沈，是共产党员。政治部设宣传科、党务科，记得党务科科长姓李。还有一位姓何的科员，是共产党员，北伐期间曾多次留在地方帮助筹建国民党县党部。还有一个宣传队，多由青年学生担任宣传员。团、营、连各级都设有党代表，叫政治指导员，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军官。这些同志绝大多数我已叫不出名字了，只记得十八团的党代表叫谢华。他们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的各级组织中，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但他们为革命做出的贡献，人民是永志不忘的。党当时着重强调的方面，是以团结合作为主。我们下边工作的同志，虽然对党的一些指示（如不当军事指挥员、不设支部、不发展党员）有些不同的想法，但那时年轻，认为是党的指示，也

就不提什么意见。实际上，为了开展工作，师里设有秘密支部，也开会过组织生活，研究一些党内的事情，传达党的指示，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党员实际上也发展了。这些都是秘密的。北伐前，二军各级组织中又补充了大批政治工作人员，不少是我党有计划地派进来的党、团员，成为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那时，在国民革命军中，除了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以外，二军政治工作人员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六师中的官佐，大部分是旧军官学校出身，军阀习气较重，拉帮结派，欺压士兵。士兵中大多数是家庭破产的农民、工人和流氓无产者。他们当兵吃粮、雇佣思想严重，又沾染了不少旧军队的恶习。官欺兵、兵扰民，纪律很差，战斗力也较弱。因此，我们到部队后，首先抓了这么几件事：一是宣传三民主义，主要讲解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道理；二是宣传孙中山的遗嘱，以灌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三是对部队实行民主改造，实行经济民主，不准扣兵饷，不准“喝兵血”，废除肉刑等封建制度，提高士兵执行纪律的自觉性。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和各级政工人员、共产党员，经常深入部队，主要做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教育工作，使他们觉悟、进步，成为发展革命力量的基础；对同级官佐主要做团结工作，在团结的基础上给以革命的影响，争取他们。经过教育，大部分下级军

官和士兵了解了自身所处的地位，了解了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意义，逐渐懂得了为什么打仗的道理，有了初步的革命要求。特别是部队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肉刑、体罚、不打不骂士兵，不吃空额，不“喝兵血”，成立军需委员会，经济公开后，士兵们精神焕发，积极性高涨。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有了改善，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纪律也严格起来。当然，在当时要想对部队实行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军阀部队很讲帮派、义气，动他一兵一卒都行不通。但进行这些改造，能使部队打胜仗，所以从上到下还是受到欢迎的。军官们感到政治工作有威力，也尊重我们的工作，愿意与我们合作，整个部队面貌有了改变。不久，我们就出师北伐了。

## 二、出 师

北伐军第一期作战计划是出师湖南、湖北，以消灭吴佩孚为目的。准备在两湖取胜后，再向长江中下游发展，消灭孙传芳的部队。尔后视机向长江以北发展，消灭张作霖。具体布署是：以四、七、八军担任湖南战场的正面主攻；二、三军为右翼、策应正面，监视江西的敌人；六军和一军的一、二两师为总预备队。兵力如此配置，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由于唐生智

的八军在湖南倒戈反吴，考虑到其与二、六军过去因谭赵战争时的旧怨未解，不宜协同。而四、七军则与八军同属保定系，关系较好，且兵力较强，共同担任主攻，易于协同。至于一军的两个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配置为预备队，以保存实力待机行事。因此，在国民革命军内部，从北伐战争之初，就是矛盾重重的。

我们六师和四师于七月七日从韶关出发（五师留守南雄，担任广东方面的警戒任务），沿仁化、城口、汝城、桂东、酃县北进。七月中旬，按照总司令部的命令，集中于茶陵，任务是监视江西，策应醴陵。一路上基本没有什么战事。部队作为正义之师初上征途，士气高昂，纪律也比较好。我们除了行军外，按照军里的宣传大纲，继续不断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激励他们认识自己肩负的光荣使命。这支部队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全体官兵都加入了国民党，当时叫做以俄为师，实行“军队党化”。因而各级都设国民党党部和党小组，党部有执行委员，党小组有正副组长，强调“注意党的工作”。这实际上多数成为我党做公开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那时，每天早上队前要背诵“总理遗嘱”，每驻军三日要举行党小组会议，每周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开周会，主要官长要进行讲演，反复宣传三民主义，以孙中山的遗嘱号召全体官兵勇敢战斗。出师以来，部队还特别强调遵守纪律。我们六

师还曾以“不怕死，不扰民”制定官兵的臂章，强调革命军是为救民于水火之中而出征的。要求不扰民、真爱民，搞好军民关系。对于严重违纪的就给予坚决的处分。如部队过汝城时，十六团团团长黄友鹄私自向地方抽税二、三千元，就受到撤职处分。当然，对于一支始经初步改造的国民革命军来说，是不能以人民军队的标准来衡量的。

北伐军挥师北上，第一次做为革命军汇合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从中受到的鼓舞和教育，是非常之大的。从出师以来，北伐军每天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的支持。人民相望于道，箪食壶浆以迎，送信带路，倾力相助。特别是在茶陵，给部队教育至深。因为这支部队当年作为湘军时，就曾在此地驻防。那时由于军队纪律不好，打家劫舍，无恶不作，老百姓闻风避之，侧目而视，深遭民众痛恶。在湘军离湘赴粤时，已是孤立无援，红薯煮饭，风餐露宿，生活十分困苦了。而此次作为革命军旧地重返，官兵还是当初的那些人，但由于政治工作的作用，纪律严明，扶助农工，受到民众的欢迎和礼遇。官兵们第一次感受到唤起民众的力量，感受到正义之师的光荣，无不感慨万分。连鲁涤平都说：“我们此次出发由广东到茶陵，沿途可见这种欢迎。并不是因为我们初到或官大或害怕我们，不得不出来应酬一下。确是有意义的，



确是认识我们是真正保护他们，为他们谋利益谋解放的，是很诚恳而出于自愿的……这是何等荣幸的事。”然而，他们所不甚明了的是，这些人民群众出来欢迎、支持、援助北伐军，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领导和发动群众的结果。

出师以来，政治部的工作也特别活跃。每到一地，便派出宣传队上街贴标语，组织演讲，宣传民众。师政治部与地方联合召开规模较大的军民联欢会，大造革命舆论，向人民群众宣传北伐的意义，宣传组织起来加入革命的道理。改组当地的国民党党部，成立群众团体，斗争土豪劣绅，扶助工农群众。沿途均留下部分政工人员指导工作，组织民众，有的则参加当地的国民党党部工作。工农运动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而北伐战争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向前发展。对于革命的政治工作，部队中大多数官兵是乐于接受的，但也有一些人说怪话，如说政治工作人员是“卖膏药的”。对此，我们除进行教育外，广大政治工作人员以身作则，战斗中身先士卒，用本身的模范表率作用，影响广大官兵，逐步改变许多人的看法。总的来说，北伐之初在六师中，我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表现并不突出。

在茶陵休整一段时间后，随着战局的变化，部队便向赣西进军了。

### 三、进军赣西

在北伐军的四、七、八军汀泗桥、贺胜桥大破吴佩孚主力，兵临武汉之时，战局发生了变化。占据闽、浙、赣、苏、皖五省的孙传芳，改变其坐山观虎斗的方针，调兵遣将，以十万大军入赣，妄图利用江西这一“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战略地位，一箭双雕，既打退北伐军，又赶走吴佩孚，以收渔人之利。孙传芳的这一举动，严重影响两湖的战局和广东后方的安全。因此，北伐军第二期作战计划是以江西为主攻战场，消灭孙传芳。兵力部署是：第三军和第二军四、六两师自醴陵、茶陵、攸县进攻赣西；六军和一军一师向赣西北进攻；新收编的赖世璜部与南雄、汝城的二军五师、五军四十六团进攻赣南，牵制敌人。

九月六日，总攻击开始，我师十七、十八团参加萍乡之战。十六团则由朱耀华副师长（兼十六团团团长）率领从茶陵出发，负责驱逐莲花之敌。当时，萍乡有敌唐福山、张风岐部共六、七千人。然而，由于北伐军声势逼人，锐不可当，敌人胆战心虚，望风披靡，稍有接触，敌军即相率而逃。我军于当日进占了萍乡。萍乡人民欢迎北伐军的情景是非常热烈的。该县县党部各界团体在县大西门外校操坪开了市民大会。那天

烈日高照，天气炎热，而到会者极其踊跃。小小的萍乡县城竟汇集了五、六千人。二军党代表李富春、三军党代表朱克靖、还有四师的副师长和我，均在大会上做了演说。宣传北伐的意义，宣传北伐军的革命性质，号召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号召人民起来支援革命军作战，使革命早日成功。工农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代表人民痛斥北洋军阀的腐败，揭露贪官污吏欺压人民的暴行，表示拥护革命军和与之共同奋斗的决心。言者慷慨陈词，听者为之动容。广场之上，呼声、掌声雷动，情绪之热烈，场面之壮观，令人感动。

占领萍乡后，北伐军继续东向，跟踪追击唐福山部，攻占了宜春、分宜，逼进新喻。这时，北洋军阀的赣督邓如琢从南昌赶到前线督战，在分宜至新喻之间，据险布阵，企图顽抗。这是二军自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硬仗。我们正面是地势险要的敌仰天岗阵地。那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军、师、团党代表都亲自上前线做宣传鼓动工作。由于多次冲锋不克，军部命令我师由袁水南岸迂回至敌人侧后。不料部队的行动被敌人发现了，他们立即增兵向我师反扑。当时，我师的十六团和十八团一营出击莲花、永新去了，兵力不多，阵地几次险被突破，情况十分危急。我与戴师长亲临第一线阵地，镇定地指挥部队，鼓动官兵们英勇

杀敌，坚守阵地。终于打退敌人反扑，与正面突击的部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仰天岗被攻占。

新喻攻下后，敌人如惊弓之鸟，溃不成军。邓如琢见势不妙，逃向抚州。入赣仅半个月，二、三两军连克萍乡、宜春、莲花、永新、分宜、新喻、万载、上高、清江、安福等十一个县，战事发展十分顺利。

#### 四、围 攻 南 昌

部队打下清江以后，我们六师得到了军部的通报，知六军和一军一师袭击南昌后，由于孙传芳增兵反扑，我袭击南昌的部队势单力薄，致使南昌城得而复失。当时，二军五师还在赣南攻打吉安，我师与四师奉命攻打樟树。樟树攻下以后，邓如琢退居南昌城，通电辞职。我二军各师遂向南昌进发，追击残敌。这时，蒋介石也赶到前线，部署第二次攻打南昌。

南昌之战是整个江西战场上最关键的一仗。胜败关系全局。孙败则不但不能保江西，江浙也要动摇；而我败也不只是危及湖南、湖北，就是广东也很危险。因而从一开始，双方都拿出主力，摆开了决战的架势。为攻下南昌，军党代表李富春同志还召集政治部会议，要求政治工作人员要将工作做到实际上去，要使全军官兵懂得攻下南昌的责任。我们各级政工人员，都努

力工作，宣传北伐的形势，鼓动官兵的士气。

第二次攻打南昌的部署是由三、六、七军及一军一师攻占南浔路敌各据点，切断南浔路，阻挡北来援军；由二军五、六两师和一军二师攻打南昌城；四师为预备队，警戒抚州方面之敌。然而战斗开始后，北线作战不利，各军协同不好，未达预期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没有及时调整作战计划，仍旧命令我们按原计划攻城。

十月十日发布命令：二师攻北边得胜门；五师攻东边永会、朝阳门；我六师在西南以主力进攻进贤门，另以十七团绕攻惠民门。十二日拂晓各部同时发起进攻。当时，各团挑选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奋勇队，冒着枪林弹雨架梯登城。由于敌人火力过猛，几次爬城均没有成功，在惠民门，十七团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第一营在攻击前进时，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住，全营进退不得，情况非常危急。此时，十七团团团长廖新甲牺牲。戴师长和我到惠民门附近的机关枪阵地，指派第二营营长李月峰代理团长，并调集各部火力，压住对方，使全营脱险。南昌城西南一带民房低矮密集，敌人为了便于发扬火力，竟放火烧尽城内大片民房，给南昌市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我全师官兵目睹敌人的暴行，无不义愤填膺。这时，由于北边敌卢香亭部打通了南浔路，援兵源源开

来，南边抚州之敌刘宝题、陈修爵部也蠢蠢欲动。我军屯兵城下，背水作战很不利。总司令部决定调整部署，撤围南昌。

二攻南昌的教训，说明了切断南浔路的重要。于是经过短期休整后，总部部署了南浔路大决战。我们二军以五、六两个师协同十四军（赖士璜部所编）攻击抚州，切断南、抚之间的联络，以六师渡赣江，经松溪、万寿宫，参加南浔路总攻击。我师的任务是增援三军攻击牛行车站。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敌郑俊彦部拚死向我阵地反扑，几乎将我们包围。我和戴师长、米柳史切维奇顾问均在前线，敌人的炮弹不断落在我们四周。经过一周的浴血奋战，占领了牛行车站。这时，南浔路已被友军层层截断。南昌敌人见败局已无法挽回。便于夜晚偷渡赣江，向东北方向逃窜。我师奉命为先遣追击队，渡江跟踪追击。部队在鄱阳湖畔的河道港叉之间昼夜兼程，终于在涂槎追上了逃敌。这时，白崇禧率部队也赶到涂槎。这次让白崇禧发了大财。这股逃敌本来是我们师追的，可是由于十八团团团长刘风贻误军机，没有及时追击缴械。结果，郑俊彦、张风岐所部共两万余人及其枪械，全部被白崇禧缴了去。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十一月八日南昌城终于被攻下。胜利来之不易。据当时统计，入赣以来二军

共伤亡官兵二千余人，其中政治工作人员二十余人。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发表的《第二军最近状况》记载：“下级干部及士兵的精神颇锐，从二月的作战精神看来，下级干部及士兵确有牺牲精神，则十分之九是政治工作力量。”

## 五、闽北月余

在南昌方面战事紧张之际，福建军阀周荫人改变了援赣计划，转而向广东进攻，妄图袭击北伐军的后方。十月初，福建战场开辟，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由于一军排斥了共产党员，所以战斗力很弱，被周荫人打得大败。后幸敌内部发生分化，周荫人才不得不退出广东，向浙江撤退。南昌攻克后，北伐军损失较大，不能马上东下取江苏、安徽，于是决定派赖世璜十四军及二军六师协助何应钦攻取福建。大约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也就是在涂槎解决敌人后不久，便接到总司令部南下策应何应钦，与十四军共同截击周荫人部的命令。从这时起，六师脱离二军在闽北单独执行任务一个多月。直接受十四军指挥（其军长赖世璜因病留赣休养，由副军长兼党代表熊式辉指挥），总的受命于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

我师沿临川、资溪、光泽、邵武挺进，由建阳直

趋建瓯。副师长朱耀华率领十六团为先头部队到建瓯时，守敌见我们兵少，企图抵抗。我和戴师长一商量，率领特务连赶到城内，虚张声势，限其四小时内缴械投降，可以保证生命与个人财产的安全。敌人不知虚实，也慑于北伐军的巨大影响，便缴械投降了。与此同时，十七团在党城截击敌人，歼灭约三千逃敌。十八团在政和一带截击敌人。十八团团长刘风在打了一仗之后，没有抓住时机追击残敌，致使周荫人亲率的那一部分敌人得以从松溪、政和窜入浙境。戴岳对刘风再次贻误战机非常恼火，与我商量要撤他的职（当时条例规定，主官发布命令，必须有党代表附署）。刘风这个人不仅军事上不太听指挥，一再贻误战机，而且在政治上也很反动。于是我们便撤了刘风的职，改派洪汉杰代理团长。另外，敌驻闽北的何麓崑部三千余人，主动与我方洽降，被收编。至此，闽北之敌除周荫人所率一部得以逃脱外，其余全部被解决。六师浩浩荡荡开进建瓯后，熊式辉从福州何应钦处归来，向我师传达了“暂时休整待命前进”等指示。这样，我师便在建瓯驻防一月有余。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据戴岳回忆，熊式辉从何应钦那儿回来后，在与戴岳交谈时，曾问到“肖党代表是C P，还是C Y？”当戴说“是共产党”，并说了一番赞许共产党的话之后，熊式辉露出非常惊讶的样子。估计是对戴岳的试探。熊



式辉是比较反动的，他趁赖世璜因病滞留江西之机，改编了赖的部队，以后在“四·一二”政变时，他与何应钦的部队都成了蒋介石的别动队。

北伐军进入建瓯后，即逮捕了伪县长，解散了欺压百姓的保安、警察武装，帮助地方建立了县行政委员会，推选了委员。师部驻在被接管了的帝国主义天主教堂里，并约法三章：不拉夫、不筹饷、不强住民房。深受广大人民的欢迎。为了宣传和发动群众，师政治部在城北广场主持召开了庆祝北伐军胜利进军大会。这是每到一地几乎都要做的事。我作为师党代表，在会上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叙述当前国内革命形势、出师北伐的胜利经过，号召国民组织起来，为谋求自由、幸福而斗争。由于语言不通，还有一个当地的同志作“翻译”。会上还枪毙了一个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首要分子。我们还帮助建瓯县筹建了国民党县党部。这也是我们党代表、政治部在北伐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每到一地，没有县党部的帮助筹建，已经有了的进行改组。不管是筹建也好，改组也好，实际上是把腐败的国民党的县党部变成了有共产党参加领导的县党部。这样，我们走一路，改造一路，便把革命的火种播撒了一路。在建瓯也是如此。建瓯县党部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县党部成立后，除了帮助我们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外，还以公

开的名义组织县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开展斗争土豪劣绅、取缔奸商、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扶助工农的活动。一时间，建瓯县的工农运动蓬勃兴起，人民群众扬眉吐气。

一九二七年一月底，我师奉命离建瓯赴浙。临行前，我与戴师长开会向地方各界人士告别，并以师部的名义捐款二千元，倡议建设黄华山公园，以留纪念，并扩大北伐的影响。今天黄华山公园依然座落在建瓯县黄华山的万绿丛中。它是北伐战争的一骄子，也是北伐战争的一见证。

## 六、攻克南京

在我师东下闽北助何期间，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表面化了。攻克南昌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主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而蒋介石为了把持国民政府，却硬要迁都南昌。这场争论，使蒋介石的个人野心进一步暴露。一九二七年初，北伐军决定分东、中、西三路向长江下游进击，以夺取南京、上海为目的。四、八军为西路军，集结于湖北孝感、黄陂，监视河南张作霖军阀部队；二、六、七军为中路，沿长江入皖东下；一军为东路，由闽入浙北上；三军仍在江西为总预备队。蒋介石如此配置兵力也是出于一定的目

的。自北伐开始以来，蒋介石的嫡系一军屡屡败北，在整个战场上声名狼籍。他要达到个人目的，不得不求助于他军。因四、八军与蒋间隙较深，势力较大，足以与蒋分庭抗礼，蒋就转而拉拢二、三、六、七军。与李宗仁拜把兄弟、让朱培德镇守江西。二、六军因与八军有旧怨，蒋也乘机拉拢，让其担任长江下游战场的主攻。当时，我党从全局出发，力图减少汪蒋间、蒋唐间以及各军间的冲突，以共同完成北伐大业。我们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也是努力促进团结，以大局为重，同时积极发动民众，壮大左派势力，同蒋做必要的斗争。

这时，我师尚在建瓯，仍接受东路军指挥，参加杭州会战。由于友军作战不利，东路军退至衢州附近，孙传芳派孟昭月增兵反攻。我前敌指挥部决定在衢州附近一战。我师奉命经浦城、越仙霞岭，与江西过来的四师会合担任左翼，攻打水亭和诸葛镇。这也是一场鏖战，炮火昼夜不停。胜利那天，巧逢苏联顾问米柳史切维奇的生日。早餐时，我们师部备了简单的酒肴，为其祝贺。米柳史切维奇兴高采烈地说：今日定破敌军！饭后，我们一起去前线。战斗又进行了一天，直到黄昏，才将敌人阵地突破，包围起来。但未等解决，总指挥部又命令我师迎击寿昌方面的白宝山、冯绍闵、刘宝题的部队。我们一直将敌人追击到皖浙边

境。敌人是兵败如山倒，我们却似猛虎下山，何等痛快淋漓。此时，大军正会攻杭州，我师又折回遂安，入徽州，担任肃清外围的任务。那正是一九二七年春节前后。正月初一路过遂安县时，当地进步青年在我军进城之处设立“遂安县革命军队过境指挥所”，专为军队搬桌凳、办稻草、雇挑夫，十分热情。

杭州即下，孙传芳的势力仅剩沪宁一隅。北伐军乘胜追击。中路军以七军为江左军，二、六军为江右军，加上一些新收编的地方军阀部队一起，与敌在南京外围展开了激战。这时，直鲁军张宗昌部应孙传芳的要求南下渡江增援。敌我相持，战争成胶着状态。我师从皖南经宣城、高淳、溧水向南京冒雨奔袭。连日来风雨交加，道路十分泥泞。三月十九日，赶到秣陵关。军党代表李富春同志亲自赶到迎接，向我师官兵表示慰问，并满怀信心地鼓励我们说：第六师赶到，南京指日可下。第二天，我与戴师长一起到第一线视察敌情。发现敌人一线城垣阵地极为险要，仰攻不易，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出其不意袭击牛首山（也叫牛扁担山）东敌人阵地。突破以后，又绕敌侧背，前后夹击，迫敌退至二线。接着我师乘胜追击，攻占了雨花台。三月二十四日晚，我二军、六军等部队先后入城。南京城终于被攻下。当晚，美英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侵害，下令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南京开炮

袭击，制造了“南京事件”。

第二天拂晓，我与戴师长率特务连在城内巡视，维持秩序，派哨派岗，组织南京市的卫戍工作。大概在一、两天后，我与戴岳在师部接到下关驻守卫兵的报告，说蒋总司令的兵舰泊在下关。我俩一面向军部报告，一面动身赶至下关。船不大，是一艘炮艇，人也不多。当时我们既不知蒋介石从哪里来，也不知要到哪儿去，只是感到总司令来得突然。我俩上艇坐了一会，蒋介石询问了几句南京市的情况，我们作了回答。我们请他上岸，他说有事要去上海，马上就走，不上岸了，让我们转告军领导。等鲁涤平等来到江边的时候，炮艇已离开码头走了。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大家心里都很快。因为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对蒋的个人野心，鲁涤平等他们都早有看法。这次路过南京而不上岸，更加深了这种隔阂，当时军、师领导人中就有“蒋对我们二、六军不放心”的说法。以后才知道，他急匆匆去上海原来是勾结帝国主义搞反革命政变的。

对于蒋介石的反动嘴脸，在当时我们都是有一些察觉的。过去在广州就听说过中山舰事件，北伐以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都感到蒋这个人讳莫如深，增加了对他的反感。对蒋介石有可能要叛变，在党内有所议论。在党外，如与鲁涤平、戴岳他们交谈中也有所

议论。记不清是在那一天了，党中央派彭述之由上海到南京来。彭述之从下关登岸后，看岸上的士兵都是六师的人，便打听我在那里。士兵将他送到师部。我认识彭述之的是一九二〇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俄文的时候，以后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他做过我们支部的负责人。我们见面后，彭说有事要召集个会议。当时，李富春同志已离开南京，彭便让我做召集人。那次会议是我主持的。李六如、方维夏等军队中党的主要负责干部、江苏省委书记谢文锦同志和一些地方负责干部参加了会议（谢文锦也是与我一起留莫斯科的同学，彼此很熟）。会上，彭述之介绍了上海的形势，总的意思是革命形势不错，但帝国主义还在联合，想从内部分化我们，估计蒋介石可能叛变。党中央在上海采取了一些措施，组织了工人武装，力量很强大，并说有信心、有把握控制局势。但对军队和各地的党组织怎么办，是否要准备应变，一点也没有涉及。第二天，彭述之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想到在那革命的紧要关头，党没有充分估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的危险性，没有领导全党采取果断的措施，组织从各个方面与蒋介石作斗争，只想以妥协投降来换取蒋介石的合作，以致在蒋搞突然袭击之时，我们党措手不及，从而断送了大革命的成果。

## 七、移 师 武 汉

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刻和上海的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他接受了帝国主义及上海买办资产阶级赞助其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大量经费。这样，蒋介石一方面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又有了帝国主义作后台老板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援助，羽毛丰满，便加速了其反革命政变的步伐。他首先委派反动的白崇禧掌握江、浙两省的军事，接着又把黑手伸向了南京。他认为南京的二、六军不是自己的左肱右股，疑心将成为他投向反革命的一大障碍。于是采取阴谋手段，反拉为打，以扫除为目的。他先命令二军渡江追敌，名义上是继续北伐，实际上是调虎离山。接着，派其嫡系何应钦的一军薛岳师进驻了南京。遂在六军进行“清党”，缴械、改组。把二、六军彻底挤出南京。

当时，我们在二、六军工作的共产党员，根据党的指示，是努力促使二、六军倒向武汉国民政府的。林伯渠、李富春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我们下边的工作人员，也针对二军中的反蒋情绪，从侧面吹风。记得部队过宣城时，我与戴岳乘小舟，在船上谈心。当分析到北伐军的前途时，我说，孙传芳已成釜底游鱼，

攻下南京是不成问题的。可虑的是蒋介石野心勃勃；肆意独裁，恐怕与革命不利。并透露了现在不少军、师领导人都在共商对策。戴岳亦表示同情和支持反蒋斗争。在南京的时候，蒋介石排挤二、六军已成事实，鲁涤平还在莫愁湖请客。我和戴岳、朱耀华都去了，其他师的领导张辉瓒等人也都去了。席间也商谈了如何反蒋独裁的问题。在当时，程潜、鲁涤平的决心都还不是很坚决的，各有自己的一些打算。戴岳曾向鲁涤平建议与六军一起固守南京，与武汉方面联合讨蒋，但鲁以程潜赴汉，无人主持为辞拒绝了。

二军渡江以后，在乌衣镇一带集结。当时是北上还是回宁讨蒋，估计在领导层中不太统一。后来，武汉方面指示我二军回南京，协同六军卫宁反蒋。于是，李富春同志让我带几名同志返回南京，与江苏省委书记谢文锦同志联系，搞一部分船只，准备接二军渡江回南京打蒋介石。但后来武汉方面又改变了计划，要部队去武汉。时二军已北上，在津浦线与直鲁军展开激战，前锋打到蚌埠。二军孤立无援，蒋介石阴谋假手直鲁军消灭二军。形势险恶，延宕就等于坐以待毙。鲁涤平、李富春在前线召集师以上干部会，我党同志坚决主张讨蒋。鲁涤平等人也出于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愤恨，以及武汉方面的老上司谭延闿的召唤，一致通过移师西行，与武汉政府联合讨蒋的主张。当时在



二军内部，国共两党虽然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但在共同讨蒋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于是，全军经全椒、含山、巢县、庐江、太湖向鄂东前进。

在此期间，我和军政治部主任黄鳌等八人在执行搞船的任务。我们先到了浦口，找到浦口船舶工会，把船只调集到江北，然后又渡江回到南京，找谢文锦同志研究部队如何渡江的问题。这时已是“四·一二”政变前夜，南京的形势已是十分险恶了。何应钦的部队进驻南京后，把六军缴了械，正在实行“清党”。我们几个也差一点被抓了去。南京已不能久留。我们得知部队已向武汉方面转移，便由南京南门出城，当天抵安徽当涂县。以后经芜湖、宣城、歙县、休宁到景德镇。路过景德镇时，正是一天中午。当地的反动民团排斥工农武装，发生了争斗，形势很紧张。工农武装被赶了出来，派人找到我们，要我们帮助他们。我们一行八人从南京出来，正憋了一肚子气。决心打他们一家伙，支持一下工农武装，同时也出出气。于是，我们八人以北伐军要伙子挑行李为名，进了民团团部，工农武装埋伏在外面。我们进去一看，团丁们正在睡午觉，一开枪，他们晕头转向，都仓惶逃跑了。工农武装乘机冲进来，把民团的武器都收缴了。

从景德镇到九江，听说部队在宿松、黄梅一带，我们便过江追上了部队。当时，军部和四、五师驻黄

梅，六师驻宿松，奉武汉政府之命在此休整待命。在宿松天主教堂，我师召开了讨蒋大会。我与戴岳均在会上讲话，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提出“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的口号；群情激奋。军部在黄梅还举行了第二军北伐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中共中央赠送了挽联：“二军之功名已把吴、孙打倒了；吾辈之责任果能擒拿蒋、张么？”

不久，二军奉命开往武汉，我们从藕池口登船，到达武昌，担任武昌的卫戍任务。这时武汉的形势已经比较复杂。汪精卫表面上是左派，而在暗地里与蒋介石勾结，准备反共。军队中也比较复杂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斗争土豪劣绅的消息不断传来。二军中的军官不少是湖南的地主豪绅子弟，家里来人来信均很大地影响着军队。引起他们对农民运动的反感。部队中的政治工作阻力也比较大了。当时，郭沫若同志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文章，我们有的政治工作人员就拿着小册子在部队宣传，揭露蒋介石的叛变嘴脸。这在当时下级官兵中还是欢迎的。但宣传打倒土豪劣绅，他们就有些反感，尤其在军官中。马日事变以后，四川军阀杨森与夏斗寅勾结，进攻武汉。六月，鄂西战役开始。我所在的六师在仙桃镇将杨森部击溃，乘胜追击到沙市、宜昌。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又叛变，宁汉合流，国共

合作到此最后破裂。中共党员奉党的命令陆续撤离部队。撤离时是由党秘密通知分期分批走的。军里的李富春、黄鳌同志比我走的要早。不久我即接到党的通知去汉口。于是，我便与其他两名同志一起从宜昌乘一艘日本船到达汉口，从此便离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开始是准备让我们去参加南昌起义的，后来又改派我第二次出国赴苏联，到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军事去了。我离开部队以后，六师由鄂西开赴长沙。据戴岳后来回忆，一些留在六师的共产党员到湖南后遭到何键的清乡督办署的疯狂迫害。第十八团连长雷鸣皋被逮捕枪杀，团副戴文被判处徒刑三年零六个月。第十七团营指导员戴世荣被迫躲避到邵阳乡间，不久也死了。

我参加北伐，经历了两年战争实践。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开始思想是很朴实很单纯的。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贡献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所以也不怕死。战争使我接触了社会，认识了社会，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从革命的兴衰中，我看到了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重要性。北伐之初，革命形势发展是非常顺利的，以共产党员为主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对旧军阀部队的改造也是卓有成效的。就拿我所在的六师来说，当时已有三分之二的力量基本上是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之下。如果当时党的

路线正确，完全可以逐渐地把这支军队掌握在我们手里。至少在国民党叛变时，可以多拉出一些队伍，使之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可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对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作了种种限制。不准共产党员当军事指挥官，不准在部队内发展共产党员。特别是在蒋、汪叛变时，对形势没有正确的估计，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我党失去了掌握这支武装力量的大好时机。后来拉出来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部队，仅是整个国民党革命军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倒向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从客观上讲，也由于我们党当时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经验，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还不可能有明确而深刻的认识。革命的失败，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使我党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懂得了建立自己的人民军队的重要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标志着我们党开始走上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回顾历史，我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胜利，正是由于我们党正确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使党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前进。党的路线正确，革命就发展，否则革命就受挫折甚至失败。这一条用千百万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群众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经验，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

# 回忆苏中战役

粟 裕

苏中战役，是我华中野战军的部分主力为执行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在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中原我军突围后，位于我国解放区东南前哨，与蒋管区心脏宁、沪地区隔江对峙的苏中根据地，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七月中旬，盘踞在南通的国民党第一绥区的汤恩伯（以后为李默庵接替），指挥五个整编师共十五个旅十二万人，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我华中野战军三万余人，奋起迎战，举行了苏中战役。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作战七次，均获胜利，歼敌五万余人。这七次战斗是：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的宣家堡、泰兴战斗；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的如（皋）南战斗；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三日的海安战斗；八月十日至十一日的李堡战斗；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的丁堰、林梓战

斗；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的邵伯战斗；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的如（皋）黄（桥）路战斗。

这七次战斗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但每次战斗都由同一战役指导思想联系着，那就是遵照中央军委“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指示，着眼于战争初期的作战要求，从当面的实际情况出发，灵活用兵，那里好消灭敌人就在那里打仗，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仗，什么敌人好消灭就打什么敌人。战役的结果，既沉重地打击了进攻的敌人，掩护了华中解放区实行战略转变，又初步探索了解放战争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完成了战略侦察任务。

回忆这个战役，对于研究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方针形成和作战指导，对于研究我军传统战法在解放战争中的运用，以及研究战役组织指挥方面的某些问题，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为了把情况交代清楚一些，本文还是从战前的斗争形势写起。

## 山 雨 欲 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我正在浙西集结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部队，总结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打运动战的经验。这年的上半年，我们在天目

山反顽战役中，集中十来个团打运动战，重创国民党顽固派顾祝同部，取得了胜利，得到了锻炼，可以说国民党顽固派对浙西抗日根据地的多次进犯，不仅没有消灭我们，反而使我们在抗日战争后期提前实行了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一九四五年九月，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的斗争，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毛泽东同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后，我们奉命从江南北撤。此时，新四军第三师已奉命向东北进军，新四军第二师、第四师、第七师主力和从江南北撤的叶飞纵队奉命北调山东，接替由山东开往东北各部队的防务。这是党中央的一着高棋，不仅在政治上争取了各阶层群众的支持，而且支持了发展东北，缩短了南方战线，实现了全面战争爆发前的战略集结。

十月，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华中局改组为华东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两个战略区的工作，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部队。另在华中（原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组成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和苏皖边区政府。十一月正式组成华中野战军，下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等四个纵队。

为了准备歼敌的战场，我们曾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发起高邮战役，集中兵力，在南面攻取了高邮城，

收复了高邮以南至邵伯镇的运河沿线地区，为保障华中解放区首府两淮（淮阴、淮安），扫除了一个心腹之患，对加强苏中与淮南的联系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北面，控制了陇海铁路徐、海段，第一次使华中与山东两大战略区联成一片，并使华中解放区有了坚强的依托。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停战协定生效后，我们遵照党中央关于开展减租、生产、练兵三项工作的指示，部队展开了百日军政大练兵，并积极扩充主力，调整部署。将第八纵队扩充成为新四军第一师，第六纵队扩充为第六师，并将华中第五军分区部队和一部分投诚部队编为第十纵队。五月，我们经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批准，为了确保沿江财源区域，扩大政治影响，集中第一、第六师及第七纵队（下辖四个团）于苏中地区。

六月六日，中央指示：“目前我们的方针是力争和平，但你们的工作必须是一切都准备打。”

要准备打，整个根据地都动员起来了。“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政治思想教育进行得相当生动有力 and 深入。部队积极练兵，地方动员参军，在扩大和加强地方武装的基础上，动员部分地方武装上升主力，建立支前司令部和组织民兵参战团、伤员转运站、粮草供应站等等，搞得轰轰烈烈。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



又一项战备，是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四月间，邓子恢同志飞往延安；五月飞回，在淮安召开了分局及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确定从六月份开始在华中全解放区进行土改。后来战争打响了，苏中解放区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白天打仗，夜晚分田”、“前方打仗，后方分田”等口号，到七月底便基本完成。以后的事实证明：土改大大激发了贫苦农民和子弟兵们的阶级觉悟，为支持解放战争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 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

六月中旬，中央判断：“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对于大打以后的结局，当时中央作了这样的估计：“六个月内外的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鉴于敌人大举进攻在即，迫切需要制订我军的战略方针，于六月二十二日设想了一个南线作战的战略计划，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同志考虑。这个计划，是在全局破裂，国民党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山东、太行两区主力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要求我太行区的部队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

战方向，集中主力尽可能攻取陇海路沿线南北十几个县城，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野战军则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苏皖北部的部队攻取津浦路徐、蚌间以及陇海路黄口、徐州段的各点，着重调动徐州之敌在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而我华中主力须对付江北之敌，予以配合。还考虑在形势有利时，两区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前进。

这个战略计划，同后来我军实施的内线歼敌的防御方针是不同的。其战略意图是在外线出击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和扩大新解放区，保卫老解放区，并保障中原新四军第五师的安全。

中央为了实施太行、山东主力向南出击的计划，六月二十六日指示华中分局，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通（南通）扬（州）线上之敌。要我和谭震林同志率领不少于十五个团之主力部队，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主力配合，一举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彻底破路，歼灭该地区之敌，恢复淮南（三、四分区），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并限于七月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攻击。新四军军部根据这个指示，于二十七日命令我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集中于六合、天长之间整训。

以上筹划的一场大战，对未来战局的发展关系至

大。华中分局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向中央和陈毅同志建议：在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和第六师仍留苏中解决当面之敌，改善苏中形势与箝制敌人；在山东及太行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华中野战军第一、第六师再加入蚌埠、浦口线作战，完成第二阶段任务。当时，我们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淮南地区人口仅一百三十余万，抗日战争后期，该区环境比较安定，转入战时状态需有一个过程。战争初期，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如在淮南作战，不仅粮草需由苏中供给，就连支前民工亦需由苏中补给。主力部队开到，加上民工、干部，每天至少需要粮食十万斤，两三个月的用粮将达数百万斤，其它军需供应也相当繁重，将给初期作战带来很大困难。

第二，苏中当面有敌军九个旅，如我华中主力西进，留守部队难以担任箝制任务，该区会有被敌迅速占领之极大可能。苏中地富人稠，人口九百万，占华中总人口的五分之二，粮食亦占华中总产量的五分之二，沿江商业繁盛，税收占华中的一半，这些都是支援战争的巨大力量，一旦沦入敌手，就为敌人所用。而且因苏中地近宁沪，如不战而弃，政治影响也不利。

第三，淮南之敌有第五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旅也在淮南（另两个旅在南京，一打起来势必北渡淮

南)。这两支部队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二，加上淮南其他敌军，兵力较强，相对说来，苏中之敌较弱。

两相对照，我们于六月二十九日上报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建议先在苏中打几仗，到第二阶段再西进淮南，与山东野战军配合作战为有利。

军委对此建议极其重视，次日复示华中：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候安排。

情况在急剧变化。七月初，中央从各方侦悉：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指示我们：“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这是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对原定战略计划的一次重要调整，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苏中战役，就是在中央调整了的战略计划指导下发起的。在苏中战役的实施过程中，中央军委密切关注战局的发展，多次就战略方针有关的问题征询新四军军部和华中的意见。苏中战役在战争初期起着战略侦察作用，并对中央调整战略方针起着实践检验作用，这个情况将在叙述战役过程中逐步提到。

七月十三日，军委电示：“苏北（按指长江以北的江苏北部）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边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

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后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军委还提醒我们：“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这使我们感到，大战将从苏中开始。苏中战役实际上具有解放战争战略初战的性质。军委要我们“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实际上赋予了我们的作战以战略侦察的任务。

## 选择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作战

敌人进犯苏中解放区的企图，看来是首先攻占我苏中南部地区，然后在淮南及徐州之敌的配合下，进占两淮，速战速决，一举占领我苏中、苏北。当时我苏中有第一师（两个旅六个团）、第六师（两个旅六个团）和地方武装上升的第七纵队（四个团）、第十纵队（三个团），共十九个团，约三万余人。敌人兵力为十二万。敌我兵力对比悬殊。

但是，敌人有两大致命弱点，就是丧失人心和骄傲狂妄。

对于敌人的骄狂，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这年的三月二日，“三人小组”检查停战协定执行情况时，我

和谭震林同志随陈毅军长飞徐州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并向三人小组控告蒋军违反停战令，侵占我解放区若干城镇。我返回那天，在徐州的国民党军队负责人到机场送行。当时，一批美制P51型蒋机在机场起飞、降落，啸声刺耳，有意耍弄“威风”。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的副参谋长站在我的身边，趾高气扬地笑指天空说：“现代的空军，威力真是伟大啊！”这显然是欺负我军还没有空军。我也冷冷地笑着说：“可惜它有个缺点，目前还不能下到地面上来抓俘虏。”敌人以为我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撤是打了“败仗”，同时停战期间他又侵占了我一些地区，更以我为可欺，加之受其高级将领的欺骗宣传，以致盲目地以为我军不堪一击。“骄兵必败”，这是蒋军的一个致命弱点。

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我们选择了江都至如皋一线，也就是苏中解放区的前部地区作为初战的作战地域。选择在根据地前部地区作战，似乎不符合我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通常实行的诱敌深入的传统战法。其实，诱敌深入并不是目的，而是歼灭敌人的一种手段。诱敌深入也不是贯彻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的唯一打法。传统战法的运用，须在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从当面的实际情况出发，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选择解放区前部地区作战，是从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出发的，又是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条件的。

苏中战役选择解放区前部作战，是基于下列的考虑：

第一，华中解放区是抗日战争中广大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晶。经过日寇无数次的“扫荡”、“清乡”，我们都坚持下来了。面对蒋介石的进攻，如果不打几个胜仗就放弃大块土地，这对党政军民都是不好交代的，对士气民心将产生十分严重的不良影响。这是战争的指导者所必须充分考虑到。

第二，总的说来，华中对于迎击蒋军的全面进攻是有准备的。但是不能不注意到，停战协定签订后，华中出现了为时半年的相对和平局面，和平麻痹思想在某些地区也有所滋长，战争的准备工作并不平衡，需要一个时间以完成各项转变。而且在战争还没有大打时，我们的准备只能是战略性的和部分的，如练兵、减租和发展生产等，而大量具体的工作，如坚壁清野，从城市向农村转移、民工的进一步动员组织等等，要到敌情大体明瞭、作战任务大体确定之后，才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况且土地改革开始不久，为了保证这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工作的进行，也需要在苏中根据地前部地区作战来掩护。

第三，苏中战役对于战争全局应起战略侦察的作用。国民党气势汹汹地向我们打来了，他的战略意图和部署，作战行动和手段以及战斗实力等等究竟怎么

样，都需要摸一摸。在前部打仗，可以迫使蒋军提早实行战略展开，从而便于我进行战略侦察。

当然，战争不是一厢情愿的事，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有没有条件。我们认为，战争初期在苏中解放区的前部作战又是完全有取胜的条件的。

第一，苏中解放区前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同日、伪、顽长期争夺的主要地域，日寇投降后，又遭到蒋军的不断进攻和蚕食。这一地区的广大群众经过长期战争环境的锻炼，具有顽强战斗的传统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同时，这个地区物产丰富，粮棉丰足，人力众多（如上文所述，人口、粮食均占全华中的五分之二，税收则占一半），水运便捷，支前工作又很健全。这些都是初期作战良好的战场条件。反之，苏中纵深地区狭小，海安以北就是水网，海安东北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地形条件，支前力量都不如前部地区。

第二，华中主力部队第一、第六师在这一带打仗时间较长，对民情风俗、地形道路十分熟悉，第七纵队更是这个地区的地方武装上升的，对在这类河港交错、村落密布的平原（半水网）地区打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长期坚持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军政、军民关系，同地方武装、民兵在作战、侦察、保密以及战勤保障等方面的配合更是非常协调。



第三，从战役上来说，强和弱是辩证的，强敌而未展开，虽强犹弱。战争初期，我以大块解放区为依托，乘敌人正在实施战略展开之际，在前部地区予以打击，可以打乱其部署，暴露其弱点。何况战争初期，敌人恃强，以大军向我进攻，以为我必不敢撄其锋，我军恰恰在此时此地主动向其反击，必可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毛泽东同志有这样一段精辟、正确的论述：“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对我有利，先在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打几个胜仗，是必要的，也是具备了条件的。于是，我们迅速定下决心，在苏中前部地区作战。

## 首 战 宣 泰

作战地区选定之后，就是选择打击目标和确定反击时机了。

蒋军即将向我大举进攻，我军在海安，如皋一线严阵以待。七月十日，我们已确悉蒋军将在三、四天内分四路向如皋、海安大举进攻。整编第四十九师从南通北犯如皋；整编第八十三师从泰兴、宣家堡，整编第九十九旅从靖江，两路合击黄桥，然后配合四十

九师会攻如皋；整编第二十五师的一四八旅从泰州东犯姜堰，得手后，这几路敌人将会攻海安。整编第二十五师的另外两个旅在扬州待机。如我初战失利，他们可能沿运河线北犯邵伯、高邮。蒋军还有两个整编师（第二十一师和第六十五师）在江南沿岸当第二梯队，准备随时加入战斗。

这时，我军究竟是等待当面的敌人向我发起进攻后再打，还是先机制敌，进攻敌人的出发地为有利？我们考虑：

第一，敌军四路人马向我分进合击，他们在各个进攻出发地的时候，彼此间隔还比较大，越接近如皋和海安就越靠拢，相互策应越便捷，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我军就很难将他们分割、包围，歼灭其一路，就会在西北、西南、东南三面临战，腹背受敌，甚至陷入被动局面。我主动进攻敌人的出发地，可以打乱其部署，寻歼其一路，造成有利于我机动之局面。

第二，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必须准备在短期内连续作战，第一次战斗要为后来的作战创造条件。这一地区在停战期间，不断遭到敌人的蚕食，战场已比较狭窄，先在适当地区打一仗，歼敌一部，可以为后来的作战开拓战场。

主动进攻敌人的出发地，是否在政治上处于被动？

否！自五月下半月，敌军已侵占我东北的四平、长春、永吉，六月，敌人又集中了三十万大军对我中原五师发动了围攻，已经打响了全面内战的第一枪；而在华中方面，自从停战令生效以来，国民党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我解放区的蚕食，泰兴、宣家堡、白蒲等大片地区，都是停战令发布之后国民党军违约侵占去的，衅自彼开。“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给予敌人以反击是顺理成章的。

对于敌人的几个进攻出发地，我们作了如下的分析和比较：

泰州之敌，离我海安较近，踞我侧背，对我威胁较大。但泰州是中等城市，难以迅速攻克。若围攻其前出据点，求歼援敌，这一带地形又不利。从泰州直到海安，是水网地区，河川纵横交错，有些地方没有桥梁，难以通行；南面是较宽的运粮河，大兵团很难行动，而且每个村庄都有水圩子，易守难攻。打这一路如不能速决，南通、靖江方向的敌人将乘虚而入，占我如皋、海安。

东南方向的南通、白蒲一路，距离较远，如我远出寻歼该敌，泰州、泰兴、靖江的敌人必然会三路并进，可能很快突破我阻击阵地，威胁我海安、如皋。

只有打宣家堡、泰兴这一路最为有利。如前文所述，宣家堡是停战令生效后敌人违反停战协议侵占的，

泰兴城是停战协议即将生效时被敌人抢占的。反击这两点我们在政治上更为有理。而且，敌人占据不久，民心不顺，情况不熟，虽然临时赶修了一些工事，但远非南通、泰州可比，实际上是临时驻止之敌。歼击了这一路，西北路泰州之敌和东南路南通之敌的间隔就扩大了，我军可以转用兵力，连续作战，打开局面。这一路敌人是整编第八十三师的前出部队，只有两个团，比较孤立、分散，利于我同时分别歼灭。

整编第八十三师原番号是第一百军，是蒋军嫡系部队，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的基本部队之一，美械装备，美国教官训练，抗日战争后期曾作为远征军到过缅甸作战，战斗力较强。首战打这个强敌是否没有根据？不，这个部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骄傲。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敢于主动向他们攻击，并且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去打。我们定将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效。

七月十日，我们定下决心，集中第一师、第六师、第七纵队于宣、泰地区，只用第一军分区的部队监视和阻击可能由白蒲北犯之敌和由泰州东犯之敌。宣家堡、泰兴两地各驻敌军一个团，我们各用一个师（两个旅六个团）的兵力去打，形成了我们跟敌人是六比一的优势。而且这两个师都是久经战斗锻炼的，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各部队之间都是互相信任的；第

七纵队（四个团），是新由地方武装升级编成的纵队，士气很高，求战心切，我们将其使用于次要方向，攻击佻家庄之敌。

战斗进程基本上和预期的一致，我军做到了出敌不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其不意的攻击，“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由于在老根据地行军作战，群众性的消息封锁做得很好，敌人事先毫无所知。战斗打响后，宣、泰之敌慌乱失措，刚到南通接任的敌第一绥区司令李默庵也莫测我军虚实。李默庵急令已开抵白蒲准备北犯的第四十九师主力于十四日缩回平潮，以保南通。至十五日，一绥区才判明我军主力确在宣、泰，又急令第四十九师再次北进。这一缩一伸，白送给我军两天时间。而十五日晨，我第一师经一夜激战，已全歼宣家堡之敌第五十六团及山炮营；第六师也已基本上歼灭了泰兴之敌，敌人只剩下一个营部率少量残部负隅抵抗。各阻援部队都打击了援敌。鉴于我军已获得转移兵力的主动权，宣泰战斗遂告胜利结束。但留下六师少数部队继续围攻泰兴城内少数残敌，给敌人以我军主力仍在泰兴的假象，以作为下一次战斗的钩饵。这一仗，我攻城与打援部队歼敌整编第八十三师第十九旅的两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第六十三旅一个营，共三千余人。

这是苏中战役的首战，也是华中我军在解放战争

迎击蒋军大举进攻的第一个胜利的战斗。我们的作战对象是由美国教官训练的、经过整编的美械化蒋军，对于这样的敌人能否战而胜之、攻而歼之，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未经实践证明的问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此极为关注。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同志便亲拟电文询问：打的是否即整编第八十三师？该师消灭了多少？尚存多少？……我们在清查了战果之后，一一作了汇报。

## 再 胜 如 南

宣泰战斗结束的当天，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来电指示我军在南线须准备连续作战。对于连续作战，我们是有准备的。在宣泰战斗的进程中，我们就分析了敌人可能的动向，筹划着下一步转用兵力的方向。此时，敌人虽遭到我军之打击，但他恃其兵力雄厚，又估计我军经宣泰一仗伤亡必大，便急调江南沿岸的整编第六十五师火速北渡长江，会同靖江的第九十九旅增援泰兴，并进犯黄桥，以拖住我军的主力；同时又令第四十九师星夜疾进，企图乘虚夺我如皋城；然后，第四十九师从如皋，第六十五师从黄桥，第八十三师从泰州，三面夹击我军。

这时候，我军有两个作战方向可供选择：

一个是打前来增援宣、泰的第六十五师和第九十九旅。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就近转用兵力，部队不会太疲劳，时间也比较充裕。缺点是这批敌人是来增援的，警觉性必高，很可能一打就退，不易合围；或者打得相持不下，第四十九师得以乘机攻占如皋，使我军的侧后和后方受到很大的威胁。

第二个方案是迅速转移兵力，以主力作远距离机动，直插进犯如皋的第四十九师侧后攻击之。此案的缺点是要强行军一百几十里（第六师的距离更远些），两夜激战之后继以疾走，将减弱战斗力。但优点是明显的，主要是这一行动必然大出敌人的意料。此时，敌人以为我主力在西边，第四十九师将放心大胆地向我如皋挺进，我军来一个长途奔袭，创造歼敌于运动中之良机，将陷敌于被动混乱的境地。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军必须打得、饿得、跑得，能够连续地行军、打仗，而这正是我军的特长。

我们决心采取第二方案，选敌第四十九师为歼击目标。七月十五日晚，即令第一师全部和第六师大部转兵东指；并用汽艇急运第七纵队一个团先期赶回如皋，协同第一军分区部队扼守该城。同时设置疑兵，继续围歼泰兴城内残敌，给敌人以我主力确实还在西边的错觉，引诱如东之敌放胆向如皋进犯。我第一军分区部队连日英勇阻击，为主力的长途东进争取了宝

贵的时间。我主力在连续两昼夜激战之后，又急行军一百几十里，表现了高度英勇顽强的气概，一路上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夜过黄桥，群众以烧饼和西瓜争相慰劳。在群众的掩护下，敌人还蒙在鼓里。

十六日上午，敌第四十九师分左、右两路北犯。十七日，敌右路到达如皋以东之鬼头街、田肚里；左路到达如皋以南之宋家桥、杨花桥，准备次日会攻如皋。我东移之主力则已抵达黄桥、如皋之间的分界、加力地区。我军作了如下的歼敌部署：以第一师主力抢占鬼头街东南公路上之林梓，断敌退路，尔后从右路之敌第二十六旅的侧后向北攻击；以第六师主力抢占杨花桥西南的贺家坝，尔后从左路之敌第七十九旅的侧后向东北攻击；第七纵队主力则由如皋城及其东北地区向东南出击；三路协力，歼敌于如皋东南地区。另以第一师、第七纵队各一个团阻击向姜堰进犯之敌，以第六师之两个团阻击向黄桥进犯之敌。

七月十八日晚战斗发起，敌人果然仓惶失措。我第一师一部与第七纵队南北配合，攻击如皋东南鬼头街一带的敌第四十九师师部和第二十六旅。十九日，除了敌第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率几个人逃入宋家桥外，全部被歼。第六师主力和第七纵队一部经十九、二十日两夜的攻击，也歼灭了杨花桥、宋家桥之敌第七十九旅大部。



如南战斗共歼灭敌整编第四十九师一个半旅，连同在阻击中消灭的敌人，共歼敌一万余人，达到了预期的歼敌目的。由于部队已连续行军作战十天，相当疲劳，而且敌人第二梯队的兵力又已陆续北调，如继续与当面之敌纠缠，对我不利。为保持主动，如南战斗胜利结束后，我主动撤离如皋城，准备再战。

如南战斗结束的当天，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来电报：“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并指示我们：“敌情尚严重，望将参战主力集中休息，补充缺额，恢复疲劳，以利再战。”

### 三 战 海 安

经过宣泰、如南两仗，敌人被我歼灭了两个半旅。但他还有第二梯队，立即又集中六个旅的兵力，分路由如皋、姜堰合击我苏中重镇海安。

海安是苏中的战略要点和交通枢纽，通榆公路、（南）通扬（州）公路，以及从海安向东延伸到黄海边的公路都联结于此。贯穿南北的串场河，沟通东西的运粮河也在此交汇。记得一九四〇年十月五日黄桥战役胜利发展到追击阶段时，我们曾向部队提出一个口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部队控制海安后，立即斩断了韩德勤与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的联系，使

我军迅速控制了富饶的江海一角。但是，如果我兵力处于劣势，则海安这个苏中的战略要地势难固守。此时，敌人正垂涎海安，以为只要占领了海安，从泰州经由姜堰、海安、李堡直达海边的封锁线就可形成，苏中南部的占领区就可巩固，长江下游的通道就可确保。同时敌人还判断，海安战略地位重要，我军势在必争，企图依仗其优势兵力，在海安寻我决战，一举消灭我主力，进而配合其北线的行动，解决苏北问题。

在此形势下，我军的决策，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当时我认为，中央早已明确指示我们，一切要作长期打算，当前的战争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中央要求我们不轻易放弃要地，中央更要求我们保持有生力量，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现在，敌人以六个旅的优势兵力集中在狭小正面向我海安进攻，如我固守海安，在海安与敌人决战，正中敌人的毒计。因为敌人有强大的第二梯队，我军与之决战，势将付出很大的代价，战胜了，敌人仍可继续调集兵力，保持其进攻的态势；战斗如不顺利，势必仍要撤出来，那就被动了。如我先以小部队实施运动防御，杀伤和消耗敌人，并赢得时间，保证主力部队休整，然后撤出海安，给敌人以我军被迫放弃战略要地的错觉，使敌人重新骄傲起来，就将造成有利于我歼敌的战机。

但是，当时还处在战争初期，中央军委、毛泽东

同志关于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方针，还没有为大多数干部所掌握。有的同志认为，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军已经打了两个胜仗，为什么不敢在海安同敌人决战？打了两个胜仗还要放弃海安，前两仗岂不是白打了！我远离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不敢单独决定，就日夜兼程从海安赶赴淮安。从海安到淮安约三百里路程，须经东台穿过水网地区。我开始骑摩托车，力乏以后乘了一段黄包车（人力车），接着又骑自行车，乘船，当时能够搞到的交通工具全部用上了，一天一夜赶到了淮安。华中分局召开了常委会议，郑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尔后主动撤离，创造新的战机；对于同志们的疑虑，除进行必要的思想工作外，主要靠打胜仗的实践来解决。华中分局把这一决定上报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得到了同意。

七月三十日，中央军委又来电指示：“在我军主力未获充分补充休息恢复疲劳以前，及敌未进至有利于我之地形条件以前，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举行勉强的无把握的作战。”“总以打胜仗为原则。敌以十万大军向我进攻，我损失若干地方是不可免的，你们应有应付恶劣环境之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这个指示，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对中央战略方针和作战思想的理

解。

其实，中央的这一精神，早在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电文中，就有过明确的指示。其中指出：我们“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但是对于中央的指示，只有同当面实际相结合，体会才更深刻。

这时，我们的部署是：第一师、第六师集中在海安东北地区休整补充，待机歼敌；第七纵队在海安外围打运动防御战。

海安运动防御战，从七月三十日打到八月三日。第七纵队从苏中地方武装上升主力不久，补充了大量的解放战士，所属四个团，只有一个团打过大仗。但是四天多的战斗，他们只用了三千多兵力，英勇抗击了五万多敌人的轮番猛攻。敌人兵力集中，炮火浓密，但第七纵队作风顽强，指挥灵活，奋战四天多，伤亡仅二百余人，杀伤敌军三千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十五比一的新记录。仅七月三十一日夜对敌人的巧妙袭扰，就使敌军消耗了炮弹万余发。八月三日，海安运动防御战胜利完成任务，第七纵队主动撤出海安。

## 奇 袭 李 堡

我军撤出海安后，敌军第六十五师、第一〇五旅、新七旅争先拥进海安。由于敌军进入我解放区后已处于瞎子、聋子的状况，加上敌军官纷纷报捷，极度夸张地吹嘘“战果”，其一绥区竟未发觉我主力第一师、第六师已经转移，得出我军的伤亡数字竟达“二、三万人”，因而宣告“苏北共军大势已去”。

敌人侵占了海安，认为他们第一步作战目标已经达到，因而调整部署，把原来驻在如皋城的陆空联络组撤回常州，守备部队准备分散“清剿”其后方。据此，我们估计敌人必将分兵东进，占领李堡、角斜，完成其东西封锁线，然后再北攻东台。骄兵轻进，必然有隙可乘。我们把主力集结在海安东北，无论敌人向北、向东，我军都可随机出击。我们发动民兵、群众严密封锁消息；同时，加强侦察情报工作，掌握敌人动向。

这时，我在苏中地区作战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了作用。人员、物资很快得到补给，伤员很快得到治疗，加上大批解放战士和缴获的补充，每个连队都比战前充实，武器也加强了。特别是民兵、群众封锁消息、查缉敌探之严，更是难得。华中野战军机关及第一师、

第六师三万人集结休整两星期之久，驻地距海安近者仅一、二十里，在那里出操上课，开会唱歌，本地出身的侦察员庄庄有熟人，天天上公路，敌人却毫无所知。

八月六日，敌第六十五师及第一〇五旅果然由海安东进，连占西场、丁家所，将继续东犯。我立即于七日晨电报华中分局、军部和中央军委：歼敌良机即将成熟。

次日即获军委复示：“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预备队或箝制部队如有可调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华中军区根据这一指示，在报告新四军军部后，决定将淮南第五旅和华中军区特务团调来。这些指示和决定，增强了我们歼敌的信心和决心。

敌人果然进一步暴露了“骄兵”的弱点，七日占李堡，八日占角斜。我们又密悉李默庵决定调其整编第六十五师于九日经海安去泰州、黄桥接替第二十五师和九十九旅的防务，十日又令新七旅从海安东开接替第一〇五旅在李堡一线的防务。敌军频繁的调动，给了我军以趁其运动或立足未稳加以歼灭的大好时机。

我们当机立断，决心集中兵力，首先寻歼李堡之敌于运动中。我们作了如下的部署：以第一师攻歼李堡、角斜之敌第一〇五旅主力；以第六师之十六旅攻

歼丁家所守敌第一〇五旅一部；以第七纵队及第十八旅分别位于賁家巷东南和西场南北地区，合力求歼可能由海安东援之敌新七旅，并阻击可能由如皋东援之敌。此时，原在淮南的第五旅（三个团）和华中军区特务团前来参战，我们将他们部署在賁家巷以北作为预备队。

战斗于八月十日二十时发起。我第一师乘敌人混乱之际，猛扑李堡，奋勇攻击。此时的李堡，正有敌人的两个旅部各率一个团在交接防务，兵力虽多，但队伍混杂，工事也未筑好，我军一击，建制大乱。至十一日晨，我军完全攻占李堡，中午又克蒋庄、杨庄，全歼守敌。由于我攻势突然迅猛，敌人正在交接的两支部队都很混乱：交防之敌的电台、电话刚才拆除，接防之敌的电台、电话尚未架好，双方都无法向海安告急。十一日晨，敌新七旅旅长仍按原计划带领一个团由海安踉踉东行。我军部署在海安以东打援的第六师与第七纵队，立即利用高苗地作好伏击布置，第七纵队一部断敌退路，会同第六师一部出击，在运动中将该敌全部歼灭，其中一个营缴械投降。

李堡之战，前后二十个小时，歼敌一个半旅共九千余人，又赢得了一个胜利。

## 进一步明确了作战方针

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对于外线出击方针和内线歼敌方针的得失利弊，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华中野战军主力使用的方向，不断进行着研究。

为执行南下作战计划，六月二十七日，陈毅同志决定亲率山东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二纵队、第七、第八师等部共约五万余人，于七月十日以前南下，担任徐、蚌段之作战。七月十四日，陈毅同志鉴于敌人即将大举进攻苏皖，就山野主力南下作战的时机向中央军委提议：敌人的这次进攻，“是分区蚕食的狡计，苏皖现有力量难于胜任应付，必须友邻区暂时出动配合才足以挽救。”因此主张立即执行中央军委六月二十二日提出的作战计划，“截断津浦南段陇海徐西段，造成山东、太行主力在淮北之会合，准备渡淮作战”，以全面大打的办法来制服蒋军分区蚕食的狡计。当时宣泰战斗已经打响，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复电陈毅同志：“最近几天看一看泰兴战斗结果如何。”七月十五日，宣泰战斗刚结束，我们接到中央军委来电，指示：“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敌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须准备



打四、五个大仗，方能解决问题。”这两个指示，表明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密切观察战局，研究战略方针的严肃态度和近期内还须内线歼敌的意向。

宣泰和如南两战胜利后，蒋军的有生力量虽受到我一定的打击，但进攻之势尚未减弱，继续增调兵力，向苏中重镇海安推进；而淮南解放区则已被敌人突破，华中形势日趋紧张。此时，陈毅同志再次从执行外线出击的方针考虑，认为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为重要，向中央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上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这个建议，态度极为慎重，回复陈毅同志：“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不日，中央军委给我来电：“对苏中目前即取防御方针，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蚌浦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这是一个方案；”“八月内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西移，这是又一方案”，要我就以上两案表示意见。

中央军委的来电，使我充分体会到华中主力使用的方向对全局的影响，问题的中心在于此时究竟是外线出击有利还是内线歼敌有利。我认真地学习和研究了战争开始以来中央军委和军部的有关指示，从战争全局出发，结合当面的实际情况，作了反复考虑，认为：

第一，蒋介石在美帝支持下向我发动全面进攻，在力量对比上暂时具有很大的优势，这场战争势必是长期的，根本的问题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日本投降后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我党已建立了大块的巩固的根据地，在内线同敌人作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这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中央军委七月三十日曾有电报指示：“总以打胜仗为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以执行内线歼敌方针，推迟外线出击时间为有利。充分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多打些胜仗，以大量歼灭敌人。

第二，战争初期，各主要作战方向，应充分利用内线歼敌的有利条件，那里好消灭敌人就在那里打仗，各战区之间有战略性的配合，不宜过早作战役性的配合；如果急于作战役性的配合，我军兵力作更大的集中，则敌人的兵力也将随之作更大的集中，对各个歼敌不利；在兵力对比敌优我劣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大会战，我们是难以有胜利的把握的。在战争初期，我军兵力应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我军指挥艺术的提高和战局向我解放区纵深发展而逐步集中，由一次歼敌一个旅逐步集中兵力，发展到一次歼敌几个旅，这样比较有利。

第三，从当面实际情况看，在苏中打歼灭战的条

件较淮南为有利：

1. 苏中敌军已遭我几次打击，与淮南之敌比较是弱军，有利于我继续歼击。

2. 由于淮南解放区已被敌人突破，如主力向西，必须首先打下盱眙、天长，以开辟战场，需付出一定的代价；如舍盱眙、天长不打而直趋铁路线，则战场狭小，不利于我军机动，后方亦不安全。

3. 淮南正值雨季，大雨滂沱，平地积水甚深，部队运动及粮弹运输供应都比苏中困难。

当时李堡战斗正在进行中，谭震林同志已来到前方，我们共同商讨，意见一致。李堡战斗后，于八月十四日向中央军委呈报了主张在苏中再打几仗的意见。在此前后，张鼎丞、邓子恢同志也表示了主张再在苏中打几仗的意见。十五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批准了我们的建议：“所见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战局助益极大。”陈毅同志也来电指示：“宜就地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军委有此指示，望照办。部队宜争取数日休息，再求新的机动，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经过战争的实践和反复讨论，战争初期的作战方针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

此后，中央军委鉴于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和内线

歼敌的优越性日益显著，再次推迟了外线出击的时间。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这样，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然后转到外线作战的计划，已经发展成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作战的战略方针了。回忆这段历史，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依据战争的客观规律来指导战争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

## 钻到敌人肚子里去

李堡战斗打破了敌人迅速解决苏中问题的美梦。蒋军经过我连续四次打击，已被歼灭三万余人，在苏中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除非从别的战区抽调部队来增援，再难向我全面进攻。敌人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把重点放在扼守南通、丁堰、如皋、海安这条公路干线，加强海安、泰州之线以南的“清剿”和海、如、泰（州）之间的防御，以求确保其占领区。同时积极准备以其整编第二十五师由扬州、仙女庙地区乘虚北攻邵伯、高邮，威胁我两淮。

我军经过连续作战，抓紧休整和补充解放战士，

加上打胜仗的鼓舞，士气高昂，越战越强。李堡战斗我军伤亡很少，而华中军区增调来的生力军第五旅和军区特务团也已于李堡战斗时到达，我军兵力增强，敌我态势已出现了有利于我的明显变化。八月十三日，中央军委发来指示：“苏中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你们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

当时，可以设想两个作战方案，一个方案是从正面进攻海安和如皋，另一方案是避开正面，攻其侧翼或后方，吸引敌人来援，寻歼敌人于运动中。从当时敌人的部署来看，南通、如皋一线是其暴露的侧翼，兵力比较薄弱。驻守在这一带的敌军除已受我严重打击之第二十六旅残剩的一个营外，是新从上海调来的整编第二十一师和交通警察总队。敌第二十一师系川军，战斗力不强。交警总队则是由抗日战争时期顽“忠义救国军”改编的，以“恢复交通”为名专门进行对公路沿线解放区的“清剿”，虽全部配备美械自动火器，但重装备很少，缺乏正规作战经验。我们设想，如果从这里打开缺口，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必将严重威胁敌人的后方基地，打乱敌人的部署，造成歼敌之良机。

此时获悉蒋介石正筹备于二十五日在庐山开会。

我们初拟进攻南通市，吸引如皋、海安之敌南下增援，歼灭他一、二个旅，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扩大我军影响。八月十九日上报中央军委和陈毅同志后，次日毛泽东同志亲拟电报指示：“同意你们南下作战，但不必强攻城市。”“在攻占通如线后，敌人也有固守原地、不敢南下的可能。在敌人不敢增援的情况下，可以西进如（皋）黄（桥）公路，相机进占黄桥，来调动或逼退海安之敌，在运动中歼灭之。”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十分正确，十分中肯，当时进攻南通，条件不成熟。我们当即以黄桥为进攻方向，缩小进攻正面，不攻白蒲，从丁堰、林梓打开缺口，钻到敌人肚子里去。估计那时敌人必将调兵回援，我则于运动中歼灭之。

八月二十日晚上，谭震林同志和我率主力第一师、第六师、第五旅、特务团向南开进，插入敌人侧后。这“敌后”实际上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我们夜间行军，老马熟路，军民都习以为常。十六个团三万多人夜行军，连家犬惊吠之声也难听见，敌人当然更无从知晓。

八月二十一夜十一时半，丁堰、林梓战斗打响。又是一次出敌不意的攻击，进展甚快。二十二日上午，丁堰敌交警第十一总队被我第一师围歼大部。我第六师围攻林梓，全歼守敌。东陈之敌在我第五旅围攻下，

大部逃入如皋，东陈亦被我攻占。

不出军委所料，各据点里的敌人都未敢出援。

丁、林战斗歼敌交通警察五个大队及第二十六旅一个营，共三千余人，缴获甚多（其中有一批敌人拟用以残害根据地军民的各种刑具），打开了西进的门户。这是苏中战役的第五个战斗。

### 攻黄救邵，七战七捷

当我军在丁、林歼敌，打开西进门户的时候，由宿县地区东进的敌人已占领了我睢宁，正准备向我淮阴进犯。扬州之敌第二十五师为了配合这一行动，也全部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沿运河北上攻我江都县的邵伯镇。我着眼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决定以刚从地方武装升级组成的第十纵队（三个团）及第二军分区两个团在邵伯防御，主力部队按原订计划，来一个“攻黄（桥）救邵（伯）”，用攻其必救的办法来调动敌人，寻歼敌人于运动中，并解邵伯之围。我们除以第七纵队在姜堰、海安之间发动箝制性进攻外，第一师、第六师、第五旅、特务团继续此次大踏步机动作战的行动，于八月二十三日夜间向敌人封锁圈的中心挺进。

这是一着奇兵，也是一步险棋。这个地区，南是

长江，东、北、西三面都有敌人许多据点连成的封锁线。封锁圈东西百余里，南北仅数十里，我们竟用三万作战部队插进去，定将大出敌人的意料。

由于老区组织严密，敌人得不到情报，反应迟钝多误。我军由丁堰、林梓越通榆公路西进，敌一绥区并未意识到我军将挺进黄桥，却根据我丁、林战斗的态势判断我将攻击如皋，急令黄桥守敌第九十九旅沿如黄公路增援如皋。八月二十四日，我军截获敌人这一行动的情报，即令部队在行进中严密注意敌情，准备在如黄路与敌第九十九旅打一场预期遭遇战。二十五日，敌第九十九旅进至黄桥东北之分界，与我第六师遭遇，当即被第六师包围，展开激战。这时，敌人才发觉我主力已西进，乃令已南下到如皋的第一八七旅，加上第七十九旅一个团和第九十九旅的一个营，急急向西南增援第九十九旅。该敌又被我第一师在分界、如皋之间的加力、谢家甸截住，将其包围。当夜，分界、加力两地之敌均集团固守。因为敌人实有的兵力远比我原先侦察的要多，经一夜激战，都未能解决战斗。

这样，战局就可能变得不利于我军。西面运河线上邵伯、乔墅一线战斗十分激烈。乔墅阵地已被敌军突破。我主力若在如黄路拖延时日，邵伯一旦失守，战局将起剧变。



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长期熏陶下，我们总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就整个苏中战场来说，敌我兵力对比是三点五比一。由于我们灵活用兵，在第一、二、四、五各次战斗中，我们都集中了三倍以上的兵力对付待歼之敌。有时为了保证全歼和速决，还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四倍、五倍、六倍于敌之兵力。但是我们手头兵力不多，更没有预备队，只能从战场上及时转用兵力。对于这个问题，如南战斗后在海安以东休整时，通过团以上干部的战斗总结会议，大家认识到，“几个打一个”决不意味着我部队战斗力量差；需要时增调兄弟部队加入作战，也决不“丢脸”；至于怕分了缴获的思想则是本位主义作怪。只要作战需要，战役指挥员也应毫不犹豫地转用部队。对这个问题，大家的思想认识已经取得了一致。

在当时紧急情况下，我们立即调整部署，采取断敌后路、隔断敌人东西两部联系的办法，使之无法靠拢和脱逃，然后选取较弱的第九十九旅两个团先行歼灭。八月二十六日，我们将第一师的第一旅由加力方向西调，转用于分界，配合第六师等部以十个团的兵力，五比一的绝对优势，迅速围歼了第九十九旅的两个团。随即又将第六师和第一旅东调，会同第三旅、第五旅以十五个团的兵力围歼加力、谢家甸之敌三个团。二十六日晚，东调各部迅速开进。

此时，邵伯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从八月二十三日起，敌军在炮艇、飞机配合下向我邵伯、丁沟、乔墅一线阵地猛攻。我第十纵队和第二军分区的部队虽然训练不多，弹药不足，但指挥员顽强灵活，动员工作做得深入，士气旺盛。他们依托工事和水面英勇抗击敌人。根据水网湖泊地区正面狭窄的特点，各团采取轮番守备的战法，以连续的反冲击和白刃格斗消灭敌人。第二十五师猛攻了四天，我军工事大部坍塌，许多部队的指战员坚持在齐腰的积水中作战，时常送不上饭，但战斗意志始终压倒敌人。虽然乔墅被突破，但主阵地始终屹立未动。这时，第九十九旅已在如黄路上就歼，第一八七旅等部也将不保。消息传来，敌全线震惊，深受威胁。且伤亡已达两千多人，再打下去，凶多吉少，终于在二十六日黄昏时候狼狈撤回扬州。进行了四昼夜的邵伯战斗遂胜利结束。这是第六次作战。

二十七日上午，我围攻加力、谢家甸之敌的十五个团全部到达了预定位置并投入了战斗。敌人又从如皋拼凑了一个多团的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西出接应，加力、谢家甸之敌以营为单位分路突围。我各部全线出击，将突围之敌一一歼灭，仅数百人逃回如皋。如皋出援的一个多团，也被我歼灭一半。第五旅及时插到如皋西南，正好截断敌人逃路，俘获尤多。我第五

旅衣服为黄色，和苏中部队的灰兰色不同，而与当时蒋军的黄绿色近似。该旅向敌迅猛出击时，蒋军误以为援兵赶到，欢呼跳跃，随即成了俘虏。第五旅继而攻克黄桥，黄桥守敌第一六〇旅五个连缴械投诚。

如黄路战斗，我军共歼敌两个半旅，一万七千余人。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表明我们在指挥艺术和作战方法上都有了新的提高。在“攻黄救邵”的过程中，我军发挥了多种作战形式的威力。以部分兵力顽强阻击，坚守阵地，给主力以行动自由，阵地守备与野战围歼互相协同配合，达到了坚守阵地和寻歼敌军的双重效果。解放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但是，并不排除以其它作战形式为必要辅助。在战争初期，为了迟滞敌人的进攻或者创造有利战机，在某些方面需要打些运动防御战，在不同的战争时期，不同的作战阶段，以至在不同的战役中注意作战形式的适时转换，互相配合，有主有从，相辅相成，是我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一个方面。

苏中战役是中央军委在南下作战，外线出击转变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战略决策指导下进行的。苏中战役同后来华东战场的一些战役比较，其规模是比较小的，但它是解放战争初期在中原突围后的第一个战役，带有战略侦察任务。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军委

起草的给各解放区首长的电报，指出苏中战役“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八月二十六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八月二十七日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精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战役结束后，延安总部发言人就蒋军对苏中进攻惨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称这个战役为“七战七捷”，并指出它对今后的战局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九月三日至八日，晋冀鲁豫野战军胜利地进行了著名的定陶战役，歼敌四个旅一万七千余人，活捉敌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延安《解放日报》于九月十二日发表《蒋军必败》的社论，指出中原突围、苏中战役和定陶战役“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定下来了。”

苏中战役已经过去三十七年了。回忆全面内战爆发以前，当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在苏中面对即将进犯的敌人深感重担在肩，推动着我们对敌我双方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敌我双方互相对立着的许多特点；推动着我们反复思索，从中

探寻战争的客观规律，特别是战争初期的规律，并努力使自己的行动适应客观存在的规律，以争取胜利。

也许今天有的同志会问：双方是老对手了，不但在十年内战中，就在八年抗战的反磨擦斗争中，也一直打交道的。“不打不相识”，双方都是老相识了，而且苏中的地理人情，你们又是熟悉的，为什么还要思索这个问题呢？

我们的回答是，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和我们都有了重要变化，我们必须着眼于战争的新的特点及其发展。蒋介石接收了日军的武器、装备和仓库物资，美国又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批飞机、大炮、坦克和各种武器交给了他，他的兵力发展到了他统治中国时期的最高峰——四百三十万人。同时蒋介石掌握着全国性的政权，中国的地方派系中，再没有人敢于动用武力来打蒋介石了。因此，蒋介石要用全力进攻我们。

与此同时，我方的情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停战协定生效时，解放区城市已有五百零六个，超过过去中央苏区的二十四倍（中央苏区曾有过二十一个县城）；解放区人口达一亿三千万，超过过去中央苏区人口五十二倍（中央苏区最多时有人口二百五十万）。并且建立了东北和热河、察哈尔根据地，从此打破了敌人对我根据地长期四面包围的态势。除新四军第五师地区外，各解放区已联成一片。我们在战争

的初期，就有一个历史上空前广阔的内线作战战场。我军也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其中野战军、地方军各半。

尽管仍然是敌强我弱，但是，敌我力量的重大变化，已使国内战争的主要形式——“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永远结束了，产生着新的规律。为了迅速准确地探明并掌握新的战争的特殊规律以指导战争并赢得胜利，运筹帷幄的最高统帅部密切注视着战争初期的作战，并且用心组织和诱导战区指挥员对初期作战中若干问题进行反复深入的讨论。在苏中战役过程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讨和争议，正是积极探索新的战争特殊规律的求实精神的表现，也是高度的战争责任感的体现；然而，只有作战的实践才可以把不同的意见统一起来，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随着时间的推移，苏中战役所提供的具体经验，有的将会失去它的作用。但是，这种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以指导战争的经验，对我们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研究未来战争是会长期有益的。这是苏中战役在歼敌数字以外的另一重要意义。

## 关于通道转兵一些情况的回忆

罗 明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红军长征至湖南，一路上，敌人调集了强大的兵力，对我们进行前堵后追。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湘江是敌人对我们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经过激战后，我们虽然渡过了湘江，但却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十二月中旬，我们到了通道县。

当时我在叶帅指挥的后勤纵队司令部的政治部当宣传员和联络员。在罗迈（李维汉）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我经常在队伍后面做收容掉队病员的工作。有时也与中央党校学员的干部联系。由于红军在这次作战中受到了严重损失，干部们对军事指挥有很多意见。

我到通道县第二天，就去看望毛主席，并想顺便从傅连璋同志那里拿点急用的药品。我到毛主席的住地（象学校、也象教堂，不象住家房舍）后，警卫员带我见到毛主席。傅连璋同志刚给毛主席注射针药完毕。毛主席见我来了，很高兴。他说他们正在商量军

事问题，要我和傅连璋同志谈谈。这时，毛主席进到大厅与洛甫同志谈话，傅连璋同志和我便在大厅前面的石板上坐着谈话。毛主席和洛甫同志在大厅里面谈话，因为距离很近，我们听得很清楚。洛甫同志先谈红军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激烈战斗和渡湘江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他说，敌人已发现了我们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调集了相当大的兵力企图包围我们，现在处境极其困难。今后应该怎么办？还想不出好的办法。洛甫同志谈了很多，如实地摆出了当前的困难情况。我和傅连璋同志听了都感到问题很严重。接着听到毛主席讲话，声音很宏亮。他说：一九三三年冬第五次反“围剿”不久，发生福建事变。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准备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派代表来中央苏区和我们订立反蒋抗日协定。我主张红军主力要突进到江浙地区，迫使敌人回援。这时，我们与十九路军配合，共同打击蒋介石的进攻。趁机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当时你们不实行出兵。敌人打败了十九路军后，又回来向我们根据地进行“围剿”。敌人继续采用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后来我又提出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地区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地区予以消灭，你们又是不听。现在我们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无论如何不能照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了，因为敌人已调集



了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主张现在应坚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开辟北上抗日的道路……我和傅连璋同志一起听了一个多小时。听了毛主席的谈话，感到红军前进有了正确的方向而极为高兴，随后我们就走了。

当红军向贵州地区前进后，我听说中央军委在通道开了会议，但会议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 争取十七路军 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

汪 锋

一九三五年十月初，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中央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了陕甘苏区根据地。当时蒋介石为了进攻红军和陕甘苏区，在西安成立了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动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一部分蒋嫡系部队对陕甘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大“围剿”，以东北军为主力，由南向北疯狂进攻。中央红军一到陕甘苏区，就同十五军团一起，参加了反“围剿”的斗争。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了这次反“围剿”斗争。有名的直罗镇战役，便是在毛泽东同志亲临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伟大胜利，给面临亡国惨祸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给全国人民争取抗日与民主的群众运动以巨大鼓舞和有力推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象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党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人民群众中深入人心，也影响了统治阶级的中上层。

不但在统治阶级政界发生影响，对那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军人也有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对于被蒋介石驱赶到陕甘前线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对于两军的统帅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时候，我党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从此，党对张、杨以及东北军、西北军（即十七路军）广大官兵开始进行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前，我曾长期负责十七路军地下党的工作。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把刘志丹等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抓了起来，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央红军刚到陕甘苏区南部郿县一带的时候，我们还被关押在瓦窑堡。党中央派贾拓夫、王首道同志把我从红二十五军政工队释放出来。

十一月间的一天，贾拓夫同志通知我，要我赶到前总驻地——郿县西边的套通塬东村谈工作。我由瓦窑堡星夜赶到前线总指挥部。其时，直罗镇战役刚结束，全歼了东北军牛元峰的一〇九师，大量物资和俘虏需要处理，前方异常忙碌。前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招呼我住下，告知我来这里是毛主席调的，工作将由毛主席当面指示。

在我到达前总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约我谈话。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住在一个群众住的土窑里。毛主席一见到我先问了陕北许多同志的情况，然后谈到了将要分配我去做的工作。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所了解的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说，十七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受过大革命洗礼。从大革命以来，有不少知名的共产党员如魏野畴同志等在这个部队中做过工作，还有不少党员至今在十七路军中做秘密工作，在杨虎城将军周围还有一些同情我党的进步朋友（如杜斌丞先生等）。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长期在陕西省委的军事委员会作负责工作，对这个部队的历史和人物情况比较熟悉，我愿意尽力做好这项工作。

在那几次谈话中，毛主席反复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我党的政策。毛主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前，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了。在此民族危亡的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敌人阵营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分裂。在这种形势下，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

我们的国内政策要作适当的调整：要改变消灭富农的政策；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开明绅士；要争取中产阶级和地方势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对他们过去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只看他们生活怎么腐化，只要现在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石胁迫让打的，不打他就完了。为了争取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暂时让出一些地方。

接着，毛主席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毛主席说，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以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毛主席说，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

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

最后，毛主席谈到派我去西安的任务。毛主席说：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说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难和危险是有的；我们把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还具体指示，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听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和对我党政策的深刻阐述，我感到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思想大解放。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实行狭隘的关门主义策略；四处树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自己搞得很孤立，路子越走越窄，工作被动，损失很大。现在，毛主席来了，端正了党的政策和策略，革命道路开阔了，工作好开展了。我信心百倍地去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艰巨任务。

毛主席同我谈话结束，我在前总又住了几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又给我不少指示和办法。等毛主席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交给我以后，

就从前总出发，经过张村驿赶到关中特委所在地九头塬蓝衣村。

关中特委许多同志是我很久不见了的老战友，为了保密，没有一一见面。我只同有关同志积极地进行准备，找化装衣物，证件，研究选择外出路线。关中特委特从边境调了一些地方干部提供情况，参加研究。有的同志主张经赤水（苏区新建县，地在旬邑县西部）出苏区，有的主张经正宁县由庆阳出苏区。这些主张都有缺点。后来，我同邠县北后区工作的地方干部赵洪同志谈话之后，决定从邠县与长武县之间出苏区。这个地区没有正规部队驻守，虽有民团，但晚上不敢出来骚扰。只是我路不熟，需要找个带路的同志。路线决定以后，便起身，当晚到达赵洪家中。由赵洪找到了一个在乡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人为我带路。我们研究了边界情况，便和带路的同志向长武出发。天明前已出了苏区到达泾河东岸。

从离开关中苏区，一气走了大约一百五十华里，虽然有些疲倦，但却是一帆风顺的。在距长武县二十五华里的地方，碰到了两个便衣特务，对我进行了仔细的盘问和搜查，缝在我的皮衣里边的毛主席写给杨虎城等先生的信，也被搜了出来。幸好这俩是“土特务”，当看到信是写给绥靖公署主任的，便有些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发落。我就装出一副国民党大官的神

气，大声问他们是谁派出来的，并吓唬他们说：你们这样乱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都是不利的。这两个家伙更加发慌，说他们是长武县政府派出来的。我知道长武县县长是党伯弧，乃十七路军中的老人，是忠于杨虎城的。这时，我比较放心，对两个便衣说：我是十七路军的高级特情人员，是杨先生派到苏区边界做工作的，现在回西安去报告工作，同你们的党县长也是老朋友。他们相信了，请我们到附近村子休息，吃饭，并把他们搜出的信件还给我。

当时我考虑，把这些信秘密地从长武县带到西安，是很不容易的，同时，这两个便衣也难免不走漏消息，但估计党伯弧还不至于破坏我们的事，因为这件事暴露出去，对于十七路军是很不利的。于是，我决定设法和党伯弧见面，争取他的同情，以免泄露秘密，顺利到达西安。长武县的城门是由“中央军”守卫的，这一关如何通过，就是一个问题。为了避开进城的检查，我给党伯弧写了个信，诈说奉杨先生之命，有要事商量，要他到城外相会。此信由一个便衣先送去。大约下午六时，我们到达长武县北门外，党伯弧果然在路边等我。党命令便衣离开以后，我对党从实说明了来意，简略地讲了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的形势，蒋介石不信任并削弱十七路军的事实和杨先生同我们已



有多次来往，此事关系国家大局，也关系到十七路军的前途，要他加以协助。我谈完以后，党伯弧县长表示帮助，并说他同十七路军是利害相联的，一定想办法平安地送我到达西安。党所顾虑的是两个便衣知道了，不好保密，长武到西安三百多里，万一出了岔，不好办。我告诉党可以按我告诉便衣的说法，对付便衣。至于护送方法，可以选择可靠人员用押解的办法，可以保证安全，万一出了事，也可以避免连累他。他同意了，同我一块进城。第二天清早，党伯弧选派他的亲信——保安队队长带了四个兵，用大卡车“押送”我往西安，汽车一直开到西安新城绥靖公署。杨虎城先生见到了毛主席的信以后，让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我。此人曾参加革命，渭华暴动时，我们曾经认识，后来，他消极了，但还认识我，表现特别亲热。他们把我安置在西华门军法处看守所。张依中向所长吴怀仁介绍，我系十七路军的特情人员，是被红军俘虏后逃回来的，需要审查以后才能复职。看守所所长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狱吏，习惯于奉迎，他看到我同他的长官平出平入，便尽量向我献殷勤，安置我住在一个较好的房间里，每天单独开饭，极表关怀。我名义上虽然是“犯人”，实际上却是比较自由的，可以到张依中、吴怀仁的办公室里去闲话，了解情况。谈话中张依中一再表明他所以脱离革命，只是同

某些人有不同意见，没有做过坏事，如有需要他的地方，他一定尽量帮忙。一次，谈起渭华暴动，张说他对刘景桂（刘志丹）同志印象极深，详细问了刘的情况。

大约一周后的一天晚上，张依中来说，杨先生约我谈话。并开来一辆小车，送我到新城。杨虎城先生在新城大楼门口等候，接我入西客厅谈话，没有别人参加。首先由我代表毛主席向杨先生问好，说明了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没有等我说完，杨先生就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认为红军不讲信用。他说：我部孙蔚如驻防汉中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过来往。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地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

第二个问题：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张汉民，中央（指国民党）一再指责我，说张是共产党员，陈立夫对我也亲自谈过。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柞水九间房设伏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意的。

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呢？

我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我说，贵部孙蔚如先生同我红四方面军有来往，我们是知道的。贵部派的张含辉，到过通、南、巴苏区，我红军四方面军，保证了安全，双方并取得了谅解，因而贵我两军在两年中，没有大的磨擦，孙部得以安驻汉中，兵员有了很大的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了协议的。后来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区，积极向南扩展，势力伸张到四川西部，不仅我军侧面受到威胁，同时孙部也受到威胁，而孙部对胡宗南部不加抗拒，任其发展。特别是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时，胡部已伸入到嘉陵江西岸一带，阻碍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了顺利地同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必须安全地渡过嘉陵江，要安全渡江，必须设法调离沿江驻守的胡宗南军队。所以才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明攻汉中，威胁天水（胡军后方），调动胡军返回天水。胡部果然以为我军攻打汉中、天水，撤回了川西部队，集中天水防我进攻，给了我红四方面军回师西进的良好机会，安全地暗渡嘉陵江，完成了和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这种军事行动，说清楚了，先生是会谅解的。杨先生知道，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果决心消灭孙部，就可以依靠川北苏区，三路出击，东路依万源、城口进攻镇巴、西乡；中路依通、南、巴翻越巴山进攻南郑；西路依广元进攻宁强、沔

县。东、南、西合围南郑，汉中地区腹背受攻，不是更容易得手吗？何必单从西路一线进攻汉中呢？这点也正充分说明了我军攻击汉中地区，只是调动胡军之手段，并不是以歼灭孙部为目的。

红军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后，长期行动，得不到补充和休整，有困难。该部到达陕豫边地区后，是准备休整的。可是贵部柳彦彪旅，天天尾追，逼得红二十五军不得不自卫，山阳一战该旅溃败，而贵部警三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并且张部尾随比柳旅更为接近。红二十五军误认该部再寻机攻击，遂于柞水之九间房接火战斗。在战斗中，张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自从突围以后，和上级失掉了联络，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被误杀了。这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因为张汉民确是我党党员，现在我党中央已追认张汉民同志为革命烈士。这个事件，对于十七路军说，当然也是一个沉痛的损失，但却可以用来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有力材料，以张汉民同志被杀来反击国民党陈立夫等的指责，说明十七路军并没有什么共产党，打掉蒋介石削弱十七路军的借口。

至于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中，有明确说明，毛主席给杨先生也写了信，想必杨先生也是清楚的。今后贵我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会互不伤

亡，这对十七路军之发展壮大和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我们认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之发展，也就是蒋介石卖国势力的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西北军和东北军的明确态度。

杨虎城先生在谈话中多次暗示十七路军上下官兵都是齐心的，能够听他的话。但对谈判的具体内容没有明确态度。从语气和神态看来，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赞成的，对这次谈话也是满意的。杨先生最后向我说，他今后不能多和我谈，指定王菊人先生（当时任杨的机要秘书）和张依中先生继续同我接谈。并说如果事情完了，有一位老朋友要我带往苏区。此后杨先生还接谈过两次，是礼节性的。一次是（王菊人先生在坐）同意王先生同我谈话的内容和所定的联络办法。一次是我要返回苏区时的寒暄，表示代问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好。

同杨谈话以后的第三天，王菊人先生约我到中柳巷他的家里谈话。王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革命组织，我们是相互知道的，但这次见面，王却表示很疏远。他一开口就说红军经过长期行动，到达陕北可能很疲倦了吧？分明是暗示红军联合他们是出于不得已。我说：红军主力已顺利到达目的地陕甘边区了，初进

苏区便打了几个胜仗，吴旗一战歼灭马步芳的野骡子旅大部分；直罗镇战役，东北军牛元峰一〇九师全部歼灭，王先生大概听到了吧！因我这样回答，王就转换话题说：贵部到西北后，对马回回军如何对待？马家军以强悍著称，搞不好，很麻烦。我说：马家部队也不是蒋的嫡系，如果他不积极骚扰，我军亦愿意互不攻击。同时，马家部队也和红军较量了一下，并未占到便宜，看起来也不象传说的那样勇猛。接着王菊人先生表示同意同红军建立关系，但极力宣称十七路军是有革命传统的，这次和红军建立关系，是为了革命，望双方都能抱定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原则。我说：我们都是西北人，十七路军的情况，我还知道若干。为了国家的利益，两军的利益，为了西北人民的利益，我们都应为两军的联合尽一份力量，促成两军的合作。

从王菊人家出来，回到军法处，张依中早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他一见面，就对我说，王菊人不够朋友，爱弄小聪明，要我多加注意。张说这话的用意何在，我一时弄不清楚，只好随口应答几句。从张后来的谈话我才了解到他是在极力表示要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由于张依中的帮助，我能够自由外出访朋探友了。于是我就设法会见杜斌丞先生，从朋友那里知道杜斌丞先生住在大湘子庙街。在一个晚上，张依中先生约

我到他家谈话，张住在正学街。由张依中家中出来，我就去杜先生家中，杜先生亲自出门迎接。我告诉杜先生，毛主席有信给他，都在杨先生那里，不知收到否？杜说没有接到。他估计可能是被杨先生扣押了。杜先生表现很热情，问了陕北许多熟人的情况，继而分析了杨先生的态度。他说杨敢干，直爽，对蒋介石统治不满，也有一些进步思想，但有些简单，抱有统治陕、甘的“雄心”。杨先生对红军有些害怕，宜多作解释，以打消他的顾虑。随后杜先生也提到张汉民的问题，并说朋友们都很关心这件事的真相。我便老实地告诉了张遇害的经过，说明这个误会是大家的不幸，党中央已追认张为革命烈士。杜先生听了以后表示说党处理的很适当。对于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问题，杜先生说，他是不准备离开十七路军的，今后当极力促成两军合作抗日。我辞出时请求杜先生代我约邓宝珊军长，他慨然答应了。以后也还多次设法去杜先生公馆，了解西北各方面的情况。有天晚上同杜先生谈完话回到住处，天已很晚了，张依中派人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张对我说，你近来活动的太多了，已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杨先生也知道了。不知什么人出的主张，杨先生已令我处庞志杰队长监视你的行动，怕你出岔子。如果在外边被中央发觉，立即设法把你抢回来；假如不可能，要先开枪伤害你，千万不能让

国民党把你活捉了去。我很耽心，所以才秘密告诉你。杨先生这样布置，是为了十七路军的利益。张这样告诉我，是真是假，不太清楚，不几天庞志杰也把杨决定的内容秘密告我。但是说明了我的行动是被十七路军方面大为注意了，必须小心一些。过了几天，王菊人又约我到他家谈话，这次王的态度比较客气。他说你可以返回苏区了。杨先生认为红军和十七路军都是抗日部队，双方力量都不应削弱，要互相谅解，双方都应当避免冲突，行动尽量告诉对方；如果遭遇，双方都不要采取包围追击。你需要什么东西，可以买点，前次杨先生告诉的××先生和你一块去，请你多加照应。

在西安住了约一月，到此告一段落。临行前到杜斌丞先生家里辞别，传达说杜先生去了三原，他代我约会的邓宝珊先生也没有可能见到了。

过了一天，张依中通知行期和路线。他说，明天就走，同行人在北门外会齐。坐马车经三原去淳化，淳化驻军是特务二团，团长阎揆要。我听后内心确实高兴，因为我和揆要同志可以见面了，我们分别已有一年多了。张还说，杨有电话给阎团长，说你们是中央派去陕北谈判的大员，要阎亲自接待，要我不可露出马脚。送我们的又是庞志杰。真凑巧，送的和接的都是共产党员和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那有不放心的



呢。早七时在北关集合了，杨先生要我带往苏区的那位先生在三原，我俩住在一间房子内，才知道这位“代表”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叫王世英。

次日下午四点左右，到达淳化县，阎揆要团长在城南门外等候，庞和阎是老同事，先由庞介绍了王世英同志是杨部高参；介绍我是“中央大员”赵仲远先生。阎团长摸不清头脑，只是点头。回到团部后，阎说，原来“中央大员”就是你。在阎揆要同志的团部住了一夜，由雷展如同志送我们到苏区边界，雷当时任连长，也是一位陕西军委领导的老共产党员。

我们进入苏区走不到二里路，就被一支武装包围了。他们是当地的游击队，看我们穿着长袍，带着礼帽，不由我们分说，硬要捆我们到队部去，我们怎样解释也不听，队员叫我们“反对派”（陕北苏区群众把国民党叫反对派）。到了队部，见到队长，他笑着说：“我的汪政委，几乎把你当反对派了”。队长姓杜，是红军二十六军的班长，他是认得我的。休息吃饭以后，由杜队长派人送我们去关中特委所在地蓝衣村。

**附记：**这份材料是一九四二年在关中边区马栏镇写成的，这次仅在文字上略作了修改。

一九五八年六月于青岛

## 谈谈我在绥蒙工作的简况

白如冰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绥蒙一带做过几年工作，由于事隔久远，好多事情已记不准了。现仅就记忆所及，把自己认为确切的史实写在下面。

### （一）在三边（定边、靖边、安边） 特委工作时期

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央红军进行西征，解放了陕北的定边和宁夏的盐池县。中央红军西征后，在陕北保安一带的一些中央机关和党校等陆续移到定边和花马池一带。这一带与内蒙古的伊克昭盟相邻。要在这里开辟工作，必须同时进行伊克昭盟的工作。于是中央决定派董必武、毛泽民、李维汉、贾拓夫等同志到定边成立三边特委，开展三边、伊盟和宁夏的工作。西安事变期间，部分红军主力南下陕西关中地区，配合张学良、杨虎城部队防备蒋介石军队的进攻，中央

党校及三边特委的一些负责同志也相继南下。中央决定撤销三边特委，定边县成立中心县委。这一带的工作由陕甘省委直接领导。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组织部长是蔡畅同志。特委撤销后，为了开展蒙民和回民工作，另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高岗，还有杨一木和赵通儒同志。

一九三七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绥东地区，并继续西侵。归绥、包头危在旦夕，伊盟地区的形势也正在发生急剧地变化，陕甘宁苏区受到威胁。为了保卫陕甘宁苏区，一九三七年秋，中央决定再次成立三边特委，并同时成立三边专署，以加强定边、靖边、盐池一带的工作。三边特委成立后，高岗调回延安，担任边区保安司令员。少数民族工委合到三边特委，由特委统一领导蒙民和回民工作。伊克昭盟和宁夏工作由特委领导。

三边特委的人员组成是：我任特委书记、刘英勇同志任组织部长、白坚同志任宣传部长、赵通儒同志任蒙民部长、杨一木同志任回民部长、白寿康同志任保安司令、赵苍璧同志任公安处长、白成铭同志任青救会长、甘渭汉同志任警备二团政委、王子义同志任三边专员兼定边县县长。此外，白凌云和肖彩丰同志分别担任妇救会长和工会会长。

三边特委成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开展

蒙民、回民工作，如何深入伊盟和宁夏，掌握当地的情况。为此，三边特委继前少数民族工委之后，又派出一批批干部分别到伊盟的乌审旗、鄂托克旗、扎萨克旗等地进行活动。还派薛向晨等到桃力民一带，和原在这里活动的韩峰（韩是今）、杨子华同志一起，对这些地方的敌情、友情、军情、民情及地方政权和上层人士的情况作了比较全面地了解，为我们后来挺进伊盟、深入后套<sup>①</sup>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 （二） 在蒙古工作委员会和绥蒙工作委员会工作时期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本侵略者侵占了归绥城，不久又占领了包头市，伊克昭盟面临日寇入侵，斗争形势迫切需要党在这一地区进行具体、深入的工作，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但由于三边特委住在定边，具体领导内蒙古工作有一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特委决定我回延安把我们在伊盟等地的工作情况，向陕甘宁边区党委和中央负责同志作一汇报。边区党委和中央负责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都认为蒙古工作再由

---

① 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南、黄河沿岸的地区，统称河套。以乌拉山为界，东为前套，西为后套。

三边特委领导有困难，需要成立蒙古工作委员会专门领导和开展内蒙古工作。故于一九三八年四月，成立了蒙古工作委员会。由我任蒙委会书记，赵通儒、于占彪同志为委员（当时这些同志没有具体分工）。蒙委机关由定边县城移到靖边县的张家畔。

蒙古工委成立大约一个月左右，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根据绥远省敌我形势的发展，认为光开展蒙民工作不够，需要蒙、汉民一起动员，共同抗日。决定将蒙古工委改为绥蒙工作委员会。绥蒙工委继续住在张家畔不行，需要进到伊盟内地来领导这场斗争。绥蒙工委就迁到伊盟内地的桃力民。这块地区，汉人较多，人口较密，适宜驻扎一部分部队。

绥蒙工委的组成人员是：我任工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李衡同志任组织部长、赵通儒同志任蒙民部长、于占彪同志任军事部长、白成铭同志负责青救会工作。工委委员还有云泽（即乌兰夫同志）、白海峰、孔令甫、刘兴源等同志。白凌云同志负责妇救会工作。绥蒙工委对外是以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出现。我这个工委书记称作政治部主任，对外都叫我白主任。

要深入内蒙古内地工作，首先要有武装力量。绥蒙工委的工作范围主要在绥远省黄河南部的伊克昭盟和河套。这一带是国民党傅作义的根据地，回民马鸿

兵的部队也驻在这一带，东北马占山的部队也常来常往，还有一些其他杂牌军也在不时出没。在这些地区，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蒙民和回民群众，其次还要做国民党内部的工作，对当地上层人士的工作也不能放松。在这种复杂情况下，远离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的伊克昭盟，随时都有受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士绅控制的民团等袭击的危险。没有武装做后盾，单是工委机关深入内蒙古内地工作是根本不行的。基于此点，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将陕北红军的老骑兵团（三、四百人）划归绥蒙工委，跟绥蒙工委一起进入伊克昭盟，编为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孔令甫同志任司令员，我（兼）和刘兴源同志任政委。一切准备就绪，于一九三八年五月我们从靖边县的张家畔出发，途经定边、盐池、五湖洞、鄂托克王府、察罕淖尔，历时六天，最后到达桃力民地区。工委和司令部就设在康布尔庙。

要深入内蒙古内地工作，就要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斗争。群众是革命力量的源泉，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无论什么事情，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事情就好办，工作就顺利。绥蒙工委在群众工作中，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制订严格的组织纪律。当时，在伊克昭盟，不论是上层人物或是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不了解的，加上敌

人从中造谣破坏，更对我们怀疑害怕，不敢接触。要使群众了解我们，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必须取信于民，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求干部、战士坚决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尊重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尤其是蒙民的风俗习惯。实行买卖公平，不准随便拿群众的东西。我们从边区出发时，中央和边区党委发给我们四万元“白洋”，作为我们开辟伊盟工作的经费。当时我们吃的粮食、马吃的饲料等都是用“白洋”按等价交换原则买来的。我们严明的纪律，受到了群众的热情欢迎。二是组织群众抗日团体。就广大群众而言，长期以来，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蒙民还受王公贵族的压迫，一般来说他们有着抗日的要求，但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没有组织，他们的要求就不能表现为抗日的力量。因此，我们在宣传群众起来抗日的同时，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及时地把农（牧）民、青年、妇女都组织起来，成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当时，这些群众组织除做群众工作外，还做一些地方政府的工作，因而具有政权的性质，但它不以政权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出现的。这些地区在地方上有蒙旗政府，有王爷领导。在汉人居住地区有傅作义的地方政府。群众组织若以政府的名义出现，容易发生矛盾。依靠群众团体既可更好地发动群众，又能对日斗

争形成有力的拳头。在这些群众团体的影响带动下，形成了群众性的抗日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工作有了一定基础的情况下，我们因势利导，建立了党的组织。在乌审旗、鄂托克旗、扎萨克旗、郡王旗、杭锦旗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对外叫作抗日救国会）。桃力民是汉族聚居地区，有十几万人口，大部分是陕西省神木、府谷、梅林、横山和三边的移民。成分比较复杂，有地主、士绅，还有地方武装。另外，它是伊盟的中心地带，又是绥蒙工委所在地，这里工作的好坏牵动全局。绥蒙工委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工作，专门成立了桃力民工委，由白成铭同志任工委书记，白凌云同志参加工委工作。桃力民工委成立后，积极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在当地干部杨子华同志的具体负责下，还建立了小学校，使青少年能够受到教育。这些工作都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当地广大基本群众认为工委是为民众谋福利的，是可以信赖的。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坚持“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和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的一贯方针。绥蒙工委认真贯彻了这一方针，大力发展了统战工作。当时，绥蒙一带主要的统



战对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方上的上层人物，包括各旗的王公贵族，地主绅士、富户等。另一方面是友军，如傅作义、马鸿宾的部队等。在统战工作中，我们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有利于抗战的前提下，有些问题可以谅解，有些问题可以变通。我们在统战工作中的主要作法是：一、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讲明抗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分析不抵抗的危害性，启发他们的民族感和正义感，争取他们起来抗日。二、通过他们在我党的老乡、同学和其他社会关系，做他们的规劝和说服工作。通过统战工作，一些上层人物拥护抗日，支持抗日。如乌审旗的二爷和乌审旗掌军权的那素营长，他们经常与我们联系，在开展乌审旗工作中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又如傅作义在桃力民的自卫军是地方士绅和富户的军事组织，其司令越兆仁、副司令史仙舟，参谋长韩峰都拥护、支持抗日。韩是陕北神木人，曾在神府苏区工作过，到桃力民后做了大量工作。虽与我们没有直接的组织联系，但我们一直待他如同志，后来他加入了共产党。还有个大队长叫张新斋，是神木人，据传他过去参加过党，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来到桃力民成了地主。经过我们的工作，他对我们开展伊盟工作有过多方面的支持。再如住在后套的马鸿宾也和我们有过来往。有一次，我们骑兵团的一个连，到临河县的黄河南岸活

动，马鸿宾害怕我们过黄河威胁他们的后方，经过协商，他送给我们四十石豌豆做我军的马饲料，还送给我们一张绥远省军事地图。三、加强对新三师的工作。在新三师（即蒙骑独立旅）中，有我党的组织，并有我党的云泽、白海峰两同志在里面担任领导职务。云泽同志是新三师党的领导者，对新三师的官兵影响很大。他们驻在伊盟东部，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支持。绥蒙工委委员赵通儒同志曾两次到新三师传达中央和工委的指示。因此，这支部队尽管当时在名义上不是我们的部队，但却为我们做了许多工作。

总的看，通过各种形式的统战工作，我们争取了部分上层人士和友军官兵，孤立了反共顽固派，团结了各阶层人民，促进了绥蒙地区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

### （三） 在绥远省委工作时期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为加强绥远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决定成立绥远省委。省委主要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李井泉同志带领的一二〇师的七一五团（到大青山后叫李支队）；另一部分是由我带领的原绥蒙工委的部分干部，另外还有动委会的同志参加。中央决定，省委由白如冰、武新宇、刘瑞生、李井泉、

赵通儒、于占彪、白成铭七人组成。我任省委书记兼蒙民部长，李井泉同志除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外，还兼省委军事部部长，于占彪同志任军事部副部长，武新宇同志任宣传部部长，白成铭同志任组织部部长。伊盟的赵通儒和后套的刘瑞森同志为省委委员，仍分别留在伊盟和后套工作。绥蒙工委部分同志上大青山后，为了坚持伊盟这个抗日据点，决定成立伊盟工委，由赵通儒同志负责。后套特委不变。伊盟和后套最初则归绥远省委领导，只因远离大青山，又被敌占区所隔，领导有困难，省委建议中央，伊盟和后套由陕甘宁边区直接领导。中央决定伊盟工委和后套特委除在建制上归绥远省委外，一切工作均归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绥远省委的一些重要决定，可以通知伊盟工委和后套特委。一九四〇年二月前，绥远省委因距北方局较远，中间又有敌人割据，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当时归中央直接领导。同年二月间，贺龙、关向应同志带领的一二〇师从河北省到晋西北后，绥远省委除受中央领导之外，还直接接受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也就是归贺、关领导。

一九三八年冬季，李井泉同志带领七一五团和太原成成中学师生改编成的四支队从晋西北挺进大青山。姚喆同志任李支队参谋长，彭德大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彭牺牲后，由张达志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原住伊盟

的绥蒙工委的部分干部，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从伊克昭盟出发，经过陕北的神木、府谷到晋西北，又经过左云、右玉、岱海滩，克服了敌人的尾追堵截，历行两个多月，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到达大青山，与李支队会合。从此绥远省委正式进驻了大青山。在大青山的主要工作是：

1.调整部队结构，发展抗日武装。七一五团从晋西北动身时，全是步兵，不适应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因敌伪军是汽车等机械化部队和骑兵，国民党的部队也是骑兵，我们是步兵则不好活动。同时该地区区域辽阔，东到兴和，西临包头，南到清水河、托克托等县，北到陶林、武川、四子王旗、固阳；地形也特殊，当地人讲，“远看是大山，近走如平川，骑马一蹦子，人走得半天”。为了适应大青山地理环境和对日作战的要求，我们把步兵改编为骑兵，叫做骑兵支队。这就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开始，骑兵支队既要担任作战任务，又要负责省、地党群机关的警卫工作，两头忙碌，互相影响。为了使骑兵支队集中力量作战，我们又新组建了个二支队。这支部队主要做省委、行署、地委和专署及县委、县政府的警卫工作，有时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解决了作战和警卫工作之间的矛盾。为了扩大蒙民抗日武装力量，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我们组建了蒙民游击队，

队长是高凤英同志，蒙族人，是个老同志，好同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火烧沟牺牲了。蒙民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不小。它活动于归绥、武川和陶林一带。这支部队的建立，使广大蒙民看到了自己的武装力量，鼓舞了蒙民群众的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除了组建蒙民游击队外，我们还在一些地方组织了“武工队”，他们一般在基层党政组织的领导下，有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有时单独活动，经常给敌人制造困难。这些小武工队，在思想和作战等方面成熟了，就推荐到二支队或吸收到主力部队中来，这也是我们发展抗日武装的一种形式。

2. 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人民政权。在我们进入大青山之前，就有一批党员在这里工作，如杨植霖、武达平、李维中、刘洪雄和蒙族干部奎璧、贾力更、高凤英等同志。他们在八路军未上大青山前，都做了不少工作，为我们上大青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杨植霖同志还创建了一支游击队，抗击日寇。因此，这里党的工作有一定的基础。我们一上大青山就注意着手党组织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先后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了党的组织，并成立了地方政权。省级政权的前身是绥远抗战动员委员会，由武新宇同志任动委会主任，王廷弼同志任副主任，武新宇同志于一九三九年秋回晋西北后，由王廷弼同志代主任。一九四〇年春，反

顽固斗争后，经中央和贺龙同志、关向应同志批准，动委会改为行政公署。

在党组织和政权建设中，我们注意充分发挥原在大青山工作的和当地的干部的作用。这些同志有的长期在这里工作，有的土生土长，对各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与各阶层的联系也比较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离不开他们，建党建政、组织武装也离不开他们。因此，在党组织和政权中，他们大都担任了重要职务。绥西地委书记兼专员是杨植霖同志，后来杨当了行署主任后，由李维中同志接任他的职务。绥西地委机关常驻万家沟、大南沟、德胜沟、井尔沟。管辖的范围是武川和归绥的西部，固阳的一部分，以及萨县、托克托县等地；绥中地委书记兼专员是武达平同志，后来贾长命同志任地委书记后，武任专员。武达平同志去延安学习后，由杨叶澎同志接任专员。他们的工作范围是武川和归绥的东部，陶林、四子王旗等地。绥东地委书记是白成铭同志，专员是程仲一同志。地委驻蛮汉山，管辖的范围是凉城、集宁、兴和等地。绥东、绥中、绥西地委、专署建立后不久，又成立了绥南地委和专署。地委书记是崔岩同志，专员是杨国兴同志。管辖的范围是清水河、和林格尔和归绥南部。

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开展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工作，我们还建立了中共土默特

旗工作委员会，专门做蒙古民族工作。这个机构相当于地委级，负责人是奎璧、贾力更、张祿同志，还有勇夫、赵诚、李森等同志也在土旗工委领导下工作。工委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土默特旗，有时亦到包头等地活动。他们多是利用民族、亲戚、同学、朋友关系，搞蒙族中的统战工作、伪蒙军工作、群众工作，同时，发展蒙民抗日组织。

3. 向延安输送青年，为蒙、汉民族培养干部。随着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发展，我们的干部越来越不够用，尤其是蒙族干部更为缺乏。另外，伴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日寇和伪蒙政权与我们争夺青年的斗争也日趋尖锐，日伪政权欺骗青年，有的被他们送往东京和新京（即现在的长春）“训练”。国民党傅作义引诱青年，有的被送往后套“受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力量争取青年参加革命。但由于游击根据地没有办学条件，集中办训练班培养大批青年有困难，我们只能采取往延安输送青年，学习一个时期再回来工作的办法培养干部。我们在选拔蒙、汉青年到延安学习时，不过分强调阶级成分，不论蒙族、回族和汉族，只要抗日，愿意到延安学习，就选派。这样，有不少上层人物的子弟去了延安。这样做的结果，既培养了我们的干部，又发展了统战工作。因为，上层人物的子女参加了我们的工作，他们与我们的关系自然

拉近了,有什么情况和变化,他们就给我们通风报信,为我们做了好多我们自己所做不到的事情。当时,输送到延安去的青年有八、九十人,蒙族青年居多。据说他们现在大部分已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

4. 采取各种方式,运用多种关系,分化、瓦解敌军。在大青山驻有伪蒙军和傅作义的自卫军及国民党的其他部队。在这些部队中,有的和我们有联系,我们就争取他们为我们工作;有的在他们的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着矛盾,我们就利用矛盾做工作;有的顽固反共,我们就揭露批判。我们在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注意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具体做法是:第一,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伪军工作,取得对抗日的同情和支持。如当时在毕克齐和察素齐一带住着伪军防共第二师(师长叫韩五),该师有许多官兵是绥远和土默特旗人。我们这边有他们的同乡、同学、亲戚和朋友,通过这些关系做伪军官兵的思想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敌人要“扫荡”,他们就给我们送信;我们缺医少药,他们就设法帮助解决,我们的伤病员也可在他们那里治疗;老百姓给我们送粮食,他们也不阻挠;有时我们的同志化装出山,他们还给我们开护照。第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顽固派。傅作义自卫军司令叫张钦,副司令叫于存灏,参谋长是鄂友三。鄂是蒋介石派去的嫡系,用以监视张、



于等人的行动。这个家伙很坏，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张、于虽有反共一面，但他们处于被监视的地位，对鄂深怀不满，他俩亦有抗日的要求，特别是他们的大多数部下，都是当地人，与社会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针对这种情况，我和李井泉同志曾亲自到他们的司令部，采取“拉于打鄂”、争取多数的办法，来分化他们。效果虽不很明显，但没有起坏作用。他们第十二团团团长叫王德保，和我们的关系比较密切，经常为我们提供一些情报。第三，深入伪蒙军内部掌握军情动向，为我所用。在伪蒙军中，德王、李守信的部队很顽固，对他们的争取工作很难进行。但伪蒙军的第六师第十八团的团长李秀山，经过工作，和我们的关系不错，我们就派李才、勇夫等同志到该团开展党的秘密工作，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日伪军的一些情况。

5. 选派得力干部，开展隐蔽工作。为了使党的工作能在各方面扎根，为了使党的工作在敌占区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和更好的开展，我们挑选了一些同志转入地下，做隐蔽工作。他们化妆成商人、医生、农民或神职人员等，深入城市、农村、教堂等地，采取交朋友、拉关系、做买卖等办法，了解社情、军情、民情，发展地下党的组织，开展地下斗争。我们曾派石国柱同志到武川乌兰花的窝儿兔沟的一个比利时教堂当神职人员，从中了解日寇和国民党的情况（因为这个教

堂与日帝和国民党都有来往联系),从四〇年派进去,一直工作到日本投降。派绥西的刘启焕同志转入托克托县和萨县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活动。派宁德清、刘伟同志到厚和(当时叫归绥城,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去和在那儿的刘洪雄同志一起开展地下工作。他们组织了“绥蒙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在学校、铁路、工厂、医院等单位做了许多工作。地下工作者所做的工作都是秘密的、隐蔽的,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因此,他们之间有的没有联系,有的单线联系,只有我们省委的少数几个领导同志掌握他们的全面情况。地下工作人员的任务是艰巨的,工作的环境是恶劣的,他们为党为人民做出了贡献。

6.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开辟一条到外蒙的国际交通路线。一九三九年,中央指示绥远省委,在工作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新开辟一条从大青山到外蒙古乌兰巴托的国际交通路线。我们能否完成这一任务,心中没有多大把握。我们决定先派人对即将开辟的国际交通路线作些探索,然后根据探索的结果,再向中央正式报告。经了解,从大青山到乌兰巴托必须经过蒙民聚居地区——四子王旗,但这个地区,原来我们没有工作基础,政治情况和风俗习惯不清楚,所以要探索这条交通路线就要先定带路人。在大青山我们所熟悉的群众中,没有去过乌兰巴托的,只有少数过去

由内蒙到外蒙库伦一带经商的人才去过。但对这些人的政治情况，大都不甚了解，随意找个人带路有很大危险。经过多方了解，通过多次酝酿，选了一个去过外蒙的人，名叫段占元，他政治上比较可靠，对外蒙的地形比较熟悉，会讲蒙古话，懂得蒙族的风俗习惯，会骑马。我们找他谈了话，经过他同意，决定由他带路。向导确定了，我们党内要派一名政治上坚强的、头脑清醒的、在关键时刻敢于牺牲自己的同志前往探索。经反复讨论，决定赵光同志去完成这一任务。赵光同志原名叫郝登鸿，他当时担任中共归武边区工委书记，外人都称他是八路军的赵副官。他是陕北横山县人，靠近伊盟乌审旗。因此，他会说蒙语，亦懂蒙古的风俗习惯，中学文化程度，头脑灵活，政治可靠。这次派人考察国际交通路线纯属试探，故事前没有报告中央。赵光和段占元同志走到外蒙边界处被扣，当作“敌特”送往乌兰巴托，又转到莫斯科第三国际。第三国际与中央联系，中央答复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样，赵光同志在莫斯科被关押多时。任弼时同志一九四〇年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问到我有没有一个叫赵光的到外蒙探路，我说有，是我们派的，已去多时，没有消息。任弼时同志将此事报告了第三国际，将赵光同志放回来了。通过这次试探，了解到开辟从大青山到乌兰巴托的国际交通路线是可行的，我们将这一情

况报告了中央。中央决定这条路线由李春田同志负责，杨保山同志（伊盟鄂托旗牧民、中共党员）参加，仍由段占元同志带路。此后，这一重要工作，由中央直接领导，详情省委再没有过问。

#### （四） 在晋绥边区党委工作时期

一九四〇年初，李井泉同志和我准备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因“七大”延期召开，井泉同志未去，留在一二〇师仍任三五八旅政委。我便借此机会到延安向党中央领导张闻天同志汇报了绥远省委的工作。我把伪蒙疆自治政府的管辖区域、编制、组成情况绘成图表，请党中央和毛主席审阅。毛主席阅后，比较满意。当时，伪蒙疆自治政府的管辖区域在内蒙古西部，除辖绥远省外，还包括晋西北的雁北地区。为了在伪蒙疆自治政府统治区内统一对敌斗争，就在这年的四月份，中央决定将绥远省委改建为晋绥边区党委。

晋绥边区党委管辖的范围在原绥远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原属晋西北区党委管辖的雁北地区（当时是晋西北的五分区）。雁北地区包括平鲁、左云、右玉、山阴、怀仁等县。地委书记仍是赵仲池同志，后由胡全同志接替。专员是曲健同志。雁北地委的武装部队叫六支队，队长是刘华香同志。这样，晋绥边区党委

管辖的整个范围是绥东、绥西、绥南、绥中和雁北等五个地区。

晋绥边区党委的组成，基本上是原绥远省委的领导成员。我任区党委书记，王聚德（社会部长兼宣传部长）、于占彪（武装部长）、张达志（支队政治部主任）、赵仲池同志等为委员。李井泉同志已调回一二〇师，武新宇同志也已调回晋西北，故未参加晋绥边区党委。

晋绥边区党委成立后，为了加强五个地区的工作，区党委决定将原绥远行政公署改为绥察行政公署。杨植霖同志任行署主任，苏谦益同志任副主任，马南风同志任秘书长，贾力更同志任蒙民处长（他牺牲后由奎璧同志接任），杨建林同志任建设处长，赵全璧同志任财政处长。行署成立后，发布了施政纲领，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拥护。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人民政权。

为了向敌占区和我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八路军在各条战线上的胜利消息，鼓舞人民的斗志，一九四〇年，我们创办了晋绥边区党委机关报《绥蒙团结》。报头四个字是一九四〇年初，我在延安请毛主席写的。《绥蒙团结》报有八开纸大，是油印的。整个报纸从拟稿、刻印到发行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尽管由于敌人的“扫荡”，报纸只办

了几期，就被迫停刊了，但它对于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的影响，反映各地抗击日本侵略者英勇壮举，团结一切力量投入抗日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四〇年二月，在汪精卫投降卖国，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影响下，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部队中的反共顽固派和我们闹磨擦，他们制造矛盾，寻机挑衅，反对共产党，破坏抗日局面。我和李井泉同志趁回延安参加“七大”的机会，到晋西北向贺龙、关向应同志汇报了绥远的工作情况和反顽固军斗争的条件。在一二〇师党委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一二〇师在晋西北，我们的骑兵支队在大青山、蛮汉山开展了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斗争。通过反顽固军的斗争，把国民党专员张励师和傅作义号称的八路自卫军，大部分赶到了后套一带，促进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各级党的组织和地方政权都建立起来了，当时整个大青山一带一度成了我们的势力范围。这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黄金时代。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由于工作需要，我调到晋西北工作。此后，我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由高克林同志接替了。

大青山敌后游击根据地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和晋

西北军政委员会正确领导下而开辟起来的，广大绥蒙人民对建立这一根据地有很大贡献。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这些成绩是来之不易的，党和革命人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无论地方和军队，汉族和蒙、回族，不少干部为开辟这一地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现就想起来的牺牲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十一名之多，他们是王据德、彭得大、贾力更、高风英、程仲一、宁德青、刘洪雄、崔岩、赵光、张治华、史学文等。绥蒙地区，特别是大青山、蛮汉山一带，不少革命群众为了支援、掩护我们的干部、伤病员，被敌人搞得家破人亡。我们将永远怀念这些为党为革命牺牲的先烈，学习他们这种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并以此来激励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王世坤 王永清 整理)

## 回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张 明 远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在我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高潮。在北方，在李大钊同志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群众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有了蓬勃发展。北方区委为了培养各条战线的干部，先后派出大批革命青年到黄埔军官学校、西北军事干部学校、广州和武汉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苏联及其它培训干部的部门学习，我就是这时被派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全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农民运动不断兴起的形势下，我党为了培训农运干部而举办的。在此之前，广东省农民协会在彭湃和阮啸仙等同志主持下，已办了五期，主要是培训广东的农运干部（也有一部分是广西、湖南等省的学员）。第六期改为全国性的，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当时国共两党合作，这个委员会实际上由我党



领导，毛泽东、林伯渠、肖楚女等同志均为该委员会委员)，招收全国各地学员。中共北方区委选派了我（当时名张金言）和解学海、韩永禄、王紫树、刘珠、张宗一、阎怀聘、石德山、马俊超（以上九人当时均为中共党员）、段汉章、阚家骅、谭雅谊、李景文、王成奎、马伯超、肖荫棠、孙士林、张风林、王锦、高波、孙洪儒、许庆昌等二十二人作为直隶省的学员，参加了这期学习。

我们一行十余人，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初乘轮船首先到达广州，其他学员以后陆续到达。我们到广州后，先住在一个公寓中，五月初开学后即搬入农讲所，所址在旧番禺学宫。当时广州是全国革命中心和国民政府所在地，以两广为根据地，正在准备北伐战争。自国共两党合作、国民党改组以后，经过镇压广州商团武装叛乱、讨伐地方军阀陈炯明的东江战役和讨伐广西地方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等斗争的胜利，尤其是在“五卅”惨案后，广州和香港广大工人群众所进行的将近一年的省港大罢工和组织武装纠察队，对香港实行严密封锁，给了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对支援前线、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到达广州时，正值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刚刚过去，以国民党右派为主的各种反革命势力在蒋介石操纵支持下，相当嚣张，对我党大肆造谣诬蔑、挑拨离

间，进行破坏国共团结的种种活动。但当时革命高涨，北伐战争即将开始，广大革命群众在我党领导和影响下，对反革命的各种破坏活动，给予了有力的还击。我们在参加广州各界十余万人庆祝“五·一”（也可能是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大会）和以后不久的北伐誓师大会游行示威时，亲眼看到进行反动宣传与捣乱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犹如老鼠过街，遭到革命群众的痛打。

我们这一期有学员三百多人，来自全国二十几个省。各省学员中，现尚能记忆的有陕西的肖益寿、李波涛、霍士杰、乔国桢，河南的许某（即晁哲甫，是党支部委员，同我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湖南的王首道（当时叫王一芬）、谭金华，安徽的仇侗，云南的李为贵；还有一个叫赵同人的是当时学员中的活跃分子，记不得是哪省的了。

农讲所由毛泽东同志担任所长，他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教育长肖楚女，教务部主任陆沉，事务部主任名字记不清了，任职期间因贪污被撤职。总队长赵自选，副总队长黄某，负责军事训练。总队下设相当于连的区队，有专职区队长。学习期间，学员均过严格的军事生活，睡双层床。除进行个人制式教练、连、营为单位的操练和日夜岗哨值勤、夜间紧急集合、夜行军演习外，结业前还进行了打靶和野外战斗演习。关于党组织，全所成立一个支部，彭公达为专

职支部书记。

为了培养我们成为献身于农民革命运动的干部，针对学员都是刚参加革命的青年，需要进行以农民问题为中心的革命启蒙教育这一情况，毛泽东同志对教学课程作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课与辅助课相结合的安排。这些课程和任课教员是：

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由毛泽东同志担任，并讲授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帝国主义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由肖楚女同志担任；

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由周恩来同志担任，因工作忙，只讲授一次；

广东海丰与东江农民运动、高要等地农民运动，分别由彭湃、周其鉴同志担任；

中国历史概要，由恽代英同志担任；

三民主义，由林伯渠同志担任，后因工作忙，先后由甘乃光、陈其瑗（当时均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人）接任；

广东农民运动概况，由阮啸仙同志担任；

广东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决议，由罗绮园担任；

中国政治状况，由彭述之（当时为党中央负责人，以后与陈独秀一起被开除出党）担任；

政治经济学概论，由陈启修（大学教授）担任；

中国职工运动，由李立三同志担任，只讲授一次；

世界革命史，由张秋人同志担任；

合作社概论，由于树德担任；

统计学，由安体诚同志担任；

革命歌曲，由李一纯（女）同志教唱；

革命宣传画，教师姓名记不清了。

以上这些课程，最受欢迎的是毛泽东、肖楚女、彭湃、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所讲的课。

毛泽东同志讲课的主要特点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革命理论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象谈家常一样阐述实际问题。例如，讲我国社会各阶级关系时，他用宝塔作比喻，把帝国主义比作塔顶，下面各层是军阀、官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等等。塔的最下层是塔的基础，是工农大众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最受压迫，所以最需要革命。无产阶级是革命最彻底、最先进的阶级，但人数少，必须联合农民和其它革命力量。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只要我们唤起广大农民，使农民和工人及其他劳苦大众一起，向压在他们身上的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塔的上层必然倒塌。他特别对农村的阶级关系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在讲课过程中，不断向学员提出问题，启发

学员思考和回答问题，使我对农民是我国革命主力军、我党领导农民革命的重要意义等问题有了基本认识，确立了献身于农民革命运动事业的志愿与决心。

肖楚女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宣传教育家。他身患多种严重疾病（二期肺结核、“缠腰风”、高度近视等，并且腿有残疾，走路微跛），却以全部精力和满腔热情致力于教学工作，深受学员爱戴。他常把自己比作蜡烛，是给人照亮用的。他说：“我活一天就要象蜡烛那样发一分光，为人民所用。”这样伟大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使学员深受教育。他是我几十年来时常怀念和崇敬的一位良师和学习榜样。

他讲课生动活泼，富有感染力，特别是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当时的“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等现实斗争，更是慷慨激昂。他详细地揭露并愤怒声讨了六月二十三日英、法帝国主义在广州沙面租界炮轰游行到沙基的广大徒手群众，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了“五卅运动”中，上海、广州、香港以及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巨大规模和伟大力量。听他讲课，如身临其境，使人激起对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同时认识到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伟大力量。

彭湃同志主要讲他在海陆丰领导农民运动的亲身经历，介绍广东农民遭受帝国主义、军阀、地主压迫

剥削的苦难。讲述如何发动和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同地主阶级进行减租斗争和其它斗争；如何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瓦解地主阶级用封建迷信、封建宗族权等对农民的统治等等。他没有泛泛地讲抽象理论，而是介绍他的切身革命经历，极受学员欢迎。他讲了许多生动感人的事例，有些至今记忆犹新。例如他介绍广东农民的苦难时，讲了“卖猪仔”的事例。广大贫苦农民由于遭受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苛捐杂税、重租、高利贷及其它种种残酷压迫剥削，每年有大批破产农民被迫把自己卖给地主抵债，地主以低价买去，再以高价卖给外国招华工的工头、人贩子，叫作“卖猪仔”。他们把这些卖身的农民，和猪仔一样看待，把他们运到澳洲和东南亚等国资本家开的农场、矿山做苦工、当奴隶。在招工头买这些农民时，由几个彪形大汉逐个挑选，其方法是，叫来一个就猛击几拳，打不倒或敢于反抗者就以较高的价钱买去，身体差的就以低价买去。这些人在被运送途中和做苦工期间，由于遭受各种残酷的非人待遇，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一批批地惨死在国外。

他还介绍了自己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起初他身穿学生装，满口学生腔，找到一些农民，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他们听不懂，都以疑惧的表情看着他。他拿着笔记本问农民的生活情况时，农民都避而不答或

答非所问，很快都走开了。后来他吸取教训，换上农民装，学讲农民话，跟着挑粪下田的农民一路拉家常、问疾苦，以各种方式逐渐和一些农民交上朋友，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并通过他们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减租斗争。

当他讲到如何引导和教育农民认识地主利用封建宗族关系进行掠夺与剥削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区，姓罗和姓苏的人很多，传说他们是唐朝罗成与苏定方的后代。据小说中讲，罗成是被苏定方害死的，两姓由此便成为世仇。在地主的挑动下，多年来不断发生械斗，其范围有时波及周围数十村。每次械斗，地主都从中进行掠夺与剥削，得到好处，而贫苦农民则遭到更大的苦难。农民运动发展起来以后，农民从减租斗争取得胜利的具体事实中受到了教育，认识到同姓的地主与农民不是一家，而两姓的农民都受两姓地主的压迫剥削，从而消除了世仇，团结一致向地主、土豪、劣绅作斗争。

他还讲到另一事例：农会领导农民减租胜利后，群众说东江有两个“王”，一个是依靠帝国主义残害人民的军阀陈炯明，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另一个是彭湃，他带领穷人干革命，是使穷人不受苦难的领导人（陈和彭都是海丰县人）。在海陆丰一带的农民，凡认识彭湃同志的，都亲切地叫他湃哥或阿湃。有的群众要

在庙里给彭湃塑像，他知道后，极力劝阻。有一些陈炯明的党羽是彭湃的同学，骂彭湃说：“你们说陈炯明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总比你当穷小子们的走狗好。”他听后讥讽地回答：“我不给帝国主义当走狗，而是给受压迫的人当走狗。我能为穷人当走狗，使他们从穷困中解放出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这样的走狗是无尚光荣的。”

以上事例反映了彭湃同志的革命人生观和为劳动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一切的崇高品德，他是我永远学习和怀念的良师。

周恩来同志担任军事运动课，也非常受欢迎，使学员们认识到革命武装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由于他的工作太忙，只讲了一次就停了，大家都感到很遗憾。

恽代英同志讲历史课。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特别是他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农民革命斗争的讲述，我印象颇深。

在学习期间，除课堂讲授外，农讲所还组织了一些课外学习和实践活动。

课外学习是结合讲授的主要课程阅读有关书刊，对一些重要论著和问题分组讨论。对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曾结合当时各阶级代表



人物的表现进行了详细讨论，通过学习，使我对革命首先要分清敌、我、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分清敌、我、友，有了初步领会。此外，还利用每星期一上午总理纪念周（是当时纪念孙中山的一种制度）的时间，由毛泽东、肖楚女同志或请校外的同志给学员作有关时事政治的报告、讲演。现能记忆的有吴玉章、江浩、李求实等同志。

为了使学员们学习的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快要结业时，毛泽东同志组织学员两次下农村参观，一次去曲江，一次去海陆丰。第二次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带队，事先作了充分准备。学员们按军事编制，有的学员被分配担任了各种服务工作。我担任卫生员，带了一些常备药品，如仁丹、十滴水和外伤用品等。行前领导作了战斗动员，然后乘船前往。由于船小，海上风浪大，颠簸得很厉害，不少学员晕船呕吐。我强忍着晕船之苦，照顾大家。下船后，毛泽东同志亲切地问我：“你学过医吗？”我说“没有。”他又问我的出身和职业，我说是小学教员，在家也种过地。他赞扬说：“你卫生员当得不错呀！”随后他又去和其他学员亲切交谈，给大家以鼓励。

在海丰，我们参加了一次全县农民自卫军和农会会员代表的万人大会（印象中是庆祝胜利大会），第一次看到了农民运动的雄壮场面。我们还参观访问了

公平镇和几个乡村，受到群众和农会干部热烈欢迎，亲切接待。所到之处，都是一派革命景象。这和北方农村的苦难情景，成鲜明对照，使我坚定了一个信念：回去以后一定以这里为榜样，把家乡的农民发动起来。

此外，毛泽东同志还亲自进行调查研究，他主持并召集来自各省的学员开调查会，不能参加调查会的，都发给调查提纲。从阶级关系、农民负担到宗教社团、风俗习惯、歌谣谚语等等，都在调查之列。后来根据调查材料编辑出版了农民运动小丛书。

毛泽东同志对学员生活很关心，北方学员不习惯吃大米，便专门为我们做面食。后来发现管事务的人贪污，便把他撤职查办，让学员自己管理伙食；设了伙食委员，轮流值日。食堂除自办的伙食外，还常常到外边饭馆为大家订菜，以改善生活。

在党的生活方面，中共党员都编入党支部的各小组，按小组进行活动。每周开一次小组会，主要内容是传达、讨论支委会的工作安排、决定，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

在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以后，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日益嚣张，他们动员各种反动报刊对我党造谣诽谤，挑拨国共两党关系，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当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并且节节胜利，北伐军所到

之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在这一形势下，我党本应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坚决打击右派的政策，但党中央在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领导下，未能这样做。而蒋介石则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提案的要点是：国民党各高级党部委员会中的委员，共产党员不得占三分之一以上，并不得当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其它党派加入国民党者须报告其原来党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把名单交给国民党。这个提案对右派的反共分裂破坏活动只字不提。显然，蒋介石这个提案的目的在于支持和发展右派，削弱左派，限制和打击我党，为其篡党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当时我党在国民党中央担任中央委员并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同志，如毛泽东、谭平山、林伯渠、江浩等，都反对这一提案，但中央在陈独秀的错误领导下，对提案作了重大让步。

毛泽东同志向学员们作了有关国民党这次会议的报告，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分裂、破坏国共团结的阴谋活动，指出蒋介石能否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要看他今后的实际行动，现在还不能定论；张静江是有名的江浙财阀的军师、智囊，是蒋介石的幕后出谋划策人；段锡朋这个人很坏，现在是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

同时他在报告中还谈到，在国民党的这次会议上，我党中央对蒋介石所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作了重大的让步。

为了使我党的同志了解党中央对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政策精神，中共广东区委召开了一次广州各机关、团体、学校党的活动分子会。农讲所有十多人参加，我也去了。首先到毛泽东同志的住所，见到毛泽东和杨开慧同志。杨开慧同志带我们进入会场。这次会由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同志讲了话。他讲的主要内容是：国民党二中全会没有对右派分子进行批判和制裁，却通过决议对我党加以各种限制，对此，他非常气愤。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左派，有许多人反对蒋介石的提案，主张对右派给以严厉制裁，要求我党给以支持。但我党中央没有采纳我党参加国民党中央的同志及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意见，而是为了照顾大局，联合蒋介石，维护同国民党的团结，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对蒋介石的提案作了重大让步。他个人认为，我党对蒋介石的提案让步有些过头，对蒋过于迁就。蒋介石不是左派，对他的一切错误言行，该批评的应当批评，对其权力应有所限制。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根据“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言行，我们应有所警惕。当然，中央既已决定，我们应当服从和执行。他的讲话虽然没有

点名，实际上是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陈延年讲完后，毛泽东同志称赞并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陈延年同志的讲话。

听了讲话，我们才知道党中央内部、中央与下级之间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但不理解争论的性质，多少有点诧异。后来才知道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受到毛泽东、陈延年等许多领导同志的抵制。陈独秀实行家长制领导，压制不同意见，坚持右倾错误，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严重失败。

这一期学习于九月初结业。时间虽然仅四个月，但我在思想上的收获却是非常宝贵的。我来学习之前，虽然参加了革命并入了党，但由于时间短，在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经过这次学习，使我受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农民革命运动为中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多方面的革命启蒙教育。在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革命对象、革命动力和革命的基本方针政策等等方面，都有了一些初步认识。虽然这仅仅是开始，但却使我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应树立怎样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献身的高尚品德和人生观，对于应如何把革命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等方面，有了遵循的方向，

有了学习的榜样和鞭策自己的力量。

我们这一期学员结业后回到各地，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大部分同志都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很多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 湘鄂西工农红军 第四军编制的前后变化情况

张 德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贺龙、周逸群等受党的委托来到湘鄂西，经过艰苦的斗争，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并创建了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在贺龙的领导下，自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转战湘鄂西达七个年头，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支部队也和其他红军一样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历程，他无数次地遭受到数倍于我之敌的猖狂“进剿”，同时也遭受到“左”倾路线的严重摧残。几经兴衰，部队编制、名称变化多次。我作为这一历史的见证人，仅就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创建和编制的前后变化情况作点回忆，供参考。

## 工农革命军的诞生

一九二八年旧历年关，我随贺丹卿由慈利来到桑

植洪家关投友，住在贺龙的堂侄贺桂如家里，贺桂如当时有一部分武装。不久，我看到贺龙、周逸群等一行近二十人回到洪家关。贺龙一回来，便与各方面的人物接触，召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宣传革命道理，讲明来意。他说：“我这次回湘鄂西，是共产党让我来拖队伍的，愿意跟着我干的表示欢迎。”在贺龙积极号召和组织下，仅一个月时间，就收编了亲族贺英等的部队和旧部王炳南、李云清、钟慎吾等的部队达三千人左右，枪二千多支。当时，这支被收编后的部队命名为工农革命军，这便是工农革命军红军第四军的前身。从这时起，我就参加了革命军队。

工农革命军初创时期设师、团、营、连等建制。军长贺龙，师长贺锦斋，一团团长李云清，二团团长贺桂如。

## 七郎坪第一次整编

一九二八年四月，工农革命军在洪家关刚刚诞生，就突然遭到西移之敌四十三军龙毓仁旅的猖狂进攻。由于革命军是刚收编的部队，没有严格训练过，战斗力很弱。梨树垭、双集桥等战斗都未取胜，部队大部被冲散。贺龙带领部分指战员退守苦竹坪一线，收容战斗中被冲散的部队千余人。经短时休整后，工农革



命军在贺龙的率领下，赶到桑植小埠头设伏，歼灭龙毓仁旅后卫一个连，敌旅参谋长被我击毙。尔后乘胜占领桑植县城，进军洪家关。这时，遭到桑植团防陈策勋和姜文周团等匪部的突然袭击。工农革命军英勇抗击，激战数小时，团长李云清牺牲，部队撤退到桑植的乐育、龙潭坪、七郎坪一带驻扎。前委决定部队在这里进行整编，将部队番号改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原来的部队编为第一师，贺锦斋任师长，张一鸣为党代表，下辖一、二两个大队：王炳南任第一大队长，贺桂如任第二大队长。当时计划收编田少卿（大庸县土著武装司令，与贺龙同志有旧交）部一千余人编为第二师；收编石门罗效之（大革命时期任石门县委军事部长，这时还掌握着部分武装）部编为第三师。后因田不相信贺龙及罗的叛变，收编这两支部队的计划都未能实现。

## 梅坪第二次整编

一九二八年八、九月间，我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奉命东进石门，支援石门南乡“工农革命军湘西第四支队”的武装斗争。八月，我军进入石门北乡，得知第四支队的斗争已经失败，前委拟在磨岗隘建立革命政权。九月以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澧县王家场、石

门境内的溧阳、泥市风箱坡等地与敌人多次激战，严重受挫，参谋长黄鳌，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均在战斗中牺牲。十月，部队退回鹤峰、堰垭、梅坪一带，全军只剩下三百人左右。十一月又遭到湘鄂边之敌陈渠珍和五鹤团防等匪部的“进剿”。部队化整为零，转入隐蔽斗争。十二月进犯之敌撤退，贺龙在梅坪集结部队一百多人，七、八十支枪进行整编。安置了部分伤病员后，全军只有九十一人，七十二支枪。于是取消了师的架子，设第一路，编为一个大队，下辖两个中队。王炳南任第一路指挥官，贺桂如任第一大队长。

### 收编“神兵”<sup>①</sup>，进行第三次整编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九年元月，部队在贺龙的带领下，由堰垭出发，向宣恩、咸丰、利川、建始等地游击，发展很快。在咸丰、利川收编了杨维藩的“神兵”队伍，消灭了恶霸“铁拐李”（李长青）匪部，缴枪几十支，还招收了部分农民参加红军。这时，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又发展到三百多人，编成一、二两个大队和一个“神兵”特科大队。贺炳南任第一大队长，文南甫任第二大队长，杨维藩任“神兵”第一特科大队

---

① 在湘鄂川黔边一带，反对苛捐杂税，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组织。其领导权多半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

长，党代表黄甫。

接着，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乘胜前进，由利川东下，长途奔袭建始。打下建始县城，部队又有扩大，随之向鹤峰进军。一九二九年元月初，部队到达鹤峰鄆阳关，收编了陈连振、陈宗瑜父子领导的鄆阳关“神兵”二百余人，编为第二特科大队。陈宗瑜任大队长，党代表徐锡如。元月七日深夜，部队突破敌人观音坡防线，八日清晨，第一次解放了鹤峰县城，部队扩大到六、七百人。

### 堰垭第四次整编， 工农革命军红军第四军成立

一九二九年元月中旬，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退出鹤峰县城，移师湘鄂边的红土坪、堰垭和榨坪一带游击。二月初，前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堰垭整编，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为工农革命军红军第四军，即红四军，仍然设第一路指挥，辖一、二两个中队。由于杨维藩拖枪逃跑，原来的两个“神兵”特科大队合编为一个特科大队。红四军序列如下：军长贺龙、党代表恽代英（未到职），第一路指挥官王炳南、党代表张一鸣，第一中队长贺炳南、党代表汪毅夫，第二中队长贺佩卿、党代表×××，特科大队长陈宗瑜、党代表徐锡如。

## 鹤峰第五次整编,红四军进军桑植

堰垭整编后,红四军于一九二九年正月初一,忽由榨坪北上,向鹤峰挺进。次日抵达鹤峰县城,战斗半天,第二次解放了鹤峰。以后,红四军便以鹤峰为中心向四周发展,边整训,边消灭鹤峰境内及其周围的残敌。古历五月,红四军决定向桑植发展。临行前,红四军在鹤峰县城进行整编:将原第一路的两个中队合编为第一团,特科大队编为第四团;古历三月收编的一支土著武装谷志龙部一百余人编为独立第二旅。整编后:军长贺龙,第一路指挥官王炳南,第一团团团长贺桂如、党代表龙在前,由贺炳南、贺佩卿、向伯辰分任一、二、三营营长;第四团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徐锡如,下辖两个营,第一营营长谷中清、第二营营长唐占益,独立第二旅旅长谷志龙、党代表汪毅夫。

古历五月初三,红四军由鹤峰向桑植挺进,初八日,占领洪家关,再次解放桑植县城。赤溪战斗前,红四军在桑植县境内收编了两支土著武装,一支是覃甫臣(大庸人)部三百多人,编为第二路指挥,覃甫臣任指挥官。下辖十一、十二两个团:十一团团团长覃伯勋,十二团团团长×××;另一支是伍琴甫(贺龙旧

部营长)部一百余人,编为独立第五团。南岔大捷后,红四军缴获甚多,前委决定以文南甫为团长,组建独立第二团。这时,红四军发展到二千多人。

### 桑植第六次整编,红四军激增到四千人

一九二九年六、七月间,红四军接连在桑植南岔和赤溪河打了两个大胜仗,共歼敌三千余人,缴枪一千多支,部队激增到四千多人。八月,前委决定红四军在桑植整编。其序列如下:军长贺龙,第一路指挥官王炳南、党代表张一鸣(下辖一、四两个团:第一团团长贺桂如、党代表龙在前,第四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覃甦),第二路指挥官覃甫臣(辖十一、十二两个团:十一团团长覃伯勋、十二团团长×××),独立第二旅旅长谷志龙、党代表汪毅夫、参谋长陈石清。另外,还有军属独立第二团、独立第五团,吴虎成、伍琴甫分任团长。

### 洪湖第七次整编,红二军团成立

一九三〇年七月,红四军和红六军在公安会师后,两军前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在普济观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将红四军改为红

二军，下辖第四师（红四军部队大部分编为第四师，另一部分编入军部卫警团）；将红六军的两个纵队改编为十六、十七两个师。会师后，二、六两军共有部队一万八千余人。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周逸群，红二军军长贺龙（兼）（后孙德清）、政治委员朱勉之，第四师师长王炳南、政治委员陈协平，红六军军长邝继勋、政治委员柳克明，下辖十六、十七两个师。十六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王鹤，十七师师长许光达、政治委员李剑如。

### 枝柘坪第八次整编， 红二军团改为红三军

红二军团刚成立不久，中央代表邓中夏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他免除了周逸群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和湘鄂西前委书记等职，由他自己充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和湘鄂西前委书记等职。一九三〇年十月，为配合一、三军团两次攻打长沙，红二军团脱离洪湖根据地。后来，一、三军团中止进攻长沙，红二军团在松滋、公安等地徘徊了很久。杨林市（松滋）一战失利，部队损失很大。红二军团在继续南进，在途中的津澧战役、临澧战役、石门战役中都未取胜，减员三分之一，由原来出洪湖时的三万人减少到二万人。十二月，红

二军团由石门移到湘鄂边，一九三一年三月初又开到枝柘坪（长阳）。前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将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将红二军缩编为第七师，将红六军缩编为第八师，另编一个独立师（一千五百人）留守湘鄂边。缩编后，红三军军长贺龙、政治委员邓中夏，第七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李剑如，辖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团；第八师师长许光达、政治委员王鹤，辖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个团；独立师师长王炳南、政治委员陈协平。

### 鄂西北第九次整编

红三军枝柘坪整编后，邓中夏打算以荆（门）、当（阳）、远（安）为中心建立新的苏区。四月，命令红三军由巴东北上。红三军在鄂西转战于巴东、兴山、秭归、远安、荆门、当阳、保康、均州、郧阳等县城，付出了惨重代价，尤其是马良坪战斗，损失更为惨重。这次战斗后，主力七、八两师总共只有三千多人了。七月，前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将第七师的三个团缩编成一个团，沿用十九团的番号；将第八师的三个团缩编成一个团，沿用二十二团的番号。将洪湖根据地的新六军改编为第九师，下辖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个团。

## 钟祥第十次整编

红三军主力经七月整编后，七、八、九三个月有了一些发展，加上洪湖第九师（七千人）、湘鄂边独立团等部队，全军有二万余人的兵力。九月下旬，红三军进到钟祥，在刘猴集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返回洪湖中心区。于是，红三军在钟祥进行整编，将七、八两师各恢复到原三个团的编制；九师仍按原编制不变；将留守湘鄂边的教导师改编为独立一团；将巴、兴、归黄大朋领导的独立一师改编为独立二团；将红三军教导团和游击队改编为独立三团；将襄、枣、宜第九军改编为独立四团；将汉川独立团改编为独立五团。十月，红三军主力胜利返回洪湖根据地。

## 走马坪第十一次整编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进攻我湘鄂西的兵力在十万以上。十月，我红三军主力被迫退出洪湖中心区，经豫南、陕南、川东后，折转鄂西北，由巴东过长江，十二月重返湘鄂边，行程约七千里，全军由突围时的一万四千余人锐减到九千人。一九三三年春，走马坪中央分局会议后，红三军



进行整编，将部队分别编为七、九两个师和一个军部教导团。七师师长汤福林（后叶光吉）、政治委员盛联均，九师师长段德昌、政治委员宋盘铭，教导团团团长卢冬生、政治委员关向应（兼）。

（彭世富整理）

## 叶剑英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后

陈 力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东北之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独霸的殖民地，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向帝国主义投降妥协，对内残酷镇压人民。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为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叶剑英同志在西安事变前，根据中央指示，到安塞地区做东北军张学良部队的统战工作。后来又密赴西安，与张学良将军会商，对促进东北军、西北军与我党的抗日联合，形成“三位一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协助周恩来同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 在 东 线 工 委

叶剑英参谋长东征返回陕北后，在中央军委总部，负责处理日常军务。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一九三六年七月，中央派他到安塞领导东线（陕北）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线工委）。中央让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以便必要时到国民党地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叶剑英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移交了参谋长工作，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到东线工委所在地——安塞，与朱理治、边章伍等争取陕北地区东北军联合抗日。

早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我们党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就开始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泽东派汪锋带着他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到西安，曾三次会见杨虎城。

一九三六年一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红军领导人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与他们首先停战，共同抗日。四月九日，周恩来偕李克农到东北军驻地延安，与张学良将军秘密举行了联合抗日救国的会谈。

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规定：“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叶剑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去安塞，主持东线统战工作的。

叶剑英到安塞后，深入各地工委了解情况。为了使各地工委能清楚了解对东北军工作的重要性，他于七月二十六日召开了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及县一级机关负责人会议，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东线工委的任务。他依据党中央对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阐明了争取东北军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并组建加强东北军工委系统。当晚和翌晨分别又召开了安塞、延安两工委会议。会议明确规定安塞工委由马文瑞、刘德明、时文平负责，下设安塞办事处和枣园办事处，主要对象是东北军六八四团；延安工委由肖离、刘仲明等负责，下设牡丹川办事处、暨富川办事处、川口办事处，主要对象是东北军的六三一、六六〇、六八五团。东线工委还决定开办杨家沟、枣园市场，发动群众，帮助东北军解决物质供应的困难。叶剑英为了争取延安周围东北军六个团联合抗日，派边章伍等四同志去延安工委指导和协助工作。

叶剑英要求安塞、延安工委要以东北军为主要对象，深入进行调查研究，首先要了解部队的番号、位

置、主官、历史、特点、一般来往电报；对个人要了解本人履历、政治表现、嗜好、特长、个性等情况。他还要求在东北军中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强调党的发展工作要积极、慎重，经过多次谈话，分配工作考验，上级机关批准，然后方可填表，举行入党仪式。为了郑重履行入党手续，叶剑英还拟写了入党誓词，请中央工委审批后，下发各地工委执行。他还总结推广了安塞工委的经验，对促进其他工委的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东北军下级军官和士兵有家乡沦亡之苦，背井离乡之难，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和压迫，对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刻骨的仇恨，易于接受我党统一战线的主张。叶剑英还直接做东北军下层的统战工作，并在东北军一〇七师建立了我党地下组织。东北军一〇七师六三〇团陶翊周营长，就是安塞工委对他做了许多争取工作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叶剑英经常穿着东北军的服装，出入他的营区。敌对的双方，成了友好的睦邻。当东北军将要换防时，东线工委决定紧急动员群众，拆除碉堡。赤卫队打着红旗，把安塞川的碉堡直拆到陶营附近。当群众在陶营周围拔除工事时，被陶营士兵发现了。士兵向陶翊周报告，要把群众抓起来枪毙，被陶翊周制止了。

在陶营长的影响下，许多士兵拖枪投到红军中来。

当时士兵带来了十六支步枪，两挺轻机枪。陶翊周向叶剑英写信，请求帮助解决这一难题。

东北军有个规定：凡枪械丢失，要从直接领导薪水扣。丢这些枪，大约要扣陶一年薪水才能还清。为了争取东北军抗日，叶剑英将此事报告周恩来副主席，并说：我从警卫营中抽两挺机枪给他（陶翊周），要求他给一点子弹。他诉苦说，该营失了两万子弹，尚没有机会报销（未打仗），恐师部派人来查，只得在各连士兵身上抽出四百发。我亦不便多讲了……他是个同志。

八月二十二日，叶剑英为了接收从西安秘密运到的东西和具体部署一〇七师党的工作，又单骑赴陶营，因陶进城未见面。第二天他派刘仲明去陶营，带去他给陶翊周写的一封信：

“陶同志：

党决定陶翊周同志为一〇七师党委书记，王昌奎、李璞玉两同志为委员，负责指导一〇七师党的工作。

刘仲明同志为中央巡视员，随一〇七师行动，负责指导并帮助你们进行党的工作。

党对陶翊周及王、李两同志极倚重，望积极无畏的为党工作。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中央工委代表叶剑英”

从此以后，一〇七师有了中共党的组织。

陶营的其他人，对我们党也很友好，营副及田副官八月二十五日邀请我警卫营时文平政委及连排长到该营吃饭。警卫营决定由时文平代表全营赴宴。叶剑英第二天与时文平去陶营，对党在一〇七师的工作做了布置。

叶剑英还对一〇七师师长刘翰东做了大量工作。刘翰东提出以子弹换轻机枪。叶剑英为了争取刘与我们建立统一战线，答应他的要求，并写信报告了周恩来副主席。八月十九日下午三时，刘翰东师长由青化砭到延安，令当时在东北军做统战工作的吕继才返回安塞，要求第二天与叶剑英在延安城外十里处会面。二十日，叶剑英、边章伍身着东北军服装，与刘翰东在十里处见面，并给刘带去了四支步枪（是六二〇团士兵投诚带来的），以表示红军与东北军友好，不要东北军的枪支。

刘翰东非常感激，同时提出：东北军今后丢枪无法补充，请求红军设法解决。

叶剑英回答：这事好办。你可以给我们搞点子弹，我们把枪送给你，互相帮助。

叶剑英与刘翰东见面的消息，被东北军六二一团中校团副、代理团长周振声知道了。周为了表示友好，把自己的名片交给我方联络员吕继才，让吕转交叶参谋长，并一再要求代他问候。他对吕继才说，叶参谋

长曾给他写过信。原来叶参谋长给周振声写信是在中央红军到陕北不久。周振声是东北军原守甘泉的三个营长中最好的一个。当时叶剑英是以攻城司令员的名义，写信送给周振声的。在这封信中，叶剑英向他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他同反动分子划清界限。

吕继才听了周的自我介绍后，对其进步和友好表示热烈欢迎。

当吕继才表示，东北军移防后，“这一带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很难设想”时，周振声当即表示：我可以把你们介绍给杨主任（杨虎城）来接防的部队。

吕继才把这一情况向叶剑英汇报后，叶剑英说，我们就是要利用这种关系，扩大统一战线。当即决定第二天进城。

二十一日，叶剑英、边章伍、王立人、吕继才四人同去延安城，分别活动，利用东北军的关系，打通和杨虎城部的联系。

二十二日晚，夜深人静，刘翰东派副官到离延安城二十里的何庄坪，给红军送了一万五千发子弹。叶剑英带警卫二连在那里接收，并送给刘翰东几挺轻机枪。通过子弹换轻机枪这件事，刘翰东对红军很感激，让我方代表刘仲明常住六二一团，并嘱咐刘仲明不要到其他部队去，如需要找其他部队的人谈话，可叫到



六二一团去。

叶剑英为了争取东北军抗日，还请周副主席派人民剧社演员到安塞。第一次演出，就吸引了许多东北军的士兵观看，连六八四团的方团副也来了。此人接受我党统一战线的主张，是我们争取的一个对象。但东北军的政训处也派了两个密探来，方团副只好躲在俱乐部。政训处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许多人都很害怕。方为了应付环境，从俱乐部出来，假意把看戏的一个东北军士兵打了一棍，大声喊：东北军的士兵速将东西买好，快回营房。

人民剧社二十多天的演出，深受六八四团官兵的欢迎。当演到亡国恨这一类悲剧时，东北军官兵热泪盈眶，他们要求红军帮助他们打回老家去，不当亡国奴。人民剧社第三次演出时，还散发了一百零五本《打回老家去》的小册子，这些书对东北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叶剑英在开展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同时，也着手做西北军的基层工作。他给周恩来副主席的信中说：“十七路军工作，依我所知，不能完全照东北军工作指导原则，因该部与东北军有许多差异”。

东北军西移，杨虎城部八月下旬开始调往延安。为了打通与杨部的关系，叶剑英让刘仲明、时文平用“中央红军警卫团”的名义与杨部通信，称杨部是抗日

友军部队，并动员群众欢迎他们。同时也说明市场的建立是为着他们的供应，请他们派人来商议维持市场的办法。关于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根据中央指示，叶剑英领导下的各级机关仍按原建制继续工作。

为了打通与杨部的关系，叶剑英带吕继才去延安，请东北军的刘翰东师长、周振声代理团长把吕介绍给杨部，让吕担任红军与杨部的联络。他还在我军内部发动一些人，进行“找关系”。同时令安塞工委，利用杨家沟市场，给杨部程鹏九团写信，争取打通关系。

在采取了上述争取杨虎城部队措施的同时，叶剑英在军事方面也做了必要的准备：布置安塞游击队配合警卫营行动，并对他们作了万一杨部不与我们友好，应该怎样行动的具体指示。

叶剑英以安塞边防司令部中央红军警备团长时文平的名义，写信给杨虎城部程鹏九团，建议双方停止交战，彼此通商，要求对方约束民团。

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经过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不仅停止敌对行动，而且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相帮助，变成了真正的友军。

东北军调离延安时，叶剑英建议中央工委及陕甘、陕北各地方工委调一部分干部随东北军移防，继续做这一工作。根据中央指示，陕甘省委派刘培植随一〇

五师移动，延安工委派刘仲明等随一〇七师移动。不久，叶剑英也接到中央工委派他去西安的指示。

## 特 殊 使 命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开始在西安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张、杨分别派人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傅作义，北京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和新疆的盛世才等各方实力派进行联络。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张学良还派飞机送在东北军做地下工作的刘鼎去陕北与红军联系，愿与红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西北的抗日新局面，要求红军给予支持。

张学良赞成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正如叶剑英同志所说，是有他自身的原因的：

一、红军不可征服，他在“剿共”中受到沉重打击。起初张学良对进攻红军也很卖力，企图通过“剿共”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然而接连打了三次败仗。

二、他发现蒋介石的阴谋——利用东北军打红军，使之两败俱伤。东北军在进攻红军中，损失了近三个师的兵力，蒋介石企图乘机撤销部队番号，减发军饷。

三、他和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在“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不准他抵抗，丢掉了整个东北。不仅杀父之仇未报，反而背上了“不抵抗”的黑锅，代蒋受过，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

四、东北军将士流落关内，怀念故土，他们反对内战，要求打回老家去。

为了民族的利益和自身的生存，张学良愿与红军联合。

七月上旬，刘鼎乘飞机抵陕北，向中央汇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听取汇报。刘鼎向中央汇报说，张学良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正在努力实现西北的抗日联合局面，请求我党和他们密切配合。

为了协助张学良、杨虎城改造部队，准备抗日，中央决定派参谋长叶剑英去西安。

九月，叶剑英肩负党的重托，从保安出发，辞别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密赴西安。同往的还有潘汉年、边章伍、彭雪枫、汪锋、吴自立等。他们一行化装成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士兵，名义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路过西安，返回南京。边章伍化装成长官，服装最高级，佩戴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字样的圆型证章。潘汉年化装成秘书，穿黑西装，戴礼帽，挟着黑皮包，拄着洋拐杖。

彭雪枫化装成副官，扎武装带。叶剑英身着士兵服装，化装成马夫。有人说“这不是演戏吗？”叶剑英说：“这不是演戏，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果把这看成演戏，那这戏一定要演好，如演不好，不仅完不成任务，还可能出问题，有生命危险。”接着他又讲了一下出去以后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他们先到富县张村驿，这里是边区和白区交界地，设有我们的联络站。然后骑马到东北军的驻地，一个姓刘的师长在约定地方来接应，换乘汽车到西安。到西安后分途执行自己的任务。

叶剑英出使东北军，张学良极为重视。为了确保叶剑英的安全，张学良把叶安排在他的警卫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一个化名杨先生的人，成为孙铭九的座上客。孙铭九对这位“杨先生”的身份当时并不十分了解，正象他回忆时说的：“他（张学良）特别要我把一位红军代表接到我家里同住，以绝对保证他的安全。这位代表身着便衣，三十多岁，风度翩翩，象个书生……事后，我才知道这位风度翩翩的书生，原来就是著名的叶剑英将军。”

叶剑英在古都西安，用电台同党中央联系，及时汇报他在西安的活动。

十月五日，他与潘汉年向中央以“十万火急”的电报报告与张学良会晤的情况：

与张学良会谈后，双方对许多重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张将军从政治方面谈得较多，从军事方面谈得少，明天将继续会谈。张将军已经答应给红军拨款。要求中央提供最近的军事情况及意见。

叶剑英他们去西安时，给张学良带去了《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这个草案是在国民党代表与我党代表潘汉年经过几次秘密接触后，我党为联蒋抗日而提出的。他们把这份草案交给了张学良。

为了迅速停止内战、一致救国，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向红军进攻，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并希望张学良将军“将敝方意见转述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十月七日，叶剑英、潘汉年再次致电毛泽东主席，大意是：

张学良决定向蒋介石发电报，表示有要事面商。在会谈中张学良说，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照此内容，蒋介石恐难接受。为了表示团结抗日，张将军答应给红军解决一部分棉衣。

此时，二、四方面军北上到甘肃，蒋介石严令张学良堵截，张学良为应付局势，亲自驾飞机飞往庆阳。

十月十日，叶剑英、潘汉年关于张学良的动态及胡宗南等部的部署致电毛泽东说：张学良于昨天去庆阳，见前线各将领。胡宗南经庄浪去通渭，因此王以哲部不派往庄浪。请注意国民党汤恩伯部向宁条梁、安边方向活动。

不久，马鸿宾的一个骑兵团被彭德怀领导的西方野战军围困。蒋介石得知后，急令东北军前去解救。张学良找叶剑英商量解救的办法。叶剑英为了争取东北军抗日，使红军与东北军在甘、宁前线互相支援，建议中央允许东北军刘多荃一〇五师，按照规定时间进入红军包围圈，带出即将被消灭的马匪骑兵团残部。

十月十三日，叶剑英关于张学良要求解救李旺堡之围及健全交通问题，致电毛泽东。

电文大意说：一、张学良奉蒋介石急令，解救李旺堡二〇七团之围。张学良要一〇五师办理。经商妥，“十六团请准铣日（即十六日）进李旺堡，望放出回匪”。二、指派人直接找十六团，妥商此行动，并联系与该师永远通好，新的交通线大有办法。三、何柱国将抽回，部队归刘多荃指挥。

十月十四日，叶剑英关于刘多荃代何柱国指挥和解李旺堡围及建立交通问题再致电毛泽东。

电文是：一、何已调回，部队由刘多荃指挥。二、东北军解救李旺堡围之后，该地归我们占领。三、请

派人与十六团接洽此行动及今后交通问题。

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东北军与红军从敌对双方，变成友好睦邻。双方下级军官以友军相待，在前线互相来往，甚至联欢。这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也是叶剑英等同志出使西安所获得的显著成绩。

叶剑英不仅作为红军代表与张学良将军联系，而且代表中央与外界秘密联系并向中央提供各种情报。从下列的一些主要活动中可以见其大端：

十月十日，叶剑英决定王立人留西安主持交通，派刘向三给中央送去五万元，要求中央去照八寺接刘。

十月十四日，叶剑英、刘鼎关于傅作义、阎锡山的抗日行动致电中央：傅作义在保卫绥远口号下，在平津招募六千多人入伍。他一再表示决心抗日到底。阎锡山委其军训团主任组织部队训练，准备抗日。

十月十五日，叶剑英向中央报告说，他代表中央与南京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子华秘密谈判。张子华带来南京国民党谈判协定，提出：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

十月十八日，叶剑英、刘鼎关于同国民党谈判问题又汇报说：据和谈侦知，南京似乎是军事为主，继续调兵“围剿”，以便收编红军。我们必须按军委决定，



给胡宗南以严重打击，争取完成战略任务后，外交途径才有好的基础。国民党约周恩来于十月底在广州见面。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实质性的问题毫无进展，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无保障，周恩来自然不能去广州。

十月十八日又报告了日本对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蒋介石的策略。

十月二十日，叶剑英向中央报告，据估计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策略是先打后和，因此蒋介石令胡宗南急进，中央军向北、东北军六十七军向西，企图给红军以打击。蒋介石不日来陕西，张学良今日去太原，与阎锡山一同去郑州见蒋。

十月二十二日，叶剑英向中央汇报张学良、阎锡山会谈情况以及阎锡山的对我态度。张学良、阎锡山会谈取得极为满意的效果。阎锡山决心来陕，并要求蒋介石联合红军抗日，拨款加强绥远国防工事和调十个师加强绥远、宁夏、山西的国防力量。阎锡山还表示：倘若蒋介石不干，他决心联合东北军、红军共同抗日。并把绥远的固阳、包头、五原、安北、临河给红军，表示全力支持宋哲元抗日。阎锡山表示抗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一旦在经济上达不到要求，抗日态度也将变化。

随着我党同东北军、西北军统一战线的建立，张、杨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叶剑英此时在西安

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危险。

张学良时刻关心着叶剑英的安全。他交代孙铭九要绝对保证不发生意外。有一次叶剑英去我党的一个秘密接待站。过了不长时间刘鼎也去了，当刘鼎走到那条街道时，看到街道两头有许多警察，刘分析可能接待站出了问题，赶快返回通知孙铭九。他们带着士兵，坐汽车把叶剑英接走了。后来了解，警察别有任务。是一场虚惊。

有一次叶剑英去街上洗澡，洗完后又又在街上吃了一顿饭。这件事被张学良知道了。张警告他说：“叶先生，你不要乱跑啊！你到澡堂去洗澡，公开露面，蒋介石知道了怎么办？你不要上街去，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从此以后，叶剑英在孙铭九的家里，很少出门。

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从洛阳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他错误地估计，只要他亲自出马，张、杨也不敢不服从他的命令。万一张、杨不听命令，准备把他们调离西北，分别支解、消灭。蒋介石游览黄陵、秦陵、华山之后，召见张、杨。狂妄叫嚣在三个月之内把陕北红军全部消灭，并要张、杨做好一切“剿共”准备，向陕北红军进攻。张、杨不仅不同意他继续“剿共”，而且正式向他提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对张、杨严加“训斥”，声称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

不谈抗日的事”，并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宣扬“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方针，对张、杨及其部下施加压力。

十月二十九日，叶剑英、刘鼎关于蒋介石、张学良会谈情况向中央汇报说：

“蒋、张已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剑（剑英）拟三日后离西（安）回（保）安，详细报告。可否，复。”

十一月上旬，中央复电：剑英回保安商量，并顺便问问张将军可不可以帮我们一点经费？

叶剑英接到中央复电之后，第二天就去会见张学良，告诉张“中央要我回保安开会，目前红军经济困难，中央请告张将军可否帮助解决经费。”

张学良慷慨解囊，决心帮助红军解决经济困难。

叶剑英打电报报告中央：款已借到，不日返回保安。

叶剑英坐汽车到洛川，然后骑马回保安。林老（林伯渠）到城外的二十里铺去接叶剑英。这位财政部长，此时钱柜已是空空如也。两位革命战友重逢，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叶剑英风趣地对林老说：“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林老紧紧地握着叶剑英的手，笑着说：“老叶，一路辛苦了……”

叶剑英由西安回到保安。一天，毛泽东召开会议，

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参加，由叶剑英汇报西安情况。会议中间，机要秘书送来张学良发来的电报，说形势十分危急，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计。

毛泽东要叶剑英速去西安，并嘱咐他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带去，通过张学良的关系，送王到新疆，然后去苏联治病。

第二天，叶剑英一行赴西安。由两个警卫班护送。叶剑英、边章伍等骑着马，沿着崎岖的道路，向接头地前进。路上叶剑英、边章伍风趣盎然，他们小声唱着京戏：“真宋江、假宋江，真假宋江忠义堂……”引起阵阵欢乐的笑声。叶剑英骑马走了几天，到富县接头地方找不到接头人。他命令电台，立即向中央发报。那时已是双十二事变之后，中央回电说：张学良将军在西安把蒋介石抓起来了，党决定派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已请恩来先去，剑英即刻返回延安，坐飞机去西安。

## 在西安事变期间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完全是蒋介石逼出来的。

蒋介石在逼迫张、杨“剿共”的同时，调他的嫡系部队，加强军事部署，调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二

十多名高级军政大员，聚集西安待命。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身份驻前方督“剿”。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杀气腾腾二次来西安。他让张、杨选择：或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北前线，进攻红军，或者不愿“剿共”，将东北军、十七路军撤出陕西，让中央军“剿共”。蒋介石的这两个方案，张、杨都不能接受。后来张学良对蒋介石慷慨陈词，进行“哭谏”，蒋介石不听。张、杨无路可走，不得不实行“兵谏”。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五时，临潼和西安枪声突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分别在临潼华清池捉住了蒋介石，在西安拘禁了蒋系军政大员。

捉蒋以后，张、杨向全国通电，说明事变的真相，提出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事变当天，张学良又让刘鼎给我党中央发电报，邀请我党派代表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后，首先撤销了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由他俩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在军事方面，成立联合参谋团，采取紧急措施，把东北军、西北军所属部队调到关中东部和西安附近，准备迎击南京亲日派可能发动的进攻。

政治方面，成立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事变后急待解决的各项重要政治问题。为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仿照红军办法，成立政治处。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顺应了人民抗日救国的要求，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国内各阶级和各派政治势力对西安事变的反应，极为复杂。国民党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亲日派何应钦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自己取而代之。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各地实力派，有的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主张，有的态度暧昧，玩弄两面手法，有的阴险狡诈，大搞投机钻营。

西安事变震惊了全世界。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借机在中国挑起内战，制造分裂，以便乘机独占中国。英美帝国主义由于在华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竭力支持宋美龄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我党中央的方针是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给张、杨以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抗日主张。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谈判。通电全国表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中央还命令红军主力准备进驻延安地区，必要时插到敌后，与张、杨部队一起，粉碎亲日派的

武装挑衅。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从保安启程。周恩来先在一队骑兵的护送下向延安前进，后又从延安登上飞机到达西安。在机上顾不上休息，听取前来迎接他的刘鼎汇报。

十七日，周恩来来到西安。当天晚上，与张学良会晤。第二天上午，又会晤了杨虎城。代表党中央与他们商讨西安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研究了对付南京亲日派的军事部署。

叶剑英比周恩来晚到西安。他到西安后，积极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制定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

十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分析当时的敌我态势，考虑到亲日派“讨逆军”向西安步步紧逼，东北军主力尚平凉、固原，红军还在庆阳以北，而胡宗南部正向天水移动，在这种形势下，如果集中主力，在运动中击败胡宗南，可以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因此，他向中央提出关于目前战略问题的建议：

估计时局将不能不出于战，我西北各军，现已处于内线作战的状态，我们的战役应下大决心，集中全力夹击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征）、曾（万钟）向南移动之师，西安可守之。否则，准备暂时放弃，求得西线胜利，可吸引川刘（湘）、鲁韩（复榘）、

李（宗仁）、白（崇禧）、晋阎（锡山）参加，转为外线作战，以开展局面，因这些人用力威胁不能吸引，只有战争胜利，才能吸引过来。

在军事部署的同时，积极地开展外交谈判。

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宋氏兄妹急于救蒋，对西安方面提出的谈判条件，几乎全部接受。经过两天谈判，达成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

周恩来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亲自会见了蒋介石，他向蒋介石说明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蒋介石对能生还南京感到意外，对谈判所达成的六项条件，表示完全接受，并对周恩来说：有关红军的事，今后你可和汉卿商量，研究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表现了高度娴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斗争艺术。

在周恩来和张、杨两将军与蒋介石谈判的同时，叶剑英为了贯彻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也日夜奔忙，参加各方面人士的座谈会、讨论会、报告会以及个别访问、接见等。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进行说服争取工作。同时将遇到的问题，及时电



请中央答复。

十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向中央汇报说，各方人士对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怀疑。主要问题是：共产党“能否真正放弃阶级革命”，取消苏维埃，建立“社会民主制”？“红军能否取消，归中央改编”，听从“中央”统一指挥？共产党“今后能否割断与莫斯科或第三国际关系”？共产党最近的政治纲领是什么？这些问题带有普遍性，为了宣传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央立即电复。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向各方人士进行解释，消除误会，增强团结，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不懈的努力。

十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叶剑英正在办公室研究工作，孙铭九急急忙忙跑来报告。

“副司令送蒋先生回洛阳，现在已到飞机场去了。”

俩人听到这突然的消息，大吃一惊。周恩来立即同孙铭九乘汽车赶赴机场。可是当他们到飞机场时，张学良送蒋介石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张学良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亲自送蒋回南京，反被蒋扣留，直到今天还未恢复自由。

## 在西安事变之后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一突然举动，如急石

击水，在西安各界人士中激起了层层波澜。

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奔走于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党在西安的人员之间，全力投入了善后工作，稳定局势，求得事变有一个好的发展前途。

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们去何柱国家里看望钱大钧。钱大钧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临潼捉蒋时负伤，住在何的家里养病。当晚他们又到邵力子家里访问。邵力子是事变前的陕西省主席，事变后也被张、杨两将军拘留。他们分别对钱大钧、邵力子表示慰问，转达了我党对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期望。同时还给钱、邵两人分析了中国处境和前途，指出了国共两党的历史使命。对他们的访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与人们期待相反，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首先发表了纯系捏造的《对张杨的训话》，接着软禁了张学良将军，然后又发表了行政院任免令和军政部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接着又提出东北军移驻甘肃、十七路军移驻渭北、红军移驻陕北，陇海线由中央军接管并设防西安的所谓“甲案”和更为苛刻的“乙案”。与此同时，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积极向西安推进，大军压境，企图用政治欺骗，军事压迫的办法，搞垮西安的“三位一体”，削弱西北革命势力，推翻他所许下的诺言。

内战又面临着一触即发之势。

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对蒋介石的所谓“训话”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批驳。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对党内又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支持一切使事变和平解决的办法。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坚决要求南京立即下令停止军事行动。

周恩来、叶剑英和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沉着机智，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们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周恩来、叶剑英和以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军事将领协商，由杨虎城领衔，发表了一份态度严峻、措施强硬的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将军和企图重新挑动内战的阴谋。

为了遏制蒋介石的军事威胁，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的高级领导人，在杨虎城的主持下，共同协商并拟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在联军参谋团会议上，叶剑英参谋长说，在军事上我们应集中主要兵力，到东部正面防线，对付潼关西进之敌，摆成一个鳝鱼篓

子形，使敌人能进得来，出不去。东北军在东部正面防线部署了一个军、两个直属师、两个骑兵师。十七路军大部集中渭北各县。红军主力一部在渭北，一部在商洛，这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可战可和的方案。

红军主力迅速向关中地区开进。一月七日达三原、泾阳、富平一带。十五军团到咸阳后，星夜兼程向商县进发，保证了联军的右翼安全。

由于西安方面采取了强硬态度，加之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使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在联军作了可战可和的军事部署之后，杨虎城两次派人到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随后又到潼关进行谈判。

正当谈判顺利进行的时候，西安方面，特别是东北军内部，在和还是战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斗争。

受命于张学良代理指挥东北军的杨虎城外境十分困难。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而且和、战两派都极力争取他站在自己一边。

在杨虎城进退两难、思想苦闷的时刻，叶剑英协助周恩来经常主动接近他，帮助他分析形势，处理各种棘手问题。杨虎城文化程度不高，但他脑子很好用。有一次叶剑英访问他时，碰到他的秘书拿来一份材料，让他签字。他让秘书给他念。秘书念完之后，

他立即口述那个地方需要改动，而且恰到好处。叶剑英看到杨虎城这种长期锻炼出来的才干，对杨更加敬佩。由于周恩来、叶剑英支持和帮助杨虎城工作，为杨出谋定策，使杨很受感动。

周恩来和叶剑英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和、战两派平等相待，多次找他们谈心，帮助他们认清形势和前途，开导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当时和、战形势不断出现反复，少壮派军官一意孤行，竟扬言要对中共代表团实行“兵谏”。为了应付意外情况，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周恩来把代表团大多数同志转移到三原红军总部，他和叶剑英继续留在西安。在最困难的时刻，叶剑英总是和周恩来在一起，协助周恩来作好工作。他们个别走访、开会演说，反复说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争取东北军团结抗战。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后，由于南京政府的逼迫，东北军和、战两派的分歧愈来愈大。周恩来和叶剑英耐心地说服主战派，可是几经说服，又几经变卦。二十七日，孙铭九、应德田等少壮派军官，请求代表团派红军帮助他们打仗。他们大哭大闹，长跪不起。这时军队中的主战派和社会上的主战派呼声交织在一起，如果不打一仗，“三位一体”就有破裂的危险。从总的形势看是不应该打仗的，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如果坚持不打，就可能失去好多朋友。为了团结抗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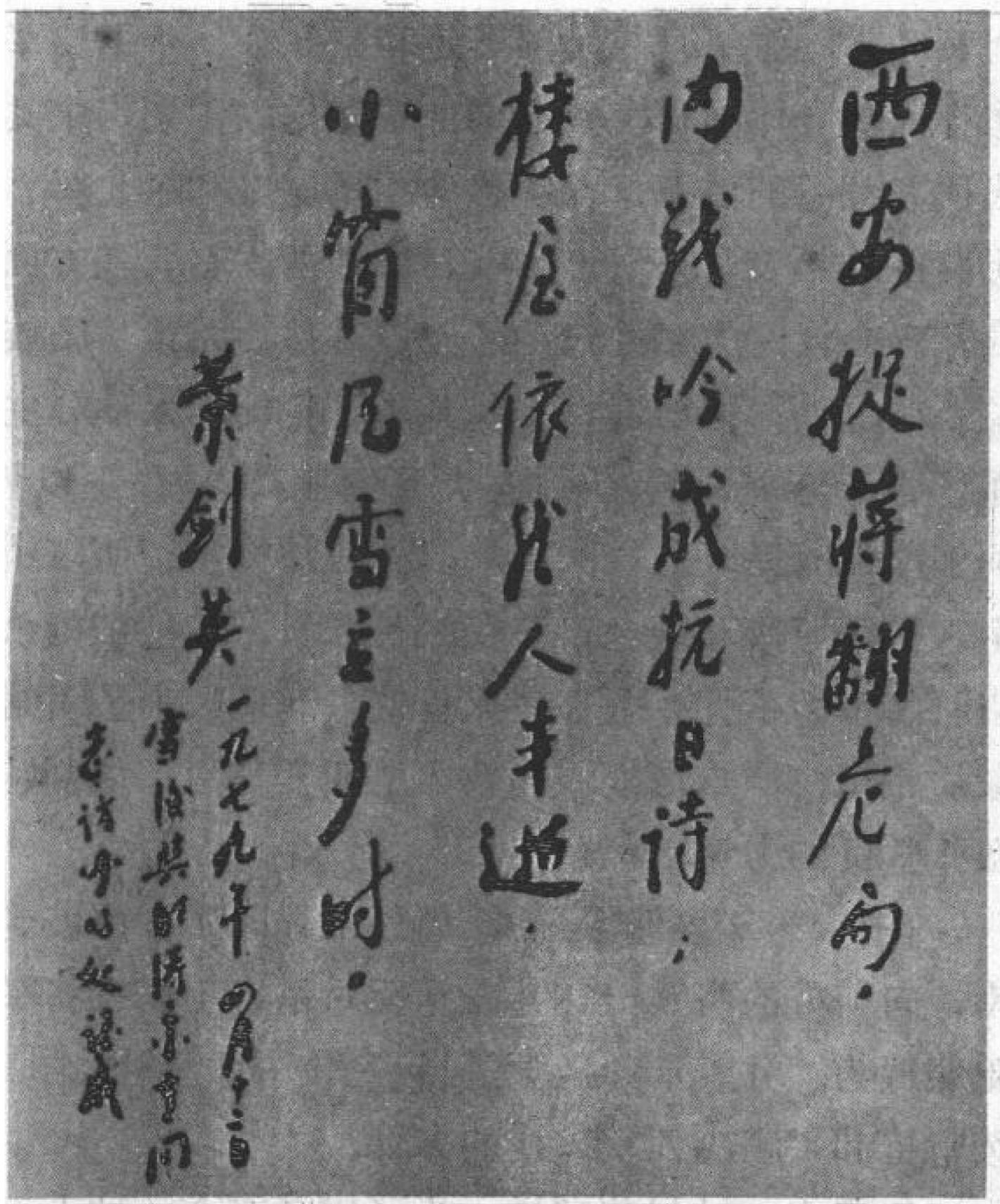
力量，中共代表团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保留自己的主张，准备帮助他们打好这一仗。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到泾阳云阳镇红军总部，召集了当时在三原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开会，反复研究，并报请中央批准，确定了联合打仗的方针。当晚，周恩来、叶剑英把代表团的意见和决定分别通知了杨虎城、东北军将领和少壮派军官。叶剑英还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参谋人员具体地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中共代表团和红军的诚意，深深感动了杨虎城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朋友。一月三十一日，在西安召开三方面最高军事会议，大家经过冷静分析，认为无论从民族利益还是从两军的前途考虑，都不宜打仗。大部分主战派都服从这个决议，但孙铭九等少壮派认为，王以哲、何柱国没有反映他们的要求，决心除掉王、何以镇压主和派，堵塞和谈之路。在二月二日，发生了枪杀王以哲将军的事件。杀害王以哲使东北军失去了团结的最后希望，严重地削弱和破坏了西安与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

在“二·二事件”之后，周恩来立即派刘澜波到渭南，向前方的将领传达共产党反对杀害王以哲将军的犯罪行为，并表示共产党坚持“三位一体”的团结，继续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周恩来、叶剑英研究，为了避免事变的扩大，把

孙铭九、应德田等几个人派刘鼎送到红军驻地，使为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对立面，避免了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周恩来、叶剑英等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动员了群众、团结了朋友，揭露了敌人，使南京和西安双方在“二·二事件”后不久，达成了和平解决的协议。



## 最后的使命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起来了。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叶剑英以中共代表的身份直接与国民党会谈。二月十二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开始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

在谈判中，中共代表坚持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所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的原则，“承认服从三民主义国家及国民党在全国领导，取消暴动及没收土地政策，停止赤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苏区为行政区”，“改编红军为国军，服从国民党政府领导”，将红军编为三个国防师、每师一万五千人，师以上成立总指挥部。另外还提出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和停止对西路军的军事进攻等要求。国民党方面提出中共方面无法接受的条件：要中共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要分割陕甘宁边区，划归各省地方行政区；取消民主选举制度；要红军改编为每师不超过一万人的军队，完全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南京政府向红军派遣各级军政人员。



三月十一日，周恩来将谈判情况报告中央。十三日，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向国民党申明：“顾、贺提案完全不能承认”，要求与蒋介石面谈。随后，周恩来回延安，叶剑英在西安进行联络。

在与国民党谈判的过程中，叶剑英还经常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保持联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二月十七日，东北军总部张政枋到红军联络处找叶剑英参谋长，研究如何报销张学良的借款问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张政枋一月上旬调到一一〇师任师长，需要交待粮秣处的经手事务，特别是要结清自己经手办理的张副司令借支垫款问题。二月上旬，粮秣处把张学良的临时借垫六十七万多元现款结清，请于学忠（东北军总部负责人）转南京中央报销。当时，于学忠因没有张的借条，不敢替张学良向南京报请。张政枋又去找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董出主意向红军联络处反映这些情况，想办法或开个证明，再向于学忠请求报销。张政枋在七贤庄找到叶参谋长，说明来意。叶剑英与林伯渠、南汉宸研究后，对张政枋说：这些钱既然张副司令给红军用了，我们就开个证明叫蒋介石报销。我们也是国家军队，蒋介石他不敢不报销。叶剑英一边说一边拿起笔，写了一张共用六十七万元的条子，盖上红军联络处的戳子，并说：“你拿去报吧，如于主席不给报，我去见他说个明白，不能叫

你为难。”

张政枋把叶参谋长写的条子，呈给于看。于一边看条子，一边皱着眉头说：“这个小条子能好使吗？它能承担这六十七万元巨款的责任吗？”正在于学忠面有难色时，董英斌说：“别看红军联络处机关小，它是代表红军的，红军现下也是国家军队，可以转报试试看。如果不行，事有事在，主席也不负什么责任。”于考虑了半天才说：好吧！报报看。

叶剑英主动揽起这件事，帮助东北军解决了一大难题。

二月十九日，叶剑英与十七路军赵寿山、许权中两将领交谈中，得知红二十七军收编了原属十七路军的宜君县民团赵呃杰部。赵团原有数十人（枪），后收缴保甲三、四百人（枪）。赵团与当地群众关系极恶，红军收编该部后仍住在原地，对当地群众威胁颇大。赵寿山、许权中请将该部调往别处。

叶剑英立即表示，为了全民抗日，我们两军团结比什么都重要。红军决不收编十七路军的民团，请赵、许两将军派人与当地红军联络，说服赵团，仍归十七路军。

赵、许两人表示坚决不要赵团，只求把赵团调往他地；如果归还保甲枪支，非常感激。

叶剑英将这一情况致电中央。

中央对这一情况很重视，当天复电：赵呃杰团因骚扰我二十七军，曾被二十七军全部击散并俘获一部。后来该团又集结，表示愿归红军领导，我地下党出面联络，由二十七军派人收编。中央现令二十七军通知该团归还十七路军。如不愿，则调富县训练，如不受调，则与十七路军配合消灭之。

叶剑英又把这一情况，向赵寿山、许权中两人说明，他们对中央的处理，非常满意。

叶剑英非常重视维护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友谊。三月三日，东北军缪征流、刘多荃把富平城防交于中央军七十九师。十七路军对此反应强烈。认为高陵、富平原属十七路军防地，西安事变以后归东北军暂住，东北军调防后，理应归还十七路军。叶剑英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东北军我党地下党员刘澜波、高崇民前往高陵，请缪征流、刘多荃把富平交还十七路军。叶剑英始终不忘东北军、十七路军这两个朋友，经常调解他们的矛盾，维护了团结。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在西安七贤庄一号设立了“红军联络处”。七贤庄座落在西安城内新城的北门外，是几个院落的西式平房，还有地下室。这里原是“德国医生海伯特牙科医院”。海伯特·温奇是德共党员，受德国共产党的委派到上海帮助中共工作。后来为了

解决陕北红军医疗器材和药品供应，他答应在七贤庄一号开设牙科诊所，掩护我党地下活动。西安事变那天上午，海伯特·温奇外出，不幸被流弹击中，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红军联络处在这里成立后，党派李涛、宣侠父在叶剑英具体领导下开展工作。这是在十年内战之后，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叶剑英曾在这里与国民党联络，与各方人士接谈，向他们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四月十六日，红军联络处，突然来了一个湖南人。这个人叫袁泽妃，曾在苏联留学，是黄埔第三期学生。他拿着国民党师长宋希濂的介绍信，要求商谈关于湘鄂边区红军问题。叶剑英为了取得中央的指示，约定第二天与袁商谈。

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如期与袁泽妃讨论了湘鄂边区红军停战及处置原则。但他一再表明，局部的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在国共两党合作以后才能实现。

叶剑英在七贤庄，还负责与国民党交涉领取经费、被服装备等事宜，并讨论在兰州设立红军联络处问题。

叶剑英还与顾祝同谈判，要求释放我四方面军在河西被俘的同志，并且要求介绍张文彬去青海，接回四方面军被俘的干部并收容流落的红军战士。恰在这时，叶剑英收到了黄鹄显（原装甲兵副司令）寄来的

一封信。

黄鹄显是四方面军三十军参谋长，部队在河西失利被俘。国民党把黄鹄显等三十多名营以上干部送到西安监禁，当时外面并不知道。有一天一个站岗的卫兵对黄说：现在国共谈判，西安有红军的联络处，你们的周恩来先生、叶剑英参谋长都在那里。

黄说：“你能不能为我送一封信给他们？”

卫兵回答说：不行。但答应可以帮助把信丢到邮箱寄去。

就这样，黄鹄显按照卫兵说的地址，把信寄到西安七贤庄叶剑英手里。

过了两天，周恩来派孔石泉（当时是红军联络处秘书）来监狱，黄鹄显把三十多人的名单交给了孔石泉。孔对黄说：周副主席、叶参谋长说了，你们可以回延安，目前正进行交涉。

经过周恩来、叶剑英的努力，又过了一天，黄鹄显等三十多人到达七贤庄办事处，回到了党的怀抱。后来，叶剑英还到西安车站亲自迎接西路军一部分被俘归来的同志。

叶剑英在七贤庄不仅代表我党与国民党联络，做公开的统战工作，而且还负责地下党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经常通过西安联络处向中央汇报情况。当时地下党送来的报告，都是密写的，通过技术

处理，才能报告中央。叶剑英对这件工作很重视，要求工作人员及时处理，不能过夜，他利用合法身份作了许多秘密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芦沟桥事变。我党通电全国：“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七月九日，叶剑英与其他红军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七月十五日，我党给国民党送去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到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八月九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国防会议。通过多次谈判，在我党再三的催促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才于八月二十二日同意并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早在七月十五日送去的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三日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叶剑英同志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

## 西安事变，红军南下支援抗日友军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第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等爱国人士，同逼迫张、杨继续反共内战的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骤然激化。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率部扣留了来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十余人，并通电全国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旨的八项主张。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着“讨逆”的幌子，先后调遣二十多个师从东西两面向西安逼进，妄图挑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中共中央从全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及时地制定了坚决反对新的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并应张、杨的要求，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调解谈判，同时命令红军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一部从定边、环县地区南下至西安附近集中，协助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迎击亲日派的“讨伐”。二十四日，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二十五日被释放。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于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

（转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1927—1982〕，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 新疆航空队始末

欧阳如华

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阶级矛盾由主要矛盾变为非主要矛盾，民族矛盾上升为我国的主要矛盾。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党中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在新疆，我党同盛世才合作，派陈云同志为我党驻新疆代表，并建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盛世才是个两面三刀、反复无常、善于投机钻营的野心家。一九三三年，在推翻新疆原督办金树仁的“四·一二”政变中，他夺取了新疆的统治权，成为新疆督办。

盛世才上台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独霸新疆，抵制国民党和驻疆军阀马仲英等人对权力的争夺，便伪装进步，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帜，采取亲苏反帝的政策，提出“八大宣言”（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行农村救济，扩大教育，推行自治，实行民族

平等，保障信教自由)和“六大政策”(反帝，亲苏，和平，建设，民族平等，清廉)。他为了取得苏联的帮助，聘请苏联专家、苏联顾问到新疆办财政，办教育，办军事。与我党合作后，他允许我党刊物在新疆出版发行，收容我方伤病员在新疆休息治疗，同意我方人员假道新疆，来往于苏联、延安之间。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红军西路军在甘肃石窝召开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进入祁连山游击，后来分散突围，陆续回到延安。另一路约七百余人，由李先念同志率领，艰苦转战四十余日，剩下四百余人，进抵新疆星星峡。在陈云、滕代远同志的接应下，于五月初到达迪化(乌鲁木齐)，编成一个干部队和四个战士队，对外称新疆督办公署新兵营，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就在这一年，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同志同盛世才达成了协议，用盛的名义，以苏联的教官和装备，为我党培养航空技术人才。协议达成后，陈云同志即从新兵营中挑选了一批学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陈云同志调回延安后，又从抗大、摩托学校选调一批同志来新疆学航空。陈云同志对他们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有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要搞好团结，遵守纪律，保持党的荣誉。”

一九三八年初，我党新疆航空队组成，共四十三人。其中学飞行的二十五人，他们是：吕黎平、安志敏、方子翼、袁彬、胡子昆、陈熙、刘中惠、张毅、汪德祥、杨一德、方槐、方华、夏伯勋、黎明、赵群、李奎、谢奇光、王东汉、龚廷寿、邓明、余天照、黄明煌、杨光瑶、王聚奎、彭浩。学机械的十八人，他们是：严振刚、朱火华、周立范、金生、曹麟辉、丁园、王云清、黄思深、陈旭、云甫、周绍光、刘子立、陈御风、吴峰、刘子宁、彭仁发、吴茂林、余志强。四十三人中，属西路军的二十四人，从延安来的十九人，全部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为了安排好他们的学习，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同志和中央书记处，与邓发同志（接替陈云同志为中央驻新疆代表）有三次电报往来，对飞行学员的身体条件、人数，从延安去新疆的行军负责人、路线以及同盛世才商定的意见等等，都有原则指示。航空队开学时，中央代表邓发同志给他们的任务是：一、加紧学习技术；二、严守纪律；三、在群众中不作任何党的工作，不发展组织。

开学前，邓发同志事前同苏军顾问谈妥，红军干部进航空队，不参加文化考试。他同盛世才说：“我们这批人，都是红军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文化低，要考，考不上，免了文化考试吧。”盛世才见苏联顾问同

意我党的意见，也不便说什么。飞行班二十五人，佩戴国民党的上士领章。这样，在国民党盛世才的航空队中有了一批共产党员。这在盛世才的上层是公开的。在盛世才的部队的下层军官中，虽然知道“新兵营”是红军，但并不知道底细。

航空队成立了秘密党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是李维先（吕黎平），第二任是机械班的严振刚，第三任是机械班的朱火华，第四任是飞行班的方华，第五任是飞行班的汪德祥，第六任又是李维先。航空队党的组织关系保存在中央代表机关，党小组会每周一次，利用星期日盛世才的人放假休息，他们过组织生活，谈形势，学习一些必要的文件。党支部大会每月一次，步行到中央代表机关去开。通常是传达中央重要文件和关于国际国内形势。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航空队正式开课。学习航空理论、发动机原理、飞机构造等课程。预定理论教育一个月，四月一日开飞（实际开飞时间是四月四日）。

地面航空理论教育是苏联的六小时一贯制。上午六节课，下午和晚上复习、自习。四月四日，开始在乌一2型教练机上飞行，这是一种苏式双翼教练机，外号“双膀子”。编成三个班，二、三班各十人，一班六人。飞行教官有三个中国人，其中一个维族，取汉

文名字叫黎焕章（他不是共产党员，能说俄语，对苏对我党都友好，是进步青年，后来也被盛世才关起来，据说已被害）。六月底，在乌—2型飞机上飞了十五—二十小时后，都放了单飞。至十月份，初教机训练结束。

接着开始飞中级教练机，是拉—5型侦察机，马力大，有七百匹马力，乌—2型飞机才一百二十匹马力。至一九三九年夏天，中教机也放单飞了。

一九三九年冬，由于苏联拒绝了盛世才提出的援助武器的要求，盛世才对苏联的态度产生了动摇，航空队的训练出现了一些曲折。从一九四〇年夏开始，停飞了八九个月，一直到一九四一年才复飞开课。

一九四一年航空队继续飞拉—5侦察机，李维先、方子翼、方槐、陈熙、袁彬、刘中惠、夏伯勋等十名共产党员被挑选出来飞依—15和依—16型战斗机。他们表面上是苏联顾问从航空队按技术条件选出来的（因为航空队里还有盛世才的空军人员），实际上是中央代表陈潭秋同志同苏联顾问早已内定好了的。盛世才不懂空军，他办航空队全由苏联顾问说了算。从一九三九年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二年七月初，他们飞完了拉—5、依—15、依—16三个机种，约二百八十小时。

航空队共四个机场，从南门外航空队部门口到城墙根约八百米，是初教机机场。博格旦山下的是欧亚

机场、地窝铺机场（即今天的民航机场）。在迪化西北约六十公里的是高家户机场，这里也叫湖南营，据说是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在收复被沙俄和英帝侵占的新疆失地后，留下部分湖南兵在这里种水稻，后来就定居在此。

在这段时期，学飞行的汪德祥同志于一九四二年六月飞行失事牺牲；学机械的彭仁发同志于一九四〇年因机械事故牺牲；吴茂林同志因病调离航空队（一九四四年在狱中病故）；因犯错误调离航空队的有龚廷寿、邓明、余志强等三人。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德国疯狂进犯苏联，直逼莫斯科。在此情况下，盛世才对苏联的态度更加动摇了。与此同时，蒋介石国民党加紧拉拢盛世才。一九四二年蒋、盛双方拍板成交：蒋介石给了盛世才国民党中央委员、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新疆边防督办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等头衔；盛即由亲苏联共转为反共亲蒋，驱逐苏联在新疆的顾问专家，逮捕我党在新疆的工作人员。七月初的一天，盛世才派一名中国教官驾机来高家户，说：“盛督办叫你们下午就回去”。我党航空队人员坐两辆汽车回到迪化后，盛世才在电话中对李维先说：“我是盛督办，我决定你们接电话后，立即离开航空队，到南梁招待所集中。此事，我已告诉徐杰先生（陈潭秋同志的化名）。”

接完电话后，航空队党支部派支委金生去向陈潭秋同志报告了这一情况。陈潭秋同志说：“情况很复杂，你们先出来。”就这样，三十八人撤出航空队到了南梁招待所。

在南梁招待所，大家回顾了四年的学习和生活：四年内飞完了三个机种的战斗课目，加上初教机，是四个机种，共三百小时左右，如果允许他们升空作战，他们可以立即驾机升空同敌人战斗。机务班的同志能够维护四个机种，维护质量比盛世才的人好。这批同志尽管文化低，但刻苦学习，成绩都在四、五分以上，超过盛世才的人。

到了南梁招待所以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航空队人员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至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这五个多月，航空队人员被软禁在督办公署后院教导队驻地。

九月十七日下午，盛世才派航空队两个教官来南梁招待所，用“盛督办找你们谈话”的名义，把全队人员拉到督办公署。大家感到突然，又派金生同志去请示陈潭秋同志（他离航空队住地两里多路）。金生看到中央代表处周围都是盛世才的警察、特务，无法取得联系。实际上，九月十七日这一天，盛世才已将我党驻新疆代表机关和从苏联回延安或从延安去苏联路经

新疆的同志全部逮捕，其中有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张子意、马明方、方志纯、杨之华等等。在此以前，盛世才借口新疆“民族矛盾”，“中共人员分散在各县不安全”，先把我党分散在新疆各地工作的同志陆续集中到迪化，然后分三处软禁，即中央代表机关和途经新疆的同志为一处，在各地工作的同志为一处，航空队的同志为一处。

金生回来后，航空队党支部对盛世才作了分析，认为：盛世才是我党的可靠朋友，共产党员、红军学航空是他同意的。眼下，国共合作没有破裂，苏联在新疆有很大影响，盛世才不会，也不敢关押航空队人员和拘捕共产党、八路军，可能是因为战争紧张，暂时把航空队人员隐蔽起来。显然，这些估计都是错误的。

软禁期间，在院子里可以打球、活动，但不准外出。航空队人员向盛世才提出质问，要求见我党中央代表，又写信找陈潭秋同志，都没有结果。大家商量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关，就翻墙出去。李维先、陈熙、金生各翻墙出去两次。找不到陈潭秋同志，就到苏联驻迪化领事馆，通过他们向莫斯科发电报，请共产国际转告延安。电报发了也无结果。李维先又去苏联航空顾问家里询问，苏联同志说：请你们不要再来了，我们的处境也很困难，你们的情况都已向你们党中央报告了。后来，苏联驻迪化领事馆也被盛世才关



闭了。

这一阶段，在复杂的条件下，生活指导委员会（相当于党支部）把航空队全体同志团结在一起，领导大家学习，开展了反动摇反逃跑的思想斗争。大家学习了《中国革命近代史》、《新民主主义论》、数学、物理、语文。但也发生了杨光瑶、王聚奎二人逃跑叛变的事件。

第二阶段，一九四三年二月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被软禁在刘公馆处，处境进一步困难。

一九四三年春节过后，盛世才把航空队人员从教导队驻地搬到刘公馆。这是个四合院，靠近城墙。在这里，监管进一步严了。如果说，在教导队可以偷着翻墙出去，在刘公馆就根本不可能，因为岗哨增多。外出不可能，就买通送饭的炊事员，请他送信给在外就医的航空队学员杨一德，要他去打听中央代表的下落，也无结果。

这一阶段，敌人查抄了航空队员的马列著作和我党书刊，航空队人员得不到任何消息。

第三阶段，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在第二监狱中生活。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晚上，盛世才的特务赶来几辆马车，把航空队人员送进迪化第二监狱。这时，航空队人员才知道，这里关着中央驻新疆办事处和取

道新疆去苏联或回延安的同志、在新疆各地工作的同志，加上航空队的同志共一百五十多人。航空队的同志向中央代表机关和各地工作的同志汇报了他们前一阶段在狱中的情况。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航空队人员对盛世才有了本质的认识，坚定了革命斗争的决心。这个时期，虽然盛世才加紧了迫害，威逼、利诱，但是大家仍能保持革命气节，表示要象老大哥（指中央代表和在各地工作的同志）一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但后来也发生了黄明煌、余天照、彭浩等三人动摇脱党的问题。

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虽然得到了“恩惠”，被委任了许多军政要职，但在“开发边疆”的名义下，蒋介石的势力渗入新疆。盛世才的权力日益削弱，这个新疆原来的独裁者，再也不能独霸新疆了。他要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有事要向蒋介石呈报。他的“六大政策”被“三民主义”代替了，他的“六星红旗”被“青天白日旗”代替了。盛世才感到已经“引狼入室”。一九四四年，国际、国内形势又有了变化，苏联已击溃了希特勒的进犯，日军却在向国民党统治区贵州进逼，这就更动摇了盛世才投靠蒋介石的信念。他开始着手逐出国民党的势力，发动所谓“八月事变”，逮捕了在新疆的国民党员。但带来的是蒋介石给盛世才更大的压力。蒋介石下令调盛世才为农林部长，即刻离开新疆；要

胡宗南部队待命而动。此时，在伊犁、塔城、阿山等三区又兴起了反盛武装斗争。盛世才为了摆脱困境，企图向苏联求援，苏联表示“不干涉内政”。盛世才走投无路，只得灰溜溜地离开新疆。

盛世才离开新疆后，蒋介石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兼西北党政考察团团长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吴忠信上台后，声言要释放被盛世才关押的人士。

从一九四四年六月开始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党多次与国民党谈判，提出要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并把这一内容写进了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拜访了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郑重提出释放政治犯一事，并表示如国民党方面言而无信，中共将公开揭露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的行为。

一九四六年三月，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屈武为迪化市市长。张治中调阅了在押的我党人员材料，并查明我党主要人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已于一九四三年九月被盛世才杀害，在押的都是一般的政治犯和学航空的人员。他给蒋介石三次电报，陈述主动释放在押的一批共产党员对国共两党谈判有利的理由。蒋介石接到张治中的三次电报后，一再拖延，一直到五月间才勉强同意。于是，张治中决定：一、由行营派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护送我党人员去延安；二、以西北行营主任的名义，

电令甘肃省主席谷正纲、陕西第一战区长官胡宗南、省主席祝绍同等沿途布置军警妥为接待；三、将被释放人员的简历和动身日期电告周恩来；四、我党被关押人员离迪化前，迪化市市长屈武要经常去狱中探望并改善生活和管理，使之身体康复，准备长途行军。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被盛世才关押的一百五十多人，至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仅存一百二十多人了。这批人员从迪化出发，在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先生的护送下，历时一个月，于七月十日到达延安吉加村。途中，在通过咸阳大桥时，胡宗南企图在桥头把我党人员截住，送往咸阳监狱。刘亚哲以少将身份，站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踏板上，闯过关卡，直达西安。刘亚哲一面安排我党人员在一家澡塘洗澡和到省医院就医，一面紧急约见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提出中共人员只能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招待所才有安全保证。刘亚哲这些措施，打破了胡宗南的阴谋。

航空队人员三十二人到达延安后，经过一个月的休息和整顿，一九四六年冬奉命赴东北参加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的工作。他们在学校分别担任飞行教员和机械教员，不久又分别担任处长、大队长、教导员、协理员、科长、股长等行政领导，并继续任教。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以在

苏联学过飞行的和新疆航空队培养出来的红军干部为骨干，同其他教员、工作人员一起，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共培养一百一十名飞行员、二十多名领航员和三百多名各类地勤人员。他们是建设人民空军的“母机”，为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新疆航空队的同志同一大批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干部，奉中央军委之命奔赴各地接收国民党的机场、飞机、航材和收编起义的空、地勤人员，并筹建新的航空学校。在最初组建的七所航空学校中，有四所航空学校的校长是新疆航空队出来的同志，即三航校校长陈熙，四航校校长吕黎平，五航校校长方子翼，六航校校长安志敏。还有些同志在飞行部队工作。

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国民党的混合机群轰炸上海。之后，广州、柳州等地亦遭轰炸，损失重大。在部队工作的袁彬、夏伯勋等同志率领部队同国民党空军进行了英勇战斗。学飞行和学机械的同志，还分别参加了保卫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福州等大城市领空的战斗。他们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和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中，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 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

朱 瑞

## 朱瑞同志简介

朱瑞，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曾任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等职务。一九四八年在辽沈战役中牺牲。

此文系朱瑞同志夫人潘彩琴同志提供。

——编者

我是江苏宿迁县人，生于一九〇五年，现年卅九岁。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三代的地主家庭。由于宗支繁衍，亲疏析离，至我已家道下降，只有田百余亩。

父代兄弟三人。伯父早故，只余伯母，无后。我父母生子二、女四。长兄继伯父家，我行五。叔家也生子二、女四。三家异产共居……

我幼年体弱多病，四岁成行，六岁始读。性沉默，寡言笑，终岁蹒跚于姊妹行中，至于成长……我八岁时，父去世，孤儿寡妇，经纪无人，家况中落。

我幼时不甚聪敏，但爽朗深厚，家人无上下均爱我。伯母、叔母不识字，但常以闺中听得千家诗“白日依山尽”、“春眠不觉晓”、“一为迁客去长沙”……句授我，辄成诵。幼年又喜听故事，独善孤臣孽子及忠贞节烈情事。热心多情，听书到凄凉悲惨处，每痛哭失声，姊妹均笑我呆。

八岁（一九一三年）入家塾，未几辍学。十岁入邻乡私立小学，始正式读书。时值辛亥革命之后，乡间关于孙、黄的革命党谣传甚多。适邻村有孙姓名伯文者自外乡归，因他曾与孙文共过奔走，带来不少有关革党消息；因孙与小学教员友善，故学生有时也听到一二。我年幼无知，每觉新奇，对革命党略无坏感。

十一岁（一九一六年）随长兄改入区立小学，去家十二里，是为离家之始。此校办理较好，学生众多，且住于市镇，年龄与见识俱增。在区立小学读书二年，成绩平平。惟耻落后，故那门功课受窘，必发奋赶上，

转为优异方休。参加革命自外归来之孙伯文氏曾一度主办此小学，给我关于“革命”知识亦较伙，惟孙氏在社会上仍不甚公开与合法，且终因此引退。我童时思想上最奇怪这一点，总觉此事非比寻常。

在此期间，因离家就学，生活不如在家舒适。同学中生活衣着亦俱见穷富等差，我开始在社会上看到不平，心中时感不快！自己辄同情贫者，厌恶有者。又每逢星期或节日回家，母亲及姊妹接待倍殷。但恒见兄姊之间生活待遇有别，好的吃食总是给我；有争吵，姊妹总向我让步，低头。我乃开始在骨肉之间也看到不平，时感不乐。母亲有时说：“女孩子吃不吃不要紧”；姊妹们也解释说：“我们在家常吃的。”但童时心情对这点总觉得不应该。且自从知道了兄妹间地位的差别，在自己纯善无猜的心灵上，深深划了一道创痕；有时觉得伤心，但又不知为着什么。此后在我心里便一直暗暗的培养着尊重女性，尊重姊妹的感情。我在家里，在学校，以至以后在社会，在党内与一般同志，尤其同女性的友情一般是好的。

在此期间，我爱听说书，有时因此误课受到责罚。又爱打抱不平，为了协助弱者，常与陌路偶遇不相识的人争吵，以至殴打。

读了二年书，小学平平的过去。十二岁（一九一八年）入公立高小，去家更远，只能寒暑假回家，从



此我成为一个独立生活和学习的孩子了。这一高小办得更好，为江苏淮北成绩优异的学校，因此以后被改为县立。在这学校思想较发达，学习成绩亦渐提高。十五岁时，终以第四名毕业该校（一九二〇年）。

在此期间，我由过去的爱听说唱书到自己会读说唱书。我遍读了许多小说、童话、故事。就中我最喜爱的一是《岳传》，二是《七侠五义》，三是《水浒》等三部书。经此之后，文化提高了，知识丰富了，且爱读报。当时已知道所谓欧战，并第一次听到关于劳农俄国、虚无党、过急党、李宁（列宁）革命说法。此时自己不只觉得新奇，而且自然的将它与过去了解之“非常的”“新奇”的关于“革命党”的知识联在一起。我想：“这才是大人物干的事！”彼时颇慕行侠尚义与祖述、宗悫之风。心里很想当一个英雄侠士，但以后知道不成，乃改念企望当空军或海军，因为自己以为也是乘风破浪的事业啊！但当时身体一般仍不好。身体不好不能当英雄侠士，据说也不能当海军、空军，于是一转转到了文学上面来，很想当一个文学家。这一念头都是以后在中学年代引导我走上新文化，接近及走入社会主义的开始。

高小年代，我发育已近成熟了，思想亦在开始形成。这时我开始知道人生的弊端。觉得男女有差别，社会有等级，国家积弱如斯，世界上满不讲理。心里

有些忧愁，有时便愤恨，思想上便茁长着爱平等，爱穷人，爱弱者，爱国家的萌芽，独不爱所谓世界，觉得世界都是欺负中国的。当高小最后一年，适值反“廿一条”，抵制日货运动。我乃以一个激烈的突出的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第一次参加了学校及城镇的反日政治斗争。在反对奸商，捣毁日货的斗争中，常感愤到痛哭流涕。

这时期我想革命！但这只是思想。

在此期间，除了直观的客观知识加强了我革命意志外，《岳传》增益我以热烈的民族思想，《七侠五义》赋予我对屈辱以崇高同情心，《水浒传》给我以朦胧的社会思想及应该捣乱的念头。这时谁也没有宣传过我，社会上还没有这种思想先进的宣传的人。

很显然的，以我的当时，我的出身，这些足以引起我思想上的创造与对革命的皈依的原因，是有其“先天”的脆弱性的，而且是不可免的。

但也正因有此一段思想，就在这一点上与劳动者革命的阶级斗争相吻合，它引导我在此后的全面思想上得以与这一伟大斗争终于一致。

\* \* \*

高小毕业，因地方匪乱裹足，未能应试中学。得同乡协助，得免考入徐州培心（教会）中学，良非所愿。但徐州为大城市，思想的与社会的情况更加复杂。

我由喜爱白话文，走向喜爱新文化，从而接近思想前进的青年同学。经过他们又读得更多的新书籍，知道更多的新思想。这时期我曾读过《向导》、《新青年》、孙文主义学说、胡适《三叶集》、《独秀文存》、瞿秋白(?)的《社会科学讲义》。自己亦爱读新诗及白话文。“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列宁”、“巴枯宁”等名称，更新鲜的呈现于认识中。自己觉得能学学他们的好，但仍无所谓结党的思想。

在此期间，值欧战议和之后，青岛及胶济路之争，充满新闻报纸中，民族爱国思想空前激荡。“培心”为美国人美会所主办，校长为美人，常在课室内大大抨击日本，同情中国。但我总未因此对他表示感激，总觉得他是以大老板的资格来说话，很觉讨厌。“国际”两字在此时第一次听到，西历一千几百十几年的说法第一次见到。由于热情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与同学函信往还总编写“大中华民国年月”字样。反对西历亦反对所谓“国际”。一次曾向进步与交好的同学（马汝良，徐州西关人）写信说：“国际”之对中国，就好象捉迷藏。国际是围绕中国之周围国家，中国是手足被缚，眼睛被蒙的孩子，被大家围绕着来捉迷藏。还口口声声说“国际”“国际”，那还有国际可言？同学称善。但这位姓马的同学思想比我进步、清楚。《向导》及《新青年》都是他介绍给我的，他对我思想及进步颇多帮

助。中学毕业后，在上海介绍我入国民党及青年团的也就是他。

在教会中学读书年代，为一思想变化，即反宗教，反迷信。我家是迷信最少之家庭，在教会中学则是连灵魂都浸在迷信中的思想教育。我心里很不满意，不但反对外国人，反对迷信，因此也便反对教徒，讥笑“亚门”，讥笑上帝是私生子，是羊种。每逢礼拜及教徒受洗典礼，则常偕同一部进步同学捣蛋（他们吃圣酒，我们则吃烧酒；他们啖圣馐，我们则啃烧饼），校方对我们颇注目。适校方因责打高小一个星期日不请假无故外出的小学生，激起我在的那一班之公愤。立即罢课，并蜂拥到另一课室殴打执行处罚之教员，并引起全校声援。校方大受威胁。为制止风潮立即宣传（布）提前放暑假，风潮旋被分化。学生中的活动分子被开除六十余人，我为主要的一个。这一打击，我个人深觉痛快。家庭接到学校通知，也并未斥责（长兄先一年也曾在此校读书，因父丧母衰须主家政，兼之他甚爱我，集中心力专门抚养我，他自动辍学。他对这一中学的情况甚了然。故对我之斗争深表同情）。之后，得同学之助，转学南京一私立中学读书，时年十七岁（一九二二年）。此中学什九为考试落第或只为浪荡不为读书的纨绔子弟。中学既私立，生意色彩亦甚浓。但我是诚心读书的学生，功课甚好，为学校争光

不少。校方及几个主要教员均爱我，同学亦尊敬。在这里，我开始有计划的阅读进步书籍，半自觉的与比较进步同学交结，并与徐州时代之进步同学保持感情及思想上的联系。

在徐州及在南京学生时代，我“反叛”思想日渐坚固。在学习中每异乎常人的抵抗许多学习制度，如书法坚不临贴（帖），自己随便写，作文题目不好常自题自写，毕业考试坚不作预修卷子（私立中学为应付教育厅，以便因成绩优异取得教厅津贴，在毕业前以一份考题拟出，交学生自己做好答案，背诵纯熟，以便在大考中于教厅监学监督之下应试）。有一次自拟作文题为“拟孙文讨贼檄”，仿骆宾王调大骂北洋军阀（时江苏督军为北洋系之齐燮元）。国文教员批语甚好，但在展览会内，暗地告我将我的这篇文章撕去，以防不测。我又在学校《课余杂志》内写小说一篇，主题为一个青年不满现实，发牢骚，说民国只有招牌没有内容，还要革命。在毕业典礼上，校方要我作英文演讲，我想英文谁也不懂，坚要作中文演讲。在台上在齐燮元的代表参加之下，大骂时政，同情灾民。所谓初生犊儿，故当时对这些行为自己是不觉得怕的。但校方及教员们常为我担心。有时也同我谈谈。我后考入广东中山大学读书，一个国文教员还远道写一个信给我。有云：“……切勿太露锋芒，十年后终当为社会

有用之材。”

年十九岁（一九二四年）中学毕业，此时“反叛”思想已经形成。只想革命，对国民党，孙中山尤予崇敬。但即在当时，已经知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更进一步及更彻底的革命思想。在徐州时曾向一个女友表示，除共妻主义外（自己以为有所谓共妻主义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孙文主义（尚不知三民主义）我均赞成。中学毕业，年事成长，思想形成。第一个问题：到哪里求学？干什么？关于到哪里？从家庭（长兄）、学校及同学均赞我成绩、学问都不错，希望我就近进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当时有谓进入东南大学为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否则，亦应进北京大学。再不然，任何国立大学亦可，只要“国立”，尤其家里这样期望。我在南京两年，已深知东南大学为培植奴才及书蠹之所，极端反对。在徐州之同学马汝良至此时已考入上海大学，我接受他的意见，欲考“上大”，但家里反对。一因上海大学非国立，且素称野鸡大学，二因上海思想不稳。家里并函告，如不考“国立”即停学。我则立志，如不采取我的意见，宁辍学。正在相持不下之际，适广东高等师范改为国立（民国政府）广东大学，布告招生。在上海者由大同大学代考，我真喜出望外。一因到广东为梦寐所希望而未敢实践者，二因大学亦国立（什么国，家庭不大

注意的)，可搪塞家庭。到上海一考即取。时年十九岁（一九二四年）。到广东就学时，适值江浙战争，历尽困难始达目的。家乡人都很奇怪的说：“这孩子真奇怪，事不出省，即可大学毕业，何必漂洋过海到广东学什么。我们祖宗三代都没有漂洋过海的啊！”似乎我既大胆，且为“有改于父之道”的样子。

值得郑重记述的，就是在考“广大”时，在上海大学访马姓同学，经他介绍加入国民党。据他说，国共合作，加入国民党同时即亦加入C Y。加入国民党前未参加过会，只于一九二五年暑假回家过徐时，受马姓同志之召，同六七个学生（均不识）开过一次会，据说是C Y会。但我当时是不知道所谓组织及所谓会议的。在徐州还认识过朱务平（党员）、穆维钧（团员）等。去广东后，马告我章龙（即罗章龙）到广州时将去找我联系，但在广东读书一年半，终未见罗章龙其人。以后即去苏联（一九二五年）。在苏联重新入团（一九二六年）。

在此期间是我由思想（革命）进至言论（写文章小说）、行动（罢课，宣传同学）与组织（入国民党及C Y）的全面进步时期。但其实我所谓革命，仍然只是一个狭隘的民族爱国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仍只是倾向。至于加入国民党及C Y组织，自己虽是愿意，高兴，但仍是被动的，非觉悟的，且实无组织生活及

任务。这一时期，中学整个四年可以说只是我思想行为、组织发展的原始阶段。其意义是在这几方面我都摸索了一个大方向，这对以后的发展有着决定的作用的。

\* \* \*

一九二四年秋到广东大学学习。原来我对广东及“广大”是抱着无限希望，而且认真想学一学，并想从此设法到苏联去。但到“广大”不长时间，我对学习组织即有些不满。原来大学功课竟比中学还低，这是一；第二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但“广大”则死气沉沉，只我们预科（大多均系进步青年）较活跃，本科以上均守旧；第三学校组织松懈，既无新事物，亦无新思想，教员大多饭桶。我在失望之际，即改变方针：一年中间，一方面敷衍学习（很容易，三月不到课也不要紧），另一方面尽自己所有，搜求进步书籍，自行研读；如可能，将设法到苏联去。为此，曾写信给“上大”马姓同学，并找同乡孙伯文（当时任长州要塞司令部副官长）设法，均无结果。正值此时（一九二五年，时年二十）苏联创立“中大”，在广东招生。我喜出望外，即决心抛去“广大”，投考“中大”。经过几次考试，竟然录取，于当年十二月四日从珠江登船，六号即行起碇。一九三六年〔一九二六年〕正月十二日到莫斯科，十四日入学，时年二十一。从此而上苏联学习，这实是决定我



终生方向的一次历史的重大变化。

在“广大”学习中，曾因反对学数学（我们是法科，可不必学数学，且数学课本在中学时大部同学均学过者），闹了罢课及殴教员的风潮，并派员去见汪精卫请愿，结果未成。除一个同学受停学三个月的处分外，我与另三人受两大过处分，十四人受一大过处分而了结。从此次风潮中，我体验到广东教育及上层知识分子中的反动性，甚为不满。从此我得到一个认识，一直到今天都坚持的这个认识，即中国大学教育是坏的。做一个国民，初中毕业即可，即有了基本文化科学社会知识以认识社会，即可进入社会活动，不要进大学，大学越学越坏！因中国的大学受阶级性的局限，无例外的只是教导一些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奴才货色！

在这短短一年多时光，我同时接受了国共两党的政治影响，看见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也开始知道一点关于国共两党间的差别。我的思想是：国民党好，共产党更好，两党合作尤好。但我亦知道两党合作有些问题（从报纸上，从黄埔及广东大学中思想与派别斗争中觉到），但我希望两党是团结的。记得在莫斯科“中大”考试的口试时，陈公博（当时考官有陈、谭等取前五十名。识者为陈公博）问我：“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有何分别？”我答：“共产主义是以革命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三民主义是以改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当

时尚不知所谓革命性质、阶段及任务之区别)。又问：“国共两党能不能合作到底？”我瞬间即意识到“合作到底”大概有问题他才问我。我很策略的（在当时亦是如此想法）答说：“只要两党领导者精诚合作，领导的好，能合作到底。”

当国民党中央党部欢送我们“出洋”时，汪精卫训话，末尾他说了一句：“希望同学们整个去，整个回来。”我当时心里十分重视并很怀疑这句话，我想这句话内有话，而且有点讨厌这句话。

在考取后定期起程中，教员同学纷纷饯行。他们一般有两种态度，一是庆祝我们光明远大，前途无量；一种是冷冷的向我们嘱咐，到苏联后取冷眼静观辨别是非的态度。后一种说法我是十分讨厌的，而且这些人平时也就有些讨厌。

在学习生活中，有人宣传我，加入孙文主义学会，被我拒绝了。反之，我却宣传社会主义。因常与这些家伙发生争议，他们很不满意我，在临去苏联时，这些人便明里暗里冷言冷语的说“吃卢布去了”。我完全没有理他们，一心快走，结果我争得了第一批动身之数（二十二）人。

一上船，即认识了康泽（这家伙是保送的少数人中之）。他有意与我接近，常在船舱平板上与我攀谈关于孙文主义及孙文主义学会问题，意在宣传。两

人思想矛盾太大，曾多次发生争执(问题已记不清了)。但我与康一般感情很好，一直在“中大”都是不错的。以后在“中大”公开论战，批评孙文主义斗争中，我们才从此疏远了。与此同时，我在船上即与同行女同志丁祝华(现在二部学习)接近，似乎当时已知她是共产党员(在船上秘密已松驰)。我不善隐讳，也向几个同学说我也加入了C Y。后丁背地告我，不要随便说(没加入不应说，如加入更不应说)。其实我一点不懂。一点认真的关系也没有。在考试中我即见过丁祝华同志……曾问过许多人，都说她是山东人，从家庭中斗争出来，进广东农民讲习所，脚虽小，但穿着军衣，便同男子一起下操、跑步，一样坚定，吃苦。我从好奇转到对她特别敬重。在同船两个女性中，另一个年轻漂亮些，廿个人对之趋之若鹜，将丁冷在一边。我一方面不平，另一方面敬重她，故独与她接近。后在学校同她并座，在学习上帮助她，一直到她因病被送回国。当时有很多人说我们恋爱，似乎目的在嘲笑我的样子。其实我一点意思都没有，也未作任何分辩。我只觉得这些分子，着实愚不可及，庸俗势利到可怜程度，我在当时已能将政治及东家的妍媸正确分别与正确处理。

以上这些环节，都在思想、行为、组织上推动了，增益了，指引了我开始坚定的走向共产主义。在苏联

学习两个月以后，即由丁祝华、薛萼棠（现在华中局党校负责）、郝惊涛（江苏睢宁县人，回国后叛党，当特务）三人介绍正式加入联少共，候补〔期〕六个月。这是我一生的共产主义奋斗生活之始。这一时期，是我为共产主义奋斗在思想上、行为、组织上实际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其实际意义是我已具体明确的确定了人生奋斗的方向。

但革命意志，从思想上坚定，仍非“广大”读书时代，倒是到苏联学习的四年。在“广大”时思想本质主要仍是爱国主义及英雄思想。

\* \* \*

由于青年时代革命思想及对革命的认识所推动，在莫斯科“中大”学习，自始至终是认真的，用功的，获得从所未有的自觉与智慧。故又在初学的一个月又廿八天（一月十四日～三月十二日）之后，即被选入第一个俄文班（十一班）直接听讲。在学生中亦以活动分子之一被选入学生公社（学生会）。在加入联少共之后，更积极参加反孙文主义的斗争。学习不久，我自己要求转入第七班。据当时看，这是政治上最强，斗争最剧烈，人材最集中的一个班（国共两方的主要学生均集于此班。我方如左权、邓小平、傅钟、李卓然，潘子力等，国方如谷家兄弟、陈春圃、杜柏生、邓文仪、李秉中、吴淡人……等）。这一转移对我学

习的进步，斗争之行动，与革命意志之坚定，尤其清楚的区别国共两党，明确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方面有着重大作用。

在我进入俄文班之先，是与广东同来者（廿二人）共一班（一班）。我与几个国民党家伙在学习上不相上下，嫉妒与争风因以发生。事实上，我比他学得好些，两个教员（均女的）均喜欢我。我之能入俄文班，有她们帮助不少，这大大引起那国民党几个家伙不满。转入俄文班后，我有时仍到女教员家内玩耍，她们问我班上对她们教学意见，我据实以告。教员即将此事向班上解释，这几个坏家伙却借口说我“挑拨离间”，将我告到同志审判会。但此时我已加入青年团，党与团内开会，决定不支持他们，并反对这种控告。教员亦宣布我反映是正确的，如不撤销，她们即辞职不干，结果控告被迫撤销。经过这一斗争，我与教员之一的丽亚由师生进入到朋友，由朋友发展到恋爱。这是我一生中的初恋。我们相爱几年（一直继续到国内时还通过信），她对我的帮助（俄语）、教育（政治）与坚定（思想），在我奋斗一生中是十分重大的事件（虽然她自己并不是党员）。记得当时国内反动，许多一时的进步人物均转入反叛。她（也有其他俄国朋友）提醒我：“朱，您好，您将来可是不要叛变才好。”这句话警惕了我，我曾象发誓一般坚定着自己，向她，向一

切俄国时代的友人自矢！

在我到“中大”学习时（一九二六年初），旅莫支部的主要斗争已经过去。虽然我在当时也从其他同志处接受了对旅莫支部的反感，但我是没有被吸引到这种斗争中去的。在反对旅莫支部之后，大家均强调学习，我在这氛围中亦努力学习，功课一般还好。但一由于自己没有实际经验（完全是学生），二因气候不适与心脏病的发展，大半时间在病中，三因学校办理不善，自己实际除了更明确坚定的确立对革命的人生观及学得一些教条的思想方法外（亦不是很多的），一般学得东西是不多的。又由于我是团员，发展较迟，离开“中大”较早（一九二七年夏），入军事学校后与“中大”党员未联系，自己本身也讨厌“中大”的乌烟瘴气激烈斗争。故“中大”以后，反代表团的支部问题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宗派活动，我是没有受到影响的，而且我对教条主义主要分子的作风是不满意的厌弃的。这些便是我在历史上为什么未与教条主义者有宗派结合的主客观原因。

“中大”毕业（一九二七年夏）时年二十二。按理应回国，但大革命失败，回去较难，且我们在“中大”究竟没学到什么本事，觉得回去没把握。许多同学鉴于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都想学点实际知识，尤其是军事，但都未提过意见，只整装待命回国。其实学校及

国际亦决定大部同学学军事。在我们表面上似是动身回国的一天，实际把我们送到步兵野营去了。在这里学习大家一般还积极。一个半月后，决定分别上军校，自动报名选择兵种。我因科学及文化程度较高，选了炮科，即于秋后入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在这里我以空前的热心学习功课，故学习成绩较好。在学习中，我由学员为班长、副排长。在建立中国连后，又任司务长，主持中国连的行政管理工作。此时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及各地送俄的军事干部到莫斯科，开始在“东大”设军事班，因内部闹问题，改分到各军官学校。这一批人一部到炮校，专设一个排受训。这批人将“东大”军事班的斗争也带到炮校来。他们在校表现主要是：一不愿好好学习，故对学校制度、勤务（扫雪、洗马、守纪等）便持抵抗态度；二常常请求回国，据说是为了争取领导；三闹宗派，闹成见，甚至一部更闹托派。其结果在校内发展到反对学习，抗拒工作，违抗命令，结成宗派，专门反对及打击学习用功，拥护学校循规蹈矩的同学。我是被打击之重点，其他如孙发力，朱国桢等都是被反对的。他们或明或暗骂我们为俄人走狗，我为大狗，另一些同志（班长、副排长）为小狗。在校外则与“东大”、“中大”及步兵、工兵等学校学生结合，反对“国际”，甚至到“国际”请愿、示威，据说还与托洛茨基发生关系（曾派一个人到土

耳其与托联系)。他们人数较多，很灵活与有计划运用学校管理教育的弱点(训练中国同志尚无经验)，进行鼓动，团结落后分子及新同学。一个时候他们不但人数占优势，而且在支委(中国支部)内占绝对多数(支委七人有六人为他们)。有了支委，更可相得益彰，以党的名义打击同志，团结群众，掩护活动。但当时其内部亦有矛盾。一个同志曾经过我向中国班主任加巴金告密，历举其组织及活动，并坚称其为托派。当时以我为首的同志即向主任请求办理。他每次只推已告“格别五”侦察，总不解决。问题一天天发生，一直到我毕业离校，回国。听说“中大”有托派自首(与炮校形式相同)，展开过大清洗。炮校问题亦查出来了，主任且因失职被撤。在这之间，曾因他处托派案联系到在我校捕去若干人。又因一部分人经常反对学习，反对“国际”，示威，捣乱，曾开除过一部学生(只炮校即有十五六人)，撤销党籍，送回中国，或送西北利亚作工……他们回国后大部叛变、自首或在苏区肃反中被杀掉(但里面也有后来转变很好为党牺牲者)。这一处理虽暂时打击了这些人的活动，但活动甚未稍杀。送到西北利亚学习的活动分子，仍时常来信指示与联系。这些事我们报告主任，均未得到应有与可能的解决。我们对他是很不满意的。我因要学习，要工作，要负责，受到打击又最尖刻(他们在俄共产党会上硬



要开除我的党籍，批评多端)，学校又不解决或援助。我性子很急，故一个时候曾因操劳、忿激与思虑过多而成神经衰弱，并因而酿成神经性胃病（以至今未愈）。

我在炮校学习中，曾被选参加联少共委员会委员。一年后（一九二八年六、七月，时年二十三），被吸收加入联共党，候补期两年。因我是知识分子，必须至少五个五年以上党龄者介绍，我的介绍人有米夫（“中大”校长）、阿哥尔、波古烈也夫（“中大”教职员）、求古诺夫（中国同志）及炮校的瓦悉烈夫（校副政委及政治部主任）和一政治主任教员兼党委书记者（忘其名）一共六人。

一九二九年时年二十四，野营中毕业。据知国际已内定要我进“陆大”。我觉得学了四年，一无工作经验，再进“陆大”五年，回国干什么，真的要纸上谈兵不成？故毕业后我即自动请求回国。中国班主任拒绝说：“回国”两字应打个×，其余你干什么都成。回国不成，我即要求到俄国普通炮兵连当一个排长或列兵，以资实习。主任拒绝，仍要我进“陆大”。我看拒绝不成，我请求学海军或要塞炮兵。不成，又请求学陆军技术大学（专门研究武器及改良或发明武器者），已允准。后又拟改调我及另三个学习及表现较好之同志到远东区去做什么特别工作（估计是“格别五”）。尚未动身，

适中东路战事扩大，大概是中国党要求派几个地方同志回去，到东北组织军委及进行游击战工作，我即第一个被指定回去。我很高兴，惟因东北道路不通，乃被迫取道欧洲回国（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计经过德国（在柏林等候护照约一个半月之久）、意大利、地中海、红海、南洋、香港、台湾、上海，同行者连我共三人（另两人一为陈家齐，四川人，法勤工学生，莫斯科工校毕业后调到香港军委牺牲。另一为滕功明，湖北人，亦法勤工学生及工校毕业，后派湖北军委，未接头即消极），费时三个月始达上海（一九三〇年一月时年二十五岁）。

到上海后，在“国际”指定住宿及接头地点为先施公司的东亚酒楼。但一住半个月，仍无人来找。曾拍电到德国找党的关系转“国际”，仍无结果。我们回国路费甚多（各六七百元），但旅馆太贵（每日每人房金五元），不能久住。乃计议以陈、滕二人入沪西之艺术大学，借以找关系（阅报，觉该大学有色彩）。我因有社会关系，乃只身去徐州找旧日之马姓同学。去时问得其家人诡称不在家，要我留地址。晚上该同学到东关会我，略（做）倾谈，我诡称回国不久，欲找关系。他即嚅嚅答称，他吃了六个月官司，现被释放，没关系，且国方对他仍监视。我即知他只（至）少已经消极或叛党（此人实自首，惟以未积极反党，长期

消极，现在我湖西钢山办事处任秘书，无党籍)。当以闲谈得一些时候将事情遮过，他即回去。临行问我怎样，我诡称住天把玩玩，他说：“明天再来看你”。他走后，我问了茶房还有夜车，五分钟后即上车南返(上海)。到上海后，他们两人仍无成就，我即暂住公寓，想法到街上碰人。但他们都碰到过人，不敢接近，人家亦甚冷淡。一天我自外购物归，在门口遇两个“中大”同学(一名马骅，回人，东北籍；一名张璧光，亦东北人，两人在“中大”均甚放浪，自由主义，与我无交情)。我无法躲闪，乃带笑寒暄迎入我住室。略谈之后，知道他们原先均在北京工作，马兄被捕牺牲，二人均消极。做过土匪“三番子”的工作，现漂流上海，以写文稿费度日。我们会见时已二、三日不食，饿得面腊黄，仍在等他(写)作之“墨子问题研究”的稿费以解决食住问题。我为不引他们注意，故说回国一年多，在家无事，当教员，现到上海玩玩。为争取他(怕他们可能卖我)，给了他们一些钱，结以感情。他们甚感谢，且告我许多党的派别消息(如托陈取消派)。言中似不满党，并劝我“明哲保身”，要我与他们一起到哈尔滨开书店，要我翻书(他们知我俄文好)，他们卖书，以待时机。我佯称好，但说俄文忘了，不行了。这样来往几次，他们受我帮助甚多，看他们对我尚无坏意，且知道不少党的关系，我即实说是来上海找关

系的（但未说从欧洲回），请他们帮助。他们答应，但据我所知，他们并未真心想法，只见人（党员或消极分子）就说某某到了上海。几天后即有一个联系的党员（韩林，湖南人，广东大学同学，莫斯科同学）到公寓来看我，我请他设法。他即代转中央组部。经过几天后，我三人到他家去玩（哈同路，民厚里），遇人更多。有一次遇见小超（现在杨家岭，我当时不识），偕其母亲在街路上走，李即介绍我是刚回来的，找关系不上，再托他们转致。过后中央组织部即派方英（在鄂豫皖被张国焘杀掉）来找我们，指定旅馆接头。后又将我们搬到军委招待（？）机关。适军委干部将先直（亦莫斯科学生，我们不识）叛变，我们乃搬到军委工作机关。旋分配工作，我留中央军委（一九三〇年三月），陈去广东，滕去汉口。以后即开始了我党内实际的斗争生活。

在李琳家中，知到（道）他们（两夫妇均广东同志，均“中大”学生）对党不满，且与托陈取消派有来往。有一天在李处遇托派系人段子益（陈独秀的助手，“中大”二期学生，我不认识）。他问我们姓名，我们均将假名告他。他又问我，有一个朱瑞的回来没有，我说不知。他说朱瑞早都回来了。他又问我姓什么，我答姓李，以后他即走了。走后李告我此即段某。再过数日李告我，段走后大发脾气，说我不该撒谎，“简

直不是布尔什维克！”接上关系后，即再未与他们见面，李为此亦因消极被开除。据我猜想：一可能我自莫斯科动身，托派对中国即有通知，想乘找不到关系之际拉我（当时此种情形甚多，有些人被拉走），二可能是李某已将我们告诉他们，段来是看我们态度的，却遭我冷淡了。

自莫斯科动身，到找到党，先后六个月。这中间是我们最孤零苦闷的时候。在德国因无合法护照抑留近两个月，所处花花世界，生活阔绰（我们是以阔家子弟到德求学的身份住下的，后因党规定每日三至五元美金，可多用，不可少用，以便恰合身份），但实度日如年（当时因急欲回国，赶上工作，另因没经验，怕久住出事）。在找到党以前，我们都象失去母亲的孤儿。另一事必须报告者，即在未找到党前，我曾写信到家里过，旋接家信，说伯母、叔父在四年中相继死去，姊妹均出嫁，家里境况因多次婚丧大事，更见削弱。我恐日久找不到党还须依家中协助生活，乃将所得旅费寄家中百元，名为为伯母竖碑（守贞五十年），实为疏通，此事已告党（欧阳铁知道）。接上关系后，剩钱不多，与当时军委工作同志共同花了。这是我在党内生活以来唯一的一次与家中建立经济关系。后来上海党遭受破坏，个人生活自想办法，家里曾答应帮助，但实亦未向家里要过钱……因我影响，我长兄及

兄弟侄辈十余均参加党（后地方党破坏，大部叛变或消极，我长兄现在淮北行政区宿泗县任仓库主任。因长期消极，现仍无党籍）。

这一时期，从到苏联学习，参加反孙文主义及反托斗争，回国，在上海未找到党以前，这是我一生中最后明确确定革命人生观（为共产主义奋斗），坚定革命意志，及在思想、行为、组织与斗争中受到初步考验的时期。我在此期已作的是一个自觉的共产党员在斗争及工作中站起来，行动了。但还不能说是坚固的。因为一直到这时，我尚未认真的开始为党工作，及从工作、斗争与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中，受到锻炼及考验。这些只在以后，在上海的两年地下工作中才完全坚固的建立起来的。至于在红军及以后的一切时期，我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进步与前进着的。

\* \* \*

在地下时代工作先后两年。一九三〇年三月接上关系后，首在中央军委做参谋工作（当时书记是关向应），主要工作是剪报，画地图，保管及整理有关军事问题的材料（其实是没有什么材料的）。有时常同江苏军委同志（石心，四川人）到街上“看地形，准备会场，参加中央总行委计划及领导某些游行示威。工作不久，即参加过在上海召开的红军代表大会（会由李立三亲自参加主持），任会中秘书，记录。在这

会内就第一次直接听到李立三“打到武汉再与‘国际’谈话”的大言，亦第一次知道李与当时在江西红军中之毛泽东同志（代表刘志奇）的关于尽量发展农民游击战或是无条件集中枪支充实编制正规军问题的争论。当时全场跟立三意见一致，指斥毛之代表为右倾机会主义。我与多数同志对此争论采调和态度，即反对无条件集中主义，亦反对不集中主义，即采取一面发展一面集中。此种意见，实有助于当时之立三取消农民游击战的错误路线。我记得这是当时会议争执最大最中心的问题。在此会内并讨论与制定红军服装、徽章。我是第一个将苏联办法、教条搬到中国红军者，如兵种、肩章、职别、符号采苏联者，敬礼则采德国的“红色阵线”的举拳式（实未通用）。官兵等级及连队制度等这些实亦未尽通用。会议派人到各处红军中传达。涂振龙派赴江西代刘志奇（因不信任刘可代表中央军委意见），本应李翔梧同志去鄂豫皖传达，适他有事被派赴徐州，即要我去鄂豫皖（一九三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动身）。任务：一传达代表会决定，二整编统一红军，三督促进攻与会师武汉。我一共滞留该区三个月，完成了传达工作，整编统一了编制（建立第一军，下辖州一、二、三，三个师），推动了三个师集中向武汉发展，但未进攻武汉。先后攻广水，因雨季水涨未克而返，进攻武汉终未实行（实际状况证

明其不行)。在红一军出发攻广水时，我即从黄安之小河溪（平汉铁路花园站之东北）出苏区。经随山后伪装商人乘肩舆到三岔埠拟登车赴武汉。同行者有地方交通及干部各一人（一方姓一马姓）。但在三岔埠住下时为当地枪会及民团所怀疑，进行过一度危险检查与盘问，我答很好应付过去。但他终不信，黑夜派人借口保护我们到他们会部住宿，实则将我们软禁于一个屋内。外面加锁，一方面派人窃听（我们故意说他们保卫地方，关心商旅），另一方面派人讯问我们之舆夫（舆夫故秘密农协会会员）我们是不是“红匪”。舆夫均说我们二人是武汉怡和蛋场的执事，另一人为所差，到花园收帐回去的。回答与我们一样（口供故事先订好的），他们怀疑乃释。半夜派人安慰我们，说我们是好人，不要紧，明早可放心登车。次晨我们为应酬，乃向之道谢保护之意，又给兵役、乘差伍元而去。一路顺利到武汉，另二人即去关系处。我本拟找到组织谈谈（时长江局及军委书记为关向应同志），但约定旅馆无保不能留住，迫不得已乃当日登轮回上海（一九三〇年九月）。

回上海后，仍作军委参谋科兼谍报科工作，实无任何工作。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听了恩来同志（当时为军委书记）报告三中全会问题，此时乃知有反立三斗争。在上海工作约一个月，适长江军委秘书长（张



金刃即慕陶)于被捕动摇中脱逃被侦缉队击伤，没人接替工作。关向应到上海要人，中央军委派李卓然同志前去，据言他不愿去。正在无适当人选之际，我当即自动要求前去工作。在我未决定自荐之先，曾知道武汉敌情严重，但我已经过一年地下工作，自己革命信念大大提高并确切坚固。我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工作，应乘此时下去做些工作，可对党多做贡献，并资锻炼。向应同志很满意的接受我的要求。我临行前曾周到想了，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决心牺牲，并决心与家中诀别。乃写一个信给长兄，说明我到远方，生死难卜，以后不再向家中通信了。到武汉后，即任长江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住法界一日人照像馆内）。工作三月，武汉形势更形严重，破坏屡屡，牺牲踵接。最后长江局被破坏，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差五分钟未陷网，乃先后避去上海。临行前将军委、武汉市委移交我管理。不两日我秘书（叶福尼，湖南人）亦被捕。军委下几个工作部门亦破坏一部，形势已将最后危及军委。适关自上海来信调我回去（关考虑到武汉危险，留亦无益，且有损失可能），我将工作交与军委一个同志（周学谷，武汉人，“中大”二期生，汉阳兵工厂工人）后即回中央军委，我走后不久，军委亦遭破坏，周被捕牺牲，武汉工作全坍。

回上海前，即知开四中全会（邝继勋同志奉派赴

鄂豫皖过汉时谈的)。到中央军委后，大部情况皆变(时聂荣臻任参谋长)，但并未听到关于四中全会问题的传达。此次回来，改任中央军委兵运破坏科工作。一方面受军委领导，另一方面又与毛××联系。工作较多，且须办训练班，必须自立机关。我任此工作系十个月，先后训练了上十个同志(均工人，训练主任为甘青山，江西人，“中大”一期同学，工校毕业，已牺牲)，经我手并派出了六七十个同志或进步兵士到各军及几个兵工厂工作(作瓦解、爆炸、“宁暴”即是其中有结果的活动之一)。对这一工作我是努力做的。但我觉得当时中央及军委不大重视它，很少给干部或给一些很成问题的干部(如叛徒、流氓、兵痞，这些人以后对我的工作及安全发生很大威胁)。在一次总结我的工作会内(王明、博古、富春均参加)，我曾提了如上意见。记得博古首先反击，批评我工作少成绩及不是做的兵运，乃匪运(先后曾与孙殿英及孙蔚如代表接过头，均是军委介绍给我的)。王明批评稍缓和，只富春态度较好，对博、王批评作了一些解释与调和。我第一次对这些领导同志(博、王)方式发生不满，对他们的风度深感十分的不投契。但我与他们素无直接联系，亦只能在观点上有此感想而已。

在兵运破坏工作中，中央各机关干部曾一度被派(据说为了加强下层)到各区帮助工作。我被派到法

南区委（书记陈凌平，后叛党），时间只七天，但对我教育及帮助极大。这是我地下工作时代仅有的“深入”下层的一次，也是在相形之下发现自己不行的一次。之后，顾顺章叛变，影响很多机关及同志的安全，我与一批同志均被决定派往苏区，当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从上海动身赴江西，同行者为陈寿昌同志，于次年（一九三二年时年二十七岁）一月八日到瑞金中央局。十日即被分配到总司令部任第二科（交通）及第三科（侦察）长，半月后转红军学校任教员，三月后即到部队（十五军）任政治委员，以后一直到“七七事变”到北方局为止，均未离开过部队工作。

地下两年工作，是努力的，有些成绩的，也是使我受得锻炼，考验及从思想、行为、组织上达成最后坚固的年代。但我认为中央机关的干部，能力是不相称的，两年中一般亦无甚大的提高。

.....

革命工作伊始，即深居上层机关，未做过下层工作，不接近群众，亦未直接参加斗争，从未受到什么严重艰难的锻炼。这在思想上、工作上，都不可避免的给我一些高高在上，不亲下层，主观空谈，教条等的作风的影响的。这些都成为我此后各时期工作中弱点，缺点表露的始基。

到江西后，先作总部二科兼三科长约半月，旋任

五军团(时“宁〔都〕暴〔动〕”后一个月)干部训练班一个队的政委(班政委为李卓然)，又半月。后即调往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第一期任政治教员，并参加总支委任宣传委员。在红校时期，我将苏联的红军及政治工作的知识输入一些(如司务长制度、纪律及奖惩条件、列宁室工作等，这些介绍一般是好的)。

一九三二年夏，我军东征，占领漳州……政委左权改任军长，即派欧阳钦同志接我工作，派我任十五军政委，这是我在战斗部队任职之开始。到工作后一周，红军即西移，准备先打击一下粤敌，然后北上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我工作三个星期，又改调红三军(军长徐彦刚，政委郭跃珊，主任李卓然)任政委(郭另调工作)。十五军政委另由副政委(刚派来两天)乐少华同志继任。在三军工作之初，即参加了水口战役。这是我参加战斗之始，军队伤亡甚重(约三分之一)。战后红军北移兴国一带，重行编组，将三军仍编原一军团(三四两军)，十五军仍归还五军团(十三十五两军)。编后即进入反四次“围剿”战斗。一军团连克乐安、宜黄两城，追敌至龙曾渡(抚州南)。四次“围剿”被粉碎，旋移军南桃南城之间待机。经过一时期辗转整训之后，秋冬间向闽赣边之黎川、建宁、泰宁、光泽、资溪、贵溪地区发展。胜利后，回军黎川，于新旧年关之交重新整编部队，撤消军，建立大

团制，充实师。我在三军工作共六个月，撤销军后，我即调任独立十二军政委（司令罗炳辉），未即到职，又改任五军团政委（指挥董振堂，副赵博生，均“宁暴”主事者，政委肖劲光，主任刘伯坚）。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接受工作，即北上打硝石（黎川北），打长员庙，黄狮渡（镇谷南），主力打琅居（抚州东南重镇）。五军团独挡二倍于我之敌于长员庙，是为五军团暴动以来第一次之正式战斗。战斗甚为激烈，副指挥赵博生同志殉焉。此后辗转南移西移，开始反攻五次“围剿”。打过东黄坡及候坊战役，东至福建向将乐、顺昌一带发展。回江西后，即开始打防御战，由黎川向建宁、泰宁、向广昌节节收缩，一直到江西兴国。

检讨我在三军工作六个月，是有成绩的，但我当时既无战斗经验，又无政治工作经验。我主要贡献是：团结干部，教育部队，整理纪律，加强党的工作。自一九三三年春到五军团工作，到一九三四年八月调动止，共二十个月。工作的第一阶段是有成绩的：如加强党政工作，改造干部及部队，提高战斗力等。五军团部队不但日益坚强，且建立不少战功。但后期，一由于自己工作熟手有成绩，工作效率减低，二由于五次“围剿”中对五军团之使用表现不满，三对反五次“围剿”政治上信心不够（但尚不知向党的领导上检讨），

故工作积极性降低。尤以对董振堂同志之团结帮助不够，时生冲突，精神苦闷，工作又搞不好，且对下级干部要求太严，作风太硬，颇有隔阂。由于这些，曾坚决要求调动工作，随于一九三四年八月由中央决定与一军团主任李卓然同志对调。我于八月底到达一军团任主任（时年二十九）。检讨我整个在五军团工作成绩是不大的。这不只由于年轻，经验少，主要乃观念上有缺点。如对团结董振堂同志上，自己既有英雄主义，且对人要求亦过左且片面，耐心帮助及尊重均不够。次为工作不民主，包办，事务，生硬，不能团结及教育干部。再次为政治不开展，对战争信心不够（虽然当时领导上有问题，但我又未明确在思想上认识这点，并与之斗争），碰到困难，情绪苦闷，工作积极性低落；对领导，发生应付的心理。在战斗中亦有几次未很好完成任务（点山、硝石、沟口、峰殿、德胜关、高虎脑等）。

到一军团后即西移。保卫兴国作战一个月后，又南移信丰东南地区荫蔽，旋于十月十六日作长征之突围。长征整整一年，我都在一军团工作。到陕北，一九三五年底打直罗镇。一九三六年春，第一次东征山西。同年夏，西征甘肃。秋，中央红军主力西去迎接二、四方面军，我率四师留七营川地区，并向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我即在“双

十二”前两日被调到二方面军任主任。在二方面军工作六个月（经过了“双十二”事变到“七七”事变），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调开部队。旋随少奇同志到山西，参加北方局任军委书记（时年三十二）。这是我地方工作时代之开始。一直到今天，基本均未脱离地方党的工作，同时又兼军职（山东一纵政委）。

检讨我在一军任主任工作时期约二十八个月，我此期工作成绩一般平平，说有成绩就是保持了一军团工作的传统与水平。说缺点，我在一军团一般没有什么创造，亦未推进一军团政治工作有什么大的改进。具体说，工作是一般化的，坐机关不深入的作风是突出的，对干部的团结，教育，思想领导是差的。

在二方面军六个月，因一开始便知中央给予任务之重要，故工作是负责，积极的，领导方式是具体深入，实事求是的。不但我的工作对二方面军有帮助，二方面军工作任务及环境对我工作作风亦有推动（主要是具体、深入，实事求是，有始有终）。缺点是对二方面军历史及传统研究不够，对思想倾向，对干部政策均有过火与偏急之处。但在对二、六军间之宗派斗争问题和在对斗争贺龙同志的问题上，我一般是正确的，不过积极促进团结作用不大。

在整个红军中工作了六十六个月（五年半），我工作一般是有成绩的，也有不少缺点（均如上述）。

在发展及工作能力上是提高的，进步的，一般未犯过严重错误。但作为红军高级干部，思想上的开展是低的，作风上的改造是少的，基本还是主观，教条。一般说，在一个工作之初期是谨慎的，实际的，有成绩的。以后便粗心放手了，因而发生下降或停滞。主要由于自己在每一时期思想修养与改造上首先是如此的，在这点上可看见我对修养、进步、工作的无恒心，缺少贯彻性。环境的顺逆，便表现于思想、工作的进退，这是一种“资”的动摇性、软弱性两种性的表现（忽高忽低，忽冷忽热……）。思想方法上是主观的、聪明自恃的，机械的，工作方式是机关、事务、不深入，不具体，教条的。在干部政策上是生硬的，严格的，教育是不够的，有时又有感情及宗派的（喜爱青年，能说能写，活跃……不喜老诚，朴素，迟钝的干部）。在风度上是热情有时感性的，器量狭小，性情急躁，同干部及群众关系一般，结合不深切不坚固。在观念上是傲慢，爱面子，英雄的。

在整个红军时代，我是被信任及提拔的一个，我的发展与我的历史及能力相比是不十分相称的。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我工作及奋斗有成绩，因而在工作责任上逐步发展，但也由于教条主义一般干部政策下的必然的发展（因我是留过俄的）。因此在检讨红军工作时代，我在思想上找到被教条主义者信任主要的原因，



一是留俄学生（名牌漂亮）。二是我的思想方法有严重教条主义倾向。三不能否认我在红军中确做了一些工作，对党忠实、坚定，受到党的信任是应该的。但我与教条宗派是有别的，我在整个红军时代都与他们没有宗派的联系，这主要因：一、我发展较迟，客观上他们未能直接加我以影响。二、因我到江西在时间上已是反毛斗争结束之后，我无从参加斗争及分辨是非。三、五年半工作是在前方，在红军，党（在毛、朱领导下的党）改造了我。四、我个人本质是反对宗派的拍拍吹吹作风的，但正因我有严重教条主义倾向，故我个人在工作中亦有宗派倾向。如对干部使用、团结，对人对事的态度等有时亦有偏见、主观及成见的。

教条主义者在内战时期领导的错误，我没有在思想上觉悟到，只在个别方面（如打击干部、对人民政府的错误态度、五次“围剿”中军事路线、拉拉拢拢等）觉得这批人可敬不可亲，可畏不可敬而已。只有在遵义会中，我才开始知道这批人（主要是博古）的错误。对当时只是军事路线错误的谈论有过怀疑，但总以为是对的。不过因为我发展较迟，未及参加遵义会议，故全盘情形不很清楚，故只能片面了解一些。这使我未能及早的警觉到教条宗派的危害，及早的向他们警惕，及早的引起自己的反省及检查。这种障阻

一直到此次来延。在一个时期（山东），我想这是在向教条主义前进及发展的。在会理会议前，曾与聂〔荣臻〕等反对林〔彪〕之独立主义的。

在长征中，党反张国焘的斗争，这是我第一次正面及直接接触党内的路线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我个人自始至终不但坚持党的路线，而且一开始便自觉的从思想上及经验中洞察张国焘之奸恶，拥护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对反张及北上陕甘时期，在政治工作上执行了党的路线，从思想上顽〔巩〕固及团结了部队，积极的进行部队的整理，胜利完成北上任务。在对反张斗争上，我与聂、罗、左，曾与林作过一些斗争。这一时期虽短，乃是我在党内斗争考验，思想锻炼的最重大时期，亦是最有进步时期。在一军团工作上亦是较前有转变时期，也是我曾在中央及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与大家最团结一致的时期。

到陕甘，第一次东征及以后，这是我在情绪、工作上最苦闷时期。当时苦闷来源一是结束长征，工作环境及任务均有大改变，要求深入、巩固建设工作，我感觉能力不胜。工作作风、思想方法与客观实际有矛盾。我尚未能立即补习新的工作与领导方式，来适应新的情况（转弯是慢的）。二是一军团本位主义的发展，妨害工作，妨害团结。我本反对本位主义，但自己没有足够勇气，没有足够根据来做，倒反不得不跟

着本位主义走，内心发生矛盾。这一苦闷一直到大柏寺会后，才得克服（但前三天我仍沉闷，第四天我完全想通了，乃积极发言）。我对本位主义问题对自己估计是这样：有反对本位主义的愿望，无勇气，不坚定，不明确，终成本位主义俘虏，有时并成为本位主义的有力的助手。大柏寺会议，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的党内反倾向斗争而且部分是反对自己的。会议矛盾解除，思想解放，精神愉快。西征工作时代，在邓小平同志参加及协助之下，这是我在一军团工作改进和发展时代。也是我后此一个时期进步的基础。

红军工作年代，是我在能力上逐渐向各方面发展的阶段，但远非全面的与成熟的时候。

\* \* \*

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到太原。很短几天之后，奉派到保定，并相机进入北平（时北平已失）建立军事工作。到保定处被阻。联系了地方党，传达了一些武装政策及形势与任务。一周后回太原，正式主持军委工作，指导决死队中的党，收容及分派军委干部到各地工作。约一个月，恩来同志即派我到徐永昌处联络，并到第一战区程潜处政训处（主任李南覃、单三虎），以私人资格协助工作。因程潜、李等均非安心进步及联合共产党者，仅为借此招徕青年，故虽先后做了一些工作，提了些意见，惟均未实现。后随程潜撤退到

新乡。因政训处工作不可为，乃自行转至豫北师管区，任其干部队及学生游击战之教官，并做了些宣传联系的社会活动，扩大了党及八路军的威信，一直到争取成为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之十八集团军的联络处主任。程潜南撤，黄河失守，我自动脱离。仍以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主任名义，对罗、高、孙等部，进行联络工作。同时得同情者之资助，得继续以师管区之学生队为基础，自行创办学校（即“华干”），先后办了五期，训练青年干部约两千人。这些青年现均成为太行及平原的中坚干部。同时，代训了、指导了、整理与发展了在直南及豫北特委。豫北失守中，实行发动游击战争，在直南创造了一个游击队（四支队），在析城山（阳城南）创造了一支游击队（即唐天际旅），在通沽路建立了通清支队等，但不久开焦作（一九三八年春），被召赴“集总”（即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时在太行区）参加党、政、军将领会议。会后，我受中央指令为北局驻太行区代表，指导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党委。尚未开始工作，“集总”又派我去陵川、晋城一带协助一二九师部队的发展。两个月后回太行，住区党委指导工作。时中央决定召开六中全会，指定我参加。适九月，鹿钟麟出至河北，路过“集总”，表示与我合作，要求派一代表常驻联络。本决定小平同志任主任，但他坚要参加六中全会，争

执未下。最后由中央决定我去鹿处，不得已乃于九月八日动身去河北。在鹿处工作约两月，一般无大开展，乃于十二月初回“集总”。时德怀同志已回，传达了六中全会决议。会中，北方局尚昆亦自晋西来太行。原在六中全会上决定我参加华中局工作，北方局不放，电请中央留我任组织部长，中央乃同意留下。在北方局工作只四、五个月，时中央决定召集政治局扩大会（一九三八年六月），指定我必须参加。一切均已准备完毕，忽会议改期。此时，山东有发展，但问题复杂，领导尚弱，为增强山东，中央要北方局考虑派人去。彭、杨（注：即彭德怀、杨尚昆）即建议徐与我去分任军任党任。中央同意，政治局会议乃由小平前去参加。我即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自太行动身去山东，六月二十九日在沂蒙南部山区与郭、张、黎（注：即郭洪涛、张经武、黎玉）及山东分局会合。时适敌“扫荡”鲁中区，乃辗转反“扫荡”，直到八月始平。八月中，分局分别召开各种会议，听取我们传达北方局“集总”指示，具体讨论及布置各项工作。九月转茶陵（蒙南）召开一区党委党代表会，成立第一区党委。适中央决定召开“七大”，在山东乃进行选举，分局决定由郭、张（注：即郭洪涛、张经武）为代表，他们乃于十月二十六日赴延开会。分局由徐、朱、黎、罗、陈（注：即徐向前、朱瑞、黎玉、罗荣桓、陈光）组成。但黎

此时去胶东巡视，陈、罗各在一方，实未开成会议，书记由我代理，但只与徐二人共同工作。次年春黎回，夏，徐又奉召来延，又只有我与黎二人共同工作。一九四〇年为山东磨擦最厉之年，亦山东大发展与统一之年。为了总结工作，厉行统一，并实行与国民党对抗。随于一九四〇年夏、秋开了山东联合大会，成立各“救”、“省临参会”、“省战工会”，以统一全山东的民主斗争。在这一年中领导有转变，开始在各地坚决反顽，发展武装，改造政权，确立根据地，发动群众……形成山东工作发展大，统一建立了根据地……的黄金时代，但也是自满、骄傲，养成错误的开始。一九四一年，敌后情况更见恶化，山东亦开始被敌“扫荡”、蚕食、分割与缩小。这一年斗争中，由于我们领导上犯错误，未能及时转变方式，着重依靠群众，分散荫蔽，深入下层，厉行对敌斗争，加强巩固建设工作，故削弱甚大。尤以年终（十一月五日起——十二月底止）沂蒙大“扫荡”，更空前的打击及震动了我们。但这一打击，同时也警觉了我们。开始在思想及领导上去检讨自己，指出了我们领导上犯有脱离群众的官僚倾向，对敌斗争的和平倾向，领导上的不民主，作风上的机会主义，太平麻痹，英雄主义等。这一检讨开始了分局领导的转变，尤以四月少奇同志过山东，直接指导了我们召开了分局扩大会议，总结了四年工作，

更具体及正确的检讨了山东分局的领导及工作，协助制订了会议任务，并以实行减租、减息、增资，动员组织群众反对官僚倾向为展开一切工作与斗争的中心。这一检讨及指示，从六月即开始进入实施，到年底，尤其到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山东群众工作已有一般的展开，各方面〔的〕工作，作风，领导均已有了初步转变。为总结五年（北方局指名的）首先是一九四二——一九四三的一年工作，分局复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召开了区委书记联席会的扩大会议，总结了五年及一年工作，拟定了今后工作的四大任务（对敌，经建，发群，整风）并贯彻完成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中央指示之争取优势的任务。会议进行中，适发生李仙洲部入鲁情势，我们乃及时接受了过去教训及经验，灵活的紧切的掌握时机及斗争策略。尤其是动员各阶层，依靠群众，荫蔽自己，争取友军。首先是利用于（即于学忠）、李矛盾的空隙，乘于出鲁，拒李深入，因得以乘机掌握了沂、鲁等山区。接着又击退了李仙洲，终于打开了与改变了山东多年来三角斗争中我党我军的劣势局面，并进而肃清地方顽固势力，打击与瓦解伪军，展开反蚕食，反“扫荡”之攻势，继续发展与扩大了胜利。这些转变与发展，已光辉的完成中央指示之任务，并更好的创造了今后山东斗争的坚持及发展的有利基础。

为了参加“七大”，我奉令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出鲁，十二月底抵中央，暂时中断自己在敌后所负的工作。实行学习、清算、改造及提高自己，争取各方面成熟的进步和发展，以便后些时间更好的为党工作。这就是我目下的最基本的任务。

在这时期中，离开北方局到豫北一带工作（约半年）时，是我工作最有成绩时代之一。这时，我只以一个人，改名换姓去做一件代表党的光荣的半合法的生疏的，然而却是战斗性的工作。在这情况下，自己常得利用每一时间去工作，向每一接触的人去宣传，向每一个可钻的空隙去寻找活动机会，针对国民党每一压迫与限制去考虑对策，利用一切可能去吸收、教育、团结与改造青年，培养干部，用一切方法寻找地方党，指导其工作，创造敌后斗争及武装。我的活动曾大大扩大了党的影响，以至使国民党嫉恨，并使它多方陷害失败。在许多友军（程、孙、罗、高、宋、万等）中建立了联系，做了关于我党主张、坚持敌后斗争的宣传，部分派遣干部进行些下层工作。主办了张轸之干训班，自己创立了“华干”。在这一工作中争取了，改造了，培养了数目甚大的青年干部。尤其扩大我党信仰，争取许多国民党影响下青年（入“民先”、入党）到我们方面来，这对太行区及周围地区工作的开展，有着重大意义。找到了，整理了，发展了几个地区的



党。创造了及发展了地方武装，打下了我党我军在直南、豫北、晋南坚持游击战的基础。在这些工作中也改造了自己作风，如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发扬了民主的、群众的及团结的作风，争取及团结了不少中间与进步分子到党的周围，生活及行为均甚谨慎，给人留下了共产党应有的模范传统。也锻炼了自己独立工作，决定方向，克服困难的能力。有了这一时期工作的考验，我才在实际工作上开始向全面领导才能去发展。在精神上亦是我最愉快，最战斗，最紧张积极的工作时代。

在北方局时期，工作一般平平。在北方局时代主要是领导各个区党委工作，这是更高更集中更复杂与郑重的责任。由于我没有经验，不能运用思想领导，以及工作上调查研究，团结与联系活动分子及下层不够，故我对他们只起一些指挥作用，创造是不多的。在建设根据地及群众工作上，我的指导且犯有突击的，重形式的毛病（如十一月卅日群众工作代表会等）。在北方局组织部工作，亦未做什么。严格说，当时北方局一般尚未能建立起日常工作。其他必须郑重提出的是我的结婚，这是我一生建立夫妇关系与家庭的开始。我的爱人是陈若克同志。她是广东人，生于上海，出身是职员家庭。本人因家庭破产，十一岁即开始做工。十六岁参加工人斗争，十七岁（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

三日)入工厂之秘密支部。十八岁因上海抗战随工厂迁汉,旋因参加抗战活动被开除。为了去延安,路过晋城,即在我办之“华干”停下学习。我们于此地认识。经过个人对她半年的恋慕,终于一九三八年“七一”议婚,“七七”订婚,“八一”结婚(时年卅三)。我们是衷心相爱的夫妇。这一私生活的新变化,推动了我工作的更大的积极与进步。若克同志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明确坚定的党性与阶级性,对我思想意识的改造,均给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她与我相爱三年,先后生了两个小孩,她终于在山东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大“扫荡”的蚕食的斗争中,因临产寄住地方误落敌手。经过一个极艰难壮烈的斗争,最后与次儿一并光荣的牺牲(我时年卅六)。她之牺牲,在我私生活上激起了创后痛深的波澜,成为永难平复的仇恨。长女亦在先一年“扫荡”中因病夭殇。由于这些,我将以坚决领导抗日斗争,以终生的积极奋斗,多多的培养男女青年干部,更关心妇女工作,来继若克同志之遗志,来纪念她及为她之牺牲复仇!

在鹿处任代表期间,除部分进行了指导冀南党的工作,地方工作外,对鹿之疏通、团结收获是不大的。这不仅由于鹿之恶化趋向,还由于:一,党(北方局)及“集总”对冀问题没明确坚定的方针;二,我在具体联络工作上亦缺乏明确坚定态度,故时软时硬,该硬

未硬，可软不软。我个人在这一点上亦深受“投降主义”的影响。但此一时期工作，从教训中确学习了一些政治斗争的经验，对以后在山东工作有不少帮助。

在山东工作（一九三九年六月——一九四三年八月）整整四年之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九四一年以前，这正是进入工作之开始。一切生疏，没有经验。工作在发展阶段，担子较轻，信心较高，工作环境和敌情尚未十分复杂、严重，故一切小心、谨慎、谦虚，比较实事求是，也比较大胆。因环境一般不算困难，故弱点还没有及时的暴露。后一阶段，一九四一年一年，正是一九四〇年大发展之后。山东工作统一，形势展开，工作熟手，环境顺利，信仰建立，因之发生自满自足，放心快乐。无视情况之必然及已经逆转，离开实事求是，脱离下层，脱离群众，无视工作之自流、发展或下降，放松以至放弃领导……因而使山东工作招致打击。而自己亦正是辛苦最大矛盾最深领导失败最大的一年。第三阶段，一九四二年及其以后，分局四年工作总结会，将这一切从思想上及领导上检讨，揭发，教育了全党及教育了自己，开始更加谨慎、小心、虚心，转向实事求是。尤其改正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观念，改正了个人及事务领导为集体民主和强调思想领导，密切重视客观情况，掌握时机，利用矛盾，运用政策，依靠群众……从这些斗

争中转变了山东工作，改造了自己，教育了山东党及干部。但这些转变只是开始，无论就全山东说或就个人说，都还不是彻底的，巩固的转变与进步，仍须更多更大及继续努力，不断从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以达更高再高的向前进步。

自陈若克同志牺牲后，为了并必须为党更好的工作，及以更好的方式去纪念若克同志之死并为她及儿女的牺牲复仇，我用万钧力量从悲痛中自拔。一年后（一九四二年秋，时年卅七）我再婚了。爱人是潘彩琴同志，现年廿一岁。山东临沂人，小学生，童养媳，热情，坦率，有斗争性，纯洁。我们的结合亦是自愿的，互信互爱的，衷心的。

以上就是我历史及思想检讨的大要。

根据我三十九年来的历史及思想与各时期的进步、发展、工作及奋斗的回顾、检讨，最后，我对自己从历史到思想到工作，斗争及能力与发展上，有的即总括的检讨与鉴定：

一、出身是地主，社会地位是学生，知识分子，十多年的党员，我历史是清白的。

二、进步是早的，而且是自觉的。但由于出身及时代的限制，进步之始及其基础是有弱点的：即一由于对地主景况之下降的不满与劳动阶级的伟大斗争，有一定的共同点因而结合；二由于聪明，反映客观事

物快，见到有社会之不平与表示了对社会（男女及贫富，高下贵贱）的不满；三由于文化（新文化）及历史（小说等）知识，启发了到革命的思想，这些弱点应该均看到，因它仍然作用于一个人的意识。虽然这些基础是脆弱的，但都是可贵的，因它们终于引导我逐渐的而且最后的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三、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及顺利地位，发展的顺利，提拔顺利，工作顺利，上层的领导工作，故在主观客观上对我造成与下层隔膜与群众关系不密切，与群众结合不够，群众观念差，成为官僚倾向的物质基础。由于斗争锻炼少，没有遇到严重困难、挫折、一帆风顺，故战斗力差，思想作用不深切，思想领导差。由于实际经验少，故对事物的认识缺乏明确坚定性。

四、正因家庭顺利，和乐，知识分子的地位上层领导工作多，少锻炼与群众联系不紧切，故品质表现纯真热情，但有时流露感情。由于感情，对人员有所好恶，产生偏见，宗派，对事对物，对人兴趣主义；故聪明，锐敏，反映客观事物快，有思维能力，但思想方法上则是主观主义的，在表现形式上为英雄主义，工作方法为教条主义。

五、正因这些，虽作风积极，但方式急躁。个性坦率爽朗，但粗率，生硬，窄狭。工作有魄力，但粗

枝大叶，坚定坚持性差。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完稿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小组报告

# 创建闽西苏区时期的邓子恢同志

蒋 伯 英

一九二八年，邓子恢同志参与领导了龙岩县后田暴动和永定县溪南区的土地分配斗争，开始了领导土地革命，创造红色区域的初步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是，由于新建立的地方红军和游击队战斗力弱小，一时难以抵御敌人的军事进攻。闽西暴动以后，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领导地方武装转入分散的游击战争，以便创造条件和等待有利时机，开辟新的斗争局面。

## 一、迎接红四军入闽

一九二九年二月，邓子恢和郭滴人<sup>①</sup>等一起，在

---

① 郭滴人，福建龙岩人，1907年12月出生，1926年在广州农讲所学习时入党，曾任龙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闽西特委书记，国家保卫局福建分局局长，福建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1936年11月病逝于陕北保安。

龙岩县中甲的一个山村里召开了龙岩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确定了“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推翻陈国辉<sup>①</sup>反动统治，实现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方针。邓子恢向到会代表介绍了永定暴动情况和溪南区土地分配的经验。这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明确了斗争方向，振奋了全体党员的革命精神。

会后不久，邓子恢以闽西特委特派员身份前往白土、大池、小池一带农村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农会组织。

三月十四日晚上，驻防龙岩的陈国辉旅突然在全城戒严，出动大批部队开往农民斗争比较激烈的白土等一带村庄驻防。原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的红军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发，经赣南来到闽西。击败了驻守长汀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击毙了敌旅长郭凤鸣，三月十四日一举攻占长汀。陈国辉在那天晚上宣布戒严，就是为了防备龙岩地下党响应红军举行暴动。

邓子恢了解到这个情况，兴奋异常。这时，他接到省委书记罗明来信，省委任命他担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要他即日赶赴设在上杭附近的特委机关，部署响

---

<sup>①</sup> 陈国辉，福建南安人，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率部驻守龙岩。



应红军入闽的群众斗争。但由于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率部撤到了瑞金、于都一带，红四军要前往与之会合；同时，根据前委的计划，红四军要先在赣南打开一个局面，然后再返回闽西游击，建立红色区域，红四军撤离了长汀，开往江西瑞金。

邓子恢一时难以和红军取得联系。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报告了闽西斗争情况，要求红四军再次入闽，帮助闽西特委开展工作。

红四军前委在赣南接到了邓子恢这份报告，经过研究之后，决定各纵队立刻重返闽西战场。

五月十九日，红四军由瑞金向闽西进发。第二天，红四军前委派宋裕和到上杭找到了邓子恢。宋裕和带来了毛泽东给特委的信件，告知红军正向龙岩前进；赣敌李文彬已经发觉红军行动，正由赣南尾追而来，企图与闽西敌军合击红四军。因此，要求邓子恢务于五月二十二日到蛟洋与他们见面，共商退敌之计。

邓子恢立即召集了特委紧急会议。制订了一个在闽西各县骚扰敌人的计划。特委要求各县发动群众，在各地张贴标语，宣传红军胜利消息，破坏敌人交通，响应红军入闽。同时，要求龙岩、上杭、永定、长汀、武平等县委准备实行暴动，没收地主及反革命粮食衣物，烧毁契约，宣布抗粮、抗捐、抗税、抗租、抗债，

成立各区革命委员会。

部署完毕，邓子恢星夜前往芦丰，向上杭县委布置了迎接红四军入闽的计划，五月二十二日抵达蛟洋。这时，红四军已渡过汀江，摆脱了敌人的纠缠，经连城新泉、上杭古田，进抵距龙岩城仅三十里之小池。邓子恢闻讯，立刻转赴龙岩。他一路召集各区党委开会，要求党组织及时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暴动，宣布“五抗”，成立各区革命政权，开始分配土地。

五月二十三日傍晚，邓子恢赶到龙岩城外龙门圩，见到了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和军长朱德。

当时，龙岩城里守敌不过一、两个营，经红军打击之后逃往漳平。为了调动正在粤东参加军阀混战的陈国辉主力回援，以便聚而歼之，红四军在占领龙岩之后，决定暂时撤离，进击永定。毛泽东把这个决定告诉了邓子恢。于是，邓子恢随毛泽东一起前往永定。

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了闽西几年来的斗争情况。毛泽东向他指出，要重视武装建设，尽快建立起一支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军事上有坚强战斗力的地方红军，这是保证革命胜利，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邓子恢也深感闽西武装力量薄弱，几次斗争都因经不起敌人的武装进攻而失败。他向毛泽东要求从红四军调一批有才干的军事干部和武器，加强闽西地

方武装。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要求，不久就调了邓毅刚<sup>①</sup>等一批干部和武器到闽西地方红军，帮助闽西特委建设地方武装。

红四军大踏步挥戈南向，直指闽粤边境。五月二十五日，永定守敌不战而溃，败走上杭。张鼎丞领导的永定地方武装趁机袭击反动派，向永定冲杀。战斗结束后，红四军进驻永定。

随后，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张鼎丞任主席。毛泽东向上万名群众作了演说。

在这同时，中共闽西特委布置龙岩、永定、四乡农民，在红四军帮助下发展武装斗争。各区乡贫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收缴反动武装，焚烧田契借约，分田分地，建立红色政权，到处是天翻地覆的革命景象。红军撤走后重又退缩回龙岩城里的陈国辉残部，不敢出城一步。龙岩成了在红色区域包围之中的一座孤城。

六月初，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决定再次袭击龙岩，继续诱敌主力从广东回援。当时龙岩守敌只有一个营的兵力。根据龙岩守敌的情况，决定由邓子恢、傅柏翠分别率地方部队配合三纵队攻打龙岩，红四

---

<sup>①</sup> 邓毅刚，湖南人，1929年从红四军调闽西工作，先后任龙岩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团团长，红十二军军长等职。1931年在江西战斗中牺牲。

军第一、二纵队分散在永定、龙岩周围农村发动群众。

六月三日拂晓，邓子恢与三纵队司令伍中豪<sup>①</sup>、党代表罗荣桓率领部队与地方武装，发动了二打龙岩的战斗。守城敌军仓促应战，弃城向漳平逃窜。

打开龙岩后，龙岩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邓子恢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

红四军和闽西地方武装二占龙岩，使得在东江一带参加军阀混战的张贞、陈国辉大为震惊。陈国辉因为后方吃紧，无意继续与桂系军阀作战，率其主力沿着闽粤大道急如星火地奔返闽西。

红四军前委为了全歼陈国辉主力，命令三纵队及邓子恢领导的地方武装撤出龙岩，让开大路，给敌人留下一座空城。邓子恢在白土接到了前委的这项命令，于六月六日晚上赶到龙门与毛泽东会合。第二天，他又随军参加了会攻上杭白砂守敌钟铭清团的战斗。

白砂战斗胜利之后，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造成红军向江西退却的假象，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于六月十日进驻通往赣南要隘之连城新泉，待机消灭敌

---

<sup>①</sup> 伍中豪，湖南耒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到达井冈山以后历任营长、团长，红四军入闽以后调任红十二军军长。1930年牺牲于江西。

陈国辉在龙岩的主力。与此同时，邓子恢先行返回龙岩城郊，部署群众工作，侦察敌情，组织农民武装，准备配合红四军再次攻打龙岩。

其时，陈国辉一路顺利地返回龙岩，他以为红军不敢与之交锋，已向连城、江西退却，即在城里举行“庆功祝捷大会”，通令全体官兵放假三天，狂饮滥赌，日夜作乐。

前委决定，全军从新泉出发，出敌不意再次奔袭龙岩，彻底消灭陈国辉。六月十八日，邓子恢在离龙岩三十里之小池一带组织群众，协助红军在小池隐蔽集结，对敌人严密封锁消息。第二天清晨，红军三个纵队分途从小池向龙岩出击。邓子恢率领一部地方武装，随同一纵队前进。

经过一个上午的激烈战斗，除陈国辉和少数随行人人员漏网外，全歼第一混成旅。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后，邓子恢领导特委和龙岩县委发动群众，清除反革命分子。第二天，他领导县委动员了上万名群众在中山公园与红四军一起召开了盛大的军民祝捷大会。当众处决了罪大恶极的敌军法处长沈鹤天等人。

由于红四军和各县地方武装在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基本上肃清了闽西敌人的主要军事力量。闽西人民从此开始了以分配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

## 二、领导闽西土地革命

伴随着红四军在闽西的军事活动，邓子恢领导中共闽西特委及各县、区党组织，迅速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浪潮波及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五县，开始形成了以上杭古田、龙岩大池、小池为中心区域的闽西革命根据地。红色区域南临广东大埔边境，北至连城朋口，西达汀江沿岸，东到龙岩适中。

这时，闽西的局面已经大体稳定，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摧毁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建立各级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为革命根据地打下牢固的基础，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代表闽西特委起草了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的纲领。这个纲领主要有四部分：一，根据一年前永定溪南区土地分配的经验，制订了闽西实行土地分配的政策和办法；二，建立一支地方武装，县一级成立赤卫军，区乡建立赤卫队和少先队；三，在红色区域内肃清反革命，收缴地主武装，镇压罪大恶极的反动头子；四，建立各级临时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同时广泛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

这是闽西土地革命的第一个文件。为了取得经验，邓子恢以龙岩县为基点，召集了龙岩县有各区委书记

和革命委员会主席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执行这个文件规定的各项方针。县委扩大会议除了同意规定的四条意见外，还根据龙岩实际情况，增加了三点内容：一是决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除没收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土地外，其余工商业资产不得侵犯；二是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三是动员力量开发新区，帮助尚未实行暴动的邻近区域发动斗争，扩大红色区域。

闽西革命根据地各级党组织按照邓子恢起草发布的这一斗争纲领，在红四军的帮助支持下，迅速领导人民建立了各级红色政权和革命武装，掀起了以没收分配地主的粮食、土地、焚毁田契、借约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运动。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龙岩、永定、上杭三县大部分土地已经分配完毕。一九二九年八月，闽西特委的文件上对当时的情形有这样的叙述：“在四军帮助之下，现在二县（指永定、龙岩——引者注）大部分之田已分完了。上杭各区也在开始分田，大概十天之后，必有很好的成绩。契纸烧完了，田分了，谷子收起了，农民家里塞满了谷堆子，都愁没有地方存储，这里可以想见一般农民是如何心满意足了。”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闽西特委根据前委的意见，向各地发出通知，确定七月中旬在上杭蛟洋

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研究制订党的方针和任务，选举新的特委，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加强对大会的领导，红四军前委派毛泽东、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同志出席大会，代表前委指导会议。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组织到会的代表会前用了一周时间，对闽西的土地、政治、群众武装与政治组织、物价、洋货侵入、工农业破产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代表们推举邓子恢等五人为大会主席团；选派十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由邓子恢负责，分别为会议起草各项决议草案。

邓子恢代表中共闽西特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他回顾了闽西从大革命以来各个战斗历程。指出闽西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冲破了白色恐怖，胜利地进行了合法的或非法的种种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在发动组织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建立农民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在革命低潮时期有组织、有计划地退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赞扬闽西党组织在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他指出，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坚持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同时，他论述了创造闽西工农武装割据所必须具备的三条基



本方针和六个有利条件。三条基本方针是：（一）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二）发展工农武装，彻底消灭民团土匪，有阵地的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六个有利条件是：（一）闽西已有八十万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而且暴动起来了；（二）闽西各县有了共产党，这个党与群众建立了亲密的联系；（三）闽西各县已建立了人民武装——红军、游击队；（四）闽西的粮食可以自给；（五）闽西处于闽粤赣三省边沿，山岭重迭，便于与敌人作战；（六）敌人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

在会议期间，邓子恢根据代表们的讨论意见，为大会起草各种决议。其中他执笔起草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是大会最重要的文件。内容分为“闽西斗争的前途”、“闽西过去斗争经验”和“党的任务”三大部分。

邓子恢在这个文件里，指出国民党军阀在各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混战的局面将继续下去，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与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全国各地工农运动的兴起，小资产阶级日益倾向革命。他还指出，由于闽西反动力量薄弱、群众斗争情绪高涨以及政治经济等有利条件，“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前途是确定了的”。必须“确立工人贫农的领导权”，“建立闽西统一的政权机关——闽西革命委员会到闽西苏维埃。”

他在分析了闽西形势以及主客观条件之后，指出闽西党组织在目前阶段的总路线是：“坚决的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其主要任务是：（一）巩固并扩大党的组织；（二）发动并组织广大群众；（三）实行土地革命；（四）建立苏维埃政权；（五）扩大工农武装。而实行土地革命，使闽西广大的贫苦农民得到土地，建设斗争的坚实基础，尤其是闽西斗争的主要目标。

邓子恢起草的这份决议案，经过毛泽东修订之后，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通过。除此以外，邓子恢还领导制订了《土地问题决议案》、《CY问题决议案》、《妇女问题决议案》、《苏维埃政权决议案》等文件。其中《土地问题决议案》是这次大会的另外一项重要决策。这个文件是继《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之后又一份土地革命纲领，它正确地分析了农村各阶级状况，纠正了过去土地分配中的若干偏向，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这些政策，对以后闽西以及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七月二十五日，大会重新选举了中共闽西特委。新特委由十五人组成，邓子恢继续当选为书记，张鼎丞任军委书记，蔡协民为组织科长，蓝鸿祥为宣传科长，谭震林为军事委员，江华任特委秘书长。

以后发展的历史证明，在毛泽东、邓子恢等领导

下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展过程中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为巩固发展闽西红色区域规定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方针，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会尚未结束，蒋介石下令对闽西苏区的三省“会剿”就开始了。敌人依仗其优势兵力，派遣福建军阀张贞暂编第一师及海军陆战队约七个团一万余人，分两路从东线向闽西逼近；赣敌金汉鼎第十二师派李文彬率四个团也陆续开赴闽西，先后占领长汀、河田；粤敌蒋光鼐部陈维远第七旅及戴戟第八旅共三个团，同时向永定、上杭一线进迫。从各地发来的情报表明，情况已十分紧急。为此，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前于七月二十九日闭幕，尚未完成的一些议程留待以后讨论。

同一天，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陈毅等赶到蛟洋，在文昌阁与毛泽东、邓子恢等一起召开了前委和闽西特委紧急会议，部署打破敌人的“会剿”。红四军前委根据形势和敌我双方的力量，研究了红军行动策略，“当日决定二、三纵队和军部向漳平开，一纵队留在闽西散开。”红四军分兵两路的意图是，把原来分散活动的四个纵队作相对集中，以第一纵队和刚编成的第四纵队留在闽西，与地方武装密切配合，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打击来犯之敌；第二、三纵队集

中以后，由朱德率领，打到敌人外线去开辟新的战场，从侧翼牵制和消灭敌人。

邓子恢领导的新特委，为了配合红四军的行动，在会议结束之后又与一纵队党委召开联席会议，研究一、四纵队协同作战的计划。同时，向全苏区各地作了布置。特委要求各县委在南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日，领导各地军民举行盛大的“八一”赤色日示威，动员并号召人民群众投入反“会剿”斗争。参加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根据特委的决定，迅速分赴各县斗争前线，组织苏区军民反击敌人的进犯。

### 三、为巩固闽西苏区而斗争

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虽然出动了将近十四个团的兵力，摆出一副大举进攻的架势，但他们内部诸多矛盾，行动难以协调。赣敌金汉鼎虽然是这次“会剿”的主力，但他并非蒋介石嫡系，受到蒋系的排斥歧视，不愿真正为蒋介石效劳，加以江西各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斗争风起云涌，使他如芒在背，不无后顾之忧。广东方面由于陈济棠、陈铭枢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日益加剧，东江地区丰顺、五华一带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因此蒋光鼐部也是陈兵闽粤边境，徘徊不前。福建敌军虽然号称五部十四个团，但内部

各派军阀之间矛盾极为尖锐，无心全力对付红军；加以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两个纵队出击闽中，打击了敌张贞主力，迫使其占领龙岩之后不几天，仓惶弃城退守闽南。因此，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对闽西苏区的三省“会剿”，实际是“会”而不“剿”，“剿”而不“会”，陷入了困境。

为了消灭根据地内部和周围地区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巩固闽西苏区，配合主力红军彻底打垮敌人的“会剿”，邓子恢领导闽西特委早在七月下旬就制订了一项在长汀、上杭、武平三县交界地区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先长汀的畚心、南阳（今属上杭）和上杭县的官庄、千家村等地发动农民暴动，消灭当地反动武装，建立革命政权，使被敌人所阻隔的闽西红色区域打通联成一片；第二步向苏区南部发展，进而发动武平县象洞的武装暴动，孤立尚被敌人占领的上杭城；第三步集中兵力围攻上杭，消灭残留在红色区域内的国民党反动武装。

在红四军的支援帮助下，他们在七月底以前完成了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武装斗争的烈火不仅迅速引向闽西最边远的武平县北部地区发展，而且对上杭守敌卢新铭旅和进攻闽西的广东敌军陈维远部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卢新铭为了巩固其上杭阵地，指挥一部分人马驰

往汀、武、杭边境地区，企图扑灭那里的革命运动。由于上杭敌人兵力分散，闽西特委决定实行第三步计划，乘虚袭击上杭。八月十九日，闽西特委和上杭县委率领地方武装八百余人，分别从水西渡和南岗向上杭城发动了猛烈攻击。卢新铭部三个月前在白砂受到红四军打击之后，士气低落，守城兵力单薄，抵挡不住地方红军的袭击，只能凭借汀江天险，坚守孤城。

三省“会剿”之敌在红四军和闽西军民的反复袭扰、内外打击之下，进退维谷。八月间，朱德率领的二、三纵队先后攻占宁洋、漳平，转战于闽西苏区外围之漳平、德化、大田、永春诸县，牵制了“会剿”之敌，打乱了敌人部署。八月下旬，朱德率部再次袭占漳平，重创敌张贞部张汝劭团。随后，乘胜进击，复于漳平永福歼敌一部，于九月六日收复龙岩，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喧嚣一时的三省“会剿”。

为了进一步巩固闽西革命根据地，邓子恢和特委的同志们要求红四军主力部队趁三省敌军全线败退的时机，帮助地方红军攻取上杭，拔去敌人插在闽西苏区内部的这个顽固堡垒。

红四军前委同意了特委这一建议，决定集中红军二、三、四纵队，与闽西地方军民相配合，攻打被敌人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铁上杭”。

九月二十一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三个纵队三千余

人，加上赤卫队、运输队、担架队，总共一万余众，经过几个小时激战，全歼守城敌军。战斗结束后，邓子恢、傅柏翠等分别率领闽西特委机关和上杭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入城，展开宣传工作，指挥部队捉拿躲藏在城里的四乡豪绅地主。随后，成立了上杭县总工会，分别建立了码头工会、小贩工会、店员工会、缝衣工会以及妇女会、工人纠察队等十多个群众组织。

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邓子恢在上杭领导召开了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总结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以来两个半月的工作，讨论上次代表大会遗留下来的组织、宣传、职工等问题，确定了闽西党组织新的斗争任务。会议认为，闽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一九二八年到现在的公开斗争，在红四军帮助下，已经建立了方圆数百里，范围包括有龙岩、永定、上杭、连城、武平、长汀六个县的红色区域，根据地内先后建立了四个县苏维埃、五十多个区苏维埃、四百余个乡苏维埃政权。在这样一个赤色区域内，人民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土地也已大多分配完毕；目前闽西苏区的基础是巩固的，而且必须向前发展。能否做到这一点，就要依靠党的正确的方针策略和勇敢坚决的斗争精神。

会议充分肯定了中共闽西“一大”所制订的路线和两个半月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提出了闽西党组织目前

的主要任务是：（1）扩大红色区域；（2）加强地方武装的组织建设；（3）在上杭建立闽西苏维埃政府；（4）防止并纠正工农业产品价值的“剪刀差”现象，保障农民的收入；（5）培养党的干部人才。

为了贯彻上述党的任务，闽西特委还制订了《关于苏维埃工作问题决议案》和《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作为闽西根据地党的主要负责人，邓子恢特别重视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强调各级政府必须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他主持制订的《关于苏维埃工作问题决议案》充分体现了这些思想。

十月二十日，红四军前委根据中央命令，率领第一、二、三纵队分别从上杭、武平、永定出发，向广东东江地区出击，以图打通闽、粤、赣三省边境地区的联络。毛泽东则留在上杭，随闽西特委活动。

红军刚刚从上杭出发，邓子恢在第二天获悉赣敌金汉鼎部正由会昌、武平向上杭进犯。由于军情变化，中共闽西特委放弃了在上杭建立闽西苏维埃政府的计划，决定暂时撤离上杭。十月二十二日凌晨，邓子恢带领特委机关以及一部分伤病员，陪同毛泽东渡过汀江，向白砂镇转移。随后，他们又转移到位于闽西红色区中心地区的苏家坡。

在苏家坡的日子里，邓子恢一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工作。他把毛泽东视作师长和益友，虚心地向他学习。



有一次毛泽东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子恢同志，你看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责任是什么？”毛泽东说，依我看，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责任在于当好群众的传达员。就是说，应当善于总结出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就要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分析研究，找出解决的办法，然后再由领导者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执行。

邓子恢听了，受到很大启发。他在特委会议上，向同志们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群众工作路线的意见，要求大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执行。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患病，体质虚弱。邓子恢请来医生为他治病，并买了牛奶、白糖，送给他补养身体，对毛泽东的生活非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红四军出击东江返回闽西之后，前委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并派专人来到苏家坡，迎接毛泽东返回红军主持工作。

一个月以后，邓子恢在苏家坡接到了毛泽东从古田送来的一封信。信中说红军根据新的斗争形势，即将离开闽西开赴赣南，通知他前去会面，研究今后的工作安排。

十二月二十九日，邓子恢赶往古田，到设立在八甲村松荫堂的前委机关找到了毛泽东。邓子恢这时已经知道，国民党开始了对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蒋介石仍委金汉鼎为总指挥。现在江西敌军已经再次占领长汀，逼近连城，正向新泉、古田一线进攻。为了加强对闽西的攻势，蒋介石从安徽调动其嫡系刘和鼎部五十六师入闽。该部已占领龙岩，先头部队进占小池，与古田仅一山之隔，相距三十华里。粤敌陈维远部正向永定、上杭移动。

毛泽东向邓子恢分析了敌情，认为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动向，这次“会剿”的主要目标是对付红四军。因此，前委决定红四军立即跳到敌人外线去，向赣敌金汉鼎之后方出击，迫其回援赣南，从而打乱敌人的部署，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三省“会剿”。

邓子恢向毛泽东表示，他将积极领导闽西军民配合红军主力，坚决打击来犯之敌。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红四军撤离古田回师赣南，“会剿”红军之敌失去了进攻的目标。金汉鼎为了保全其江西后方阵地，开始撤离闽西。同时，福建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武力对抗的局面，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爆发了为争夺福建省统治权而引起的军事冲突。由于这一事变，参加“会剿”的刘和鼎、张贞等军阀无心再在闽西“剿共”，率部星夜撤离龙岩。

一月下旬，邓子恢、邓毅刚、阮山<sup>①</sup>等指挥闽西地方红军趁势收复龙岩、永定，迫使敌军退居适中一线。从此，闽西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一个巩固发展的新时期。

#### 四、建立第一个闽西工农政权

早在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就曾决定在上杭建立政权，但由于当时敌人的进攻而未能实现。现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正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这样，筹建闽西苏维埃政府的计划就提到了闽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一九三〇年二月初，闽西特委在龙岩设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向各县颁发了《闽西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代表选举条例》，号召群众为建立一个自己的权力机关而积极行动。

与此同时，邓子恢领导召开了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关于工人问题决议案》等重要决议案。会议着重研究了土

---

① 阮山，原名阮德宽，福建永定人，1888年出生，1925年入党，是闽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历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工农银行行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部秘书长等职。1934年冬在长汀四都谢场战斗中牺牲。

地问题，认为土地问题是目前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中心问题。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农业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争取广大贫苦农民投入革命，巩固红色区域。会议认为，虽然去年中共闽西“一大”在毛泽东指导下制订了正确的土地政策，但经过半年的实际工作，发现有一些具体问题还须进一步解决。例如，“山林问题规定的不实际，耕牛问题、房屋问题、水利问题竟没有讨论，以致无所适从。”另外，一些贫苦农民反映，一九二九年土地分配规定“抽多补少”，只重视土地数量的平均，而忽视了土地质量的合理分配，致使富农得了好田，地主也尽量隐瞒或多留好的自耕地，贫苦农民得到的则多是坏田，吃了亏。农民们感到这样不公平，要求重新调整。

邓子恢领导大家认真研究了群众的这些合理意见，并对过去土地政策中某些不合理的规定作了补充修改，尽量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会议重新修订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对闽西土地分配中的遗留问题作了补充规定。特别是在分田办法上增加了这样一条重要内容：“分田方法以抽多补少为原则，抽出之田以肥瘠均匀为度，好田多者抽好田，坏田多者抽坏田。”这一补充，在不久之后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发布的《土地法令》中，更进一步作了明确的规定。后来，邓子恢领

导龙岩县进行土地调整工作，进而把这一原则归纳为八个字：“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一重要经验，不久在闽西苏区及以后全国土地革命运动中加以推广运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解决了进一步发展、巩固革命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时，建立一个坚强的红色政权来统一领导全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就显得非常迫切了。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八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会上，讨论并通过了《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还通过了有关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等项重要决议，为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斗争目标。

大会选举了邓子恢、张鼎丞、卢肇西、郭滴人、陈正等三十五人为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推举邓子恢为政府主席。根据苏维埃组织法的规定，闽西苏维埃政府设立有劳动部、土地部、军事部、裁判部、财政部、经济及文化教育部。

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根据中共闽西特委决定，把各县地方武装编为六个团，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不久，根据中央统一编制的序列，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军长邓毅刚，政委邓子恢，参谋长邓億，政治部主任陈正。在此之前，闽西特委为适应日

益发展的革命战争的需要，创设了闽西红军学校，邓子恢兼任政治委员。四月间，中央认为闽西红军学校不仅要为闽西培养军事人材，还应担负起为其他根据地培训军事干部的任务，决定把闽西红军学校收归中央管辖，仍以邓子恢为政委，任命蔡升熙为校长。后因蔡未到职，改派贺沈祥为校长。

邓子恢担任第一届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集中主要精力领导了苏区的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他根据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议，调集红十二军先后向漳平永福、龙岩适中一带出击，同时向武平、上杭、长汀边境地区发展，扩大红色区域。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基本消灭了闽西红色区域内的大股的民团土匪武装，解除了敌人对苏区的武力威胁，巩固了苏区红色政权。

与此同时，邓子恢领导龙岩县苏维埃政府贯彻关于重新调整土地的政策。他们创造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获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

在领导龙岩县开展土地革命的过程中，邓子恢发现了一个问题：还在去年夏收早稻登场的时候，农业生产虽然普遍丰收，但由于粮价猛跌，一般农民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严重影响了苏区农业经济和农副产品市场的发展。而今夏收季节又将来临，看来又是一个丰收年，但是农民并未因此而高兴，却在为粮价

低落而忧愁。

邓子恢与县委干部一起到农村调查，研究解决“谷贱伤农”的严重问题。开始，他提出以限制粮价的办法来稳定粮食市场，但结果完全无效，粮价继续下跌。后来他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雇工工价昂贵，投机奸商从中渔利。当时尚未组织工农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农民们无处告贷，在夏收季节为了不误农时，只得低价抛售粮食，以救急需。

这种情况，要求新生的闽西苏维埃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粮价暴跌，维护翻身农民的利益。经过反复调查研究，邓子恢和龙岩县委决定组织粮食调剂局，由调剂局向各地富农借款，用借得之款限价收购粮食；同时，着手筹备工农银行，发行纸币，把其中一部分货币借贷给农民，以向粮食调剂局购买平价粮食或应付急需。六月十四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了由邓子恢签署的第十五号布告，指示各县立即在各区乡成立粮食调剂局，争取在夏收登场时做好调剂收购粮价的工作，提高农民购买力，繁荣市场，发展苏区经济。

一九三〇年六月初，红四军在赣南转战了四个多月，创建了赣南红色区域之后，按预定计划返回闽西，与其他兄弟部队会师。六月中旬，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在上杭南阳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创建革命根据地一年多来的经验。邓子恢代表特委向会议报告了闽西

的工作，介绍了闽西在土地革命中创造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一重要原则。毛泽东和与会的同志们对于邓子恢所汇报的闽西工作经验极为重视，肯定了闽西党组织在领导土地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

南阳会议期间，邓子恢根据会议讨论的内容，执笔起草了两个决议，即《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这两个决议经毛泽东修改之后，获得了会议的通过。《富农问题》总结了闽西土地革命的基本经验，充分肯定了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土地政策；同时，也指出了过去政策上的某些不足，明确规定：“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另外，还规定了其他有利于苏区经济发展的财政经济政策。但在同时，由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倾向已经在党内逐渐增长，《富农问题》也不免受到影响，作出了若干“左”倾的规定。

《流氓问题》决议在分析了流氓成份的来源、阶级地位及特性之后，提出了党对于流氓的策略：“党对流氓的总策略应该是：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无疑，这一政策是正确的。

闽西土地革命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解决了苏区建设中面临的许多重要课题。南阳会议之后，毛泽东专门邀请邓子恢到长汀，向正在



那里集中整编的红一军团介绍了闽西土地革命的经验。

闽西苏区在以邓子恢为首的特委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得到了迅速发展。根据地纵横三百里，人口近百万；建立了党的八个县委、五十三个区委、五百四十六个支部，拥有一万左右党员；成立了六个县、六十多个区、五百九十七个乡的苏维埃政府，形成了一九二六年以来闽西革命局面的全盛时期。

但是，一九三〇年六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政策，从而破坏了这一大好局面。五月，前往上海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的代表回到闽西以后，开始贯彻这些盲动主义的错误方针。根据中央给闽西的指示，闽西苏区必须“集中一切力量，首先争取湖北之武汉与广东之广州暴动的胜利，以促进全国武装总暴动，完成中国革命。”为了执行上述任务，中央命令闽西新建立的红十二军立刻开赴广东东江地区作战，策应广州暴动。不久，中央代表涂振农到达闽西，进一步传达贯彻这一方针。

闽西苏维埃政府遵照中央指令，以仅有的一支地方主力红军向广东东江出击。但是，他们遇到了强大敌人的顽抗而遭到挫折。由于战斗失利，苏区内部的

反动势力趁势而起，在后方进行骚扰破坏。不久，红十二军编入红一军团，奉命北上攻打南昌。闽西苏维埃政府为了保卫苏区，重新集中了各县赤卫队，组成红二十一军。然而，红二十一军刚刚建立，还没有来得及训练，又奉中央命令再次出击东江。在这次战斗中，红二十一军同样遭到了挫折。

七月八日至二十日，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福建省委代表向闽西特委布置了根据中央命令而确定的任务：“集中一切力量，扩大斗争到广东去，首先夺取闽粤桂三省政权，争取全国革命胜利。”邓子恢和张鼎丞鉴于过去的教训，开始认识并抵制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方针，在会上对于中央的指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建议先集中红二十一军消灭闽西苏区及周围地区的残匪，巩固苏区，然后逐步向漳州、厦门等附近地区发展。但执行立三错误方针的同志认为：“闽粤桂三省总暴动，是中央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闽西红军应坚决地、迅速地向广东出击。我们胜利了，即使丢掉闽西苏区也没有关系。”

邓子恢、张鼎丞据理力争。但是他们的正确意见被蛮横地压制了，并被扣上了“新右倾”的帽子。

会议的结果是通过了以立三“左”倾错误思想为指导的《政治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全盘接受了当时中

央的“左”倾政策和方针，而且错误地指责邓子恢主持下的闽西特委在过去的一年中，由于“受四军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影响”，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从而完全否定了毛泽东、邓子恢领导下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正确方针。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了闽西特委，撤销了邓子恢特委书记职务。同时，闽西苏维埃政府于七月十五日举行了执委扩大会议，改选政府成员，邓子恢又被免去了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改任经济部长，兼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政治委员。

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第二天，邓子恢代表上届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坚持了革命的原则立场，实事求是地总结了闽西政府成立五个多月以来各个阶段的经验教训。他一方面报告了闽西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命令执行了出击东江的任务，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由于这一行动的错误而导致了闽西局面的动荡不安，闽西红色区域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失。

同年十月，邓子恢被调离闽西，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派往沿海地区开展农民运动。他愉快地接受了党分配给他的新任务，启程前往厦门到省委报到，开始致力于开辟新区的工作。

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邓子恢和张鼎丞等同志领导闽西人民进行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他们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创立并巩固了拥有近百万人口的红色区域。在短短的时期中就能胜利地发展革命战争，推翻反动统治，在纵横三百里的地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武装了人民和发展了群众组织，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一时期是红军第四军入闽后取得重大胜利的时期，是闽西革命蓬勃开展的时期，也是闽西党组织和广大人民凯歌四起的时期。虽然后来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闽西苏区受到了许多挫折，但闽西党组织在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领导下坚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与各种错误倾向坚决斗争，使得这块根据地不断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来，闽西苏区进一步扩大，范围包括有龙岩、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平和、漳平、宁洋、清流、宁化、归化(今明溪)、建宁、泰宁等十多个县。先后大约有八万贫苦农民加入红军，其中二万余人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领导闽西南二千余名红军游击队战士，继续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英勇作战，保卫土地革命果实。

在这漫长而艰难曲折的斗争中，邓子恢作为闽西

党组织和红军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九辑

作者 =

页数 = 296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